

宋代的交流空間：  
以茶館和茶文化為線索

2023 年 3 月

王 世禎

# 宋代的交流空間： 以茶館和茶文化為線索

（宋代の交流空間：茶館と茶文化を手掛かりに）

2023年3月

大阪市立大學 大學院文學研究科

WANG SHIZHEN

おう せ てい  
王 世禎

## 目錄

序章：宋代以茶為媒介的交流空間研究現狀與課題 .....	1
一，關於交流空間 .....	1
二，宋代茶館的研究 .....	2
1，宋代茶館的類型、經營內容、發展原因研究 .....	2
2，宋代茶館的社會功能研究 .....	3
3，宋代茶館的空間研究 .....	6
三，宋代茶文化與贈茶文化研究 .....	8
1，宋代茶文化研究 .....	8
2，贈茶文化研究 .....	9
四，宋代茶會的研究 .....	10
五，本文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 .....	11
1，研究視角 .....	11
2，研究方法 .....	11
3，史料 .....	12
4，時期、地域差異 .....	12
第一章：北宋開封的茶館 .....	13
一，緒論 .....	13
二，《東京夢華錄》中的茶館 .....	13
三，《夷堅志》等筆記小說中的茶館 .....	19
四，北宋開封城茶館的分佈空間 .....	24
1，《東京夢華錄》中茶館的分佈空間 .....	24
2，《夷堅志》等筆記小說中茶館的分佈空間 .....	24
3，北宋開封茶館分佈空間 .....	24
五，結論 .....	25
附錄 .....	27
第二章：南宋臨安的茶館 .....	36
一，緒論 .....	36
二，南宋臨安茶館的形態及特徵 .....	36
1，城市史料中的茶館 .....	36
2，筆記小說中的茶館 .....	40
三，南宋臨安茶館的分佈空間與都市空間 .....	44
1，城市史料及筆記小說史料中南宋臨安茶館的分佈空間 .....	44
2，都市空間內的茶館分佈區域及其分佈特徵 .....	45
四，結論 .....	47
附錄 .....	48
中間小結 .....	53

一，北宋至南宋茶館的發展 .....	53
二，首都的茶館與地方的茶館 .....	53
1，茶館的分佈特徵 .....	54
2，茶館的功能 .....	54
3，茶館的利用者 .....	54
4，二者之間的比較 .....	54
第三章：從宋代士大夫的書信與贈答詩看贈茶文化 .....	59
一，緒論 .....	59
二，從書信史料看宋代的茶文化 .....	59
1，贈茶的種類 .....	60
2，贈茶的場景 .....	61
3，贈茶的對象 .....	63
4，士大夫對茶的評判 .....	65
三，從贈答詩看宋代的茶文化 .....	66
1，贈茶的種類 .....	66
2，贈茶的場景與對象 .....	68
3，贈答詩與書信中贈茶的比較 .....	70
四，結論 .....	71
第四章：從茶會和會茶看宋代士人的交流空間 .....	72
一，緒論 .....	72
二，關於茶會和會茶的概念以及本文考察範圍 .....	72
三，各種類型的茶會 .....	73
1，皇家宴會 .....	73
2，宗教茶會 .....	74
3，士人的雅集 .....	75
4，宋代的鬥茶 .....	76
四，宋代士人的日常會茶 .....	77
1，會茶的人物和場所 .....	77
2，會茶所交流的內容 .....	79
五，交流空間的構築 .....	81
1，固定會茶空間的設置 .....	81
2，通過茶會連接的士人 .....	83
六，結論 .....	84
附錄 .....	85
結尾小結 .....	90
終章 .....	91
一，本文總結 .....	91
二，今後的課題 .....	94
1，交流空間 .....	94
2，跨域交流 .....	94

參考文獻目錄.....	97
一. 古籍文獻.....	97
二. 專著（按文中出現順序排序）.....	98
三. 論文（按文中出現順序排序）.....	99

## 序章：宋代以茶為媒介的交流空間研究現狀與課題

### 一、關於交流空間

“空間”這一概念在歷史學中一般分為“space”和“place”來討論。前者指物理空間，與此相對後者以物理空間內部的活動和關聯性為分析對象<sup>1</sup>。岡元司・勝山稔・小島毅・須江隆・早阪俊廣幾位學者在關注日常空間並對地域社會中的倫理構造進行探討時，對“日常空間”的概念進行過如下的說明和解釋：“結合了各種現實和意識，並且是流動的具有複雜性質的‘場’”<sup>2</sup>。平田茂樹・遠藤隆俊・岡元司等學者則進一步擴展了“空間”的分析範圍，並提出以政治空間、宗族空間和地域社會中多層的・多元的社會・文化空間為切入口，通過分析人與人是如何通過交流結合在一起，而這種結合又如何以交流實現流動，對傳統中國社會構造的形進行探討<sup>3</sup>。其中在探討影響傳統中國社會構造形成的重要因素“關係”時，則引入了“ネットワーク”這一研究視角，並指出這種網絡是多元的・重合的存在<sup>4</sup>。從每個個體的人到影響社會構造的網絡的形成，交流作為中間環節充當起這一網絡形成的媒介角色。交流除了在物理空間內實際進行之外，也通過各種媒介或載體進行，而本文對於“交流空間”的認識受到以上研究的啟發，將從“space”和“place”兩方面對“交流空間”進行說明和探討。

唐宋時期商品經濟得到發展，限制城市內活動的坊市制度崩潰，侵街、夜市等商業現象開始出現，處於交通要衝的鎮市、草市等迅速發展開始萌生出經濟、產業城市。城鄉之間和城市居民之間的交流變得活躍，城市內瓦子、勾欄、酒館、妓院、茶館、園林、寺院、道觀等人們可以進行交流的場所增多，到了南宋時期這些可供交流的場所由城內逐漸向城市周邊溢出。隨著交通、物流的發展，流動人口越來越多，南宋時期首都臨安與各地方之間的交流日趨頻繁。通過由茶館這樣的可供交流的場所形成的信息交流場域使信息得以傳播，同時實現文化的交流和擴散。交流空間的形成並不局限在類似於茶館這樣具有建築物的物理空間，也從通過連接人們的交流活動和各種載體實現交流目的這一過程中產生。隨著科舉取士的發展，從宋代開始士人群體不斷擴大，他們通過地緣和學緣、業緣等建立聯繫的同時，還通過各種交遊活動進行交流，從而建立自己的人際網絡。除了面對面的交流，他們通常利用書信的往來、詩文的贈答等進行信息的交換和交流，由此影響士人群體的政治活動、思想和文化。

因此，本文主要以可供交流的物理空間茶館、作為交流中間環節和媒介的贈茶、茶會和會茶為研究對象，對以茶為媒介所構建出的宋代交流空間進行探討。另外，明确作为交流空间重要組成部分—茶馆在城市空间中的发展态势，通過對宋代士人的书信、贈答诗和贈茶、贈物等贈答行为所构筑出的交流空间進行分析，嘗試揭示唐—宋這一歷史性的展開中宋代交

<sup>1</sup> 山崎孝史《政治・空間・場所—政治の地理學にむけて》，ナカニシヤ出版，2010年。書中對政治地理學中空間和場所的相關問題進行了論述。對政治地理學中空間和場所的概念進行了說明，前者指一個具體的物理空間，而後者則指空間內的活動、關係、以及所被賦予的社會意義，指象徵性的空間。本文對空間的理解則也參考此觀點，主要對作為象徵性空間的交流空間進行探討。

<sup>2</sup> 《宋代人の認識—相互性と日常空間—》宋代史研究会研究報告第七集，汲古書院，2001年，第15頁。

<sup>3</sup> 平田茂樹・遠藤隆俊・岡元司 編《宋代社会の空間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汲古書院，2006年，第1-11頁。

<sup>4</sup> 《宋代社会のネットワーク》宋代史研究会研究報告第六集，汲古書院，1998年，第3-4頁。其中對“ネットワーク”人際網絡的解釋引用了金子鬱容的觀點，即數種事物在某種程度上形成持續性的某種關係。因此其不僅限於某種有組織的、制度性的事物，倒不如說其是連接人與事物、金錢的多元的、重合的存在。

流空間的形態和特徵。

## 二、宋代茶館的研究

唐代是茶館的形成時期，進入宋代茶館得到發展，成為後世茶館的雛形<sup>5</sup>。唐宋時期，茶館被稱為茶肆、茶店、茶坊、茶樓、茶邸等，明代以後被稱為茶館。茶館具體產生於何時尚無法確定，最初期可能是以銷售茶水的攤販或個人的形式出現<sup>6</sup>。最早關於茶館的確切記載是唐代封演《唐氏聞見記》的記載<sup>7</sup>，這一時期單純販賣茶水的茶館之外，茶館多與邸店等共同經營。進入宋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全國流動人口的增加等諸多因素促進了餐飲業的發展。隨著飲茶法的改良，制茶技術的進步，佛教特別是禪宗的飲茶習慣影響的擴散，宋代飲茶之風進一步盛行，飲茶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同時促進了茶館的發展。順應當時人們追求娛樂、交流的需求，茶館開始承擔更多的社會功能，成為以飲茶為中心的重要交流空間。

對宋代茶館的研究在 2000 年以後迅速增加。首先是茶館發展史的相關研究，涉及宋代茶館的特徵和其歷史地位的相關問題。其中劉學忠<sup>8</sup>、劉清榮<sup>9</sup>、王春華<sup>10</sup>等學者從整體上論述了中國茶館的發展。其次，是關於宋代茶館的基礎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茶館的類型、經營內容、社會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另外，還有從餐飲業、娛樂空間、文學作品中的茶館的形象等方面論述茶館及其在宋代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的成果。還有一部分關於宋代茶館的研究則包含在茶文化的研究之中，如陳文華<sup>11</sup>、丁以壽<sup>12</sup>等學者在論述茶文化的著作中把茶館作為茶文化的一部分進行過相關的論述。關於宋代茶館的具體研究狀況如下：

### 1、宋代茶館的類型、經營內容、發展原因研究

宋代茶館的研究從茶館的基本類型、經營內容、社會功能等方面入手，取得豐碩的成果，通過這些研究可以對宋代茶館有基礎的認識。蔣力<sup>13</sup>、王俊奇<sup>14</sup>、楊永兵<sup>15</sup>等學者的研究都屬於這類型的成果。

劉清榮<sup>16</sup>則對宋代茶館的類型、經營、社會功能做出比較明確的總結。其中對宋代茶館的發展盛況作如下闡述：宋代茶館分為多種類型，有茶水販賣茶館（賣茶水為主業的茶館）、娛樂茶館（茶館中進行講談和演奏音樂）、妓女茶館（以飲茶為名實為妓院）、行業茶館（同行的行老們聚集並交換工作信息的地方）等。宋代不僅茶館的數量和類型增多，茶館的分佈範圍也很廣，除大城市以外鎮市也分佈了很多茶館。酒店、食店等餐飲業（分茶店、分茶肆）也兼賣茶水這一點也體現了茶館的流行。其對宋代茶館的經營特色概括如下：數量多、規模大、分

<sup>5</sup> 劉學忠《中國古代的茶館》，《社會科學戰線》第 5 期，1994 年，第 120-124 頁。

<sup>6</sup> （唐）陸羽《茶經》，沈冬梅校注，中華書局，2021 年，第 77 頁。

<sup>7</sup>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趙貞信校注，中華書局，2005 年，第 51 頁。其中記載：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禪師，大興禪教，……人自懷挾，到處煎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

<sup>8</sup> 劉學忠《中國古代的茶館》，《社會科學戰線》第 5 期，1994 年，第 120-124 頁。

<sup>9</sup> 劉清榮《中國茶館形制、功能的演變與前瞻》，《農業考古》第 6 期，2009 年，第 193-200 頁。

<sup>10</sup> 王春華《我國茶館功能發展和變遷》，《貴州茶葉》第 3 期，2014 年，第 52-53 頁。

<sup>11</sup> 陳文華《中國茶文化學》，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 年。

<sup>12</sup> 丁以壽《中國茶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年。

<sup>13</sup> 蔣力《宋代的茶肆》，《商業文化》第 0 期，1994 年，第 50-51 頁。

<sup>14</sup> 王俊奇《宋代的茶肆》，《文史雜誌》第 3 期，1999 年，第 78-79 頁。

<sup>15</sup> 楊永兵《試論宋代茶館的功能》，《農業考古》第 2 期，2004 年，第 181-184 頁。

<sup>16</sup> 劉清榮《宋代茶館的論述》，《中州學刊》第 3 期，2006 年，第 189-192 頁。

佈廣等特點，顯示了茶館的蓬勃發展、多樣的經營特色，也顯示出茶館豐富的經營內容。茶館採用的是雇傭制度，並出現了名為茶博士的專業技術行業。茶館分為不同的類型也表明茶館的發展朝著一定的專業化方向發展。另外，根據消費者的不同需求，不同類型的茶館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茶水的種類繁多且隨季節變化供應。賣茶是茶館的主要經營內容，但也有與旅館和浴堂等共同經營的情況。另外，宋代茶館內還引入音樂演奏、說書、下棋、賭博等娛樂活動以增加茶館的競爭力，並以此進行品牌構建和形象宣傳。對宋代茶館盛行的原因總結為：宋代茶產量的增加和制茶技術的進步，皇帝以及上層社會對飲茶風潮的引領，宋代城市商業經濟的高度發達等。楊永兵<sup>17</sup>則概括總結了茶館的休閒娛樂、資訊交換與傳播、商務交易、展示與培訓、會友、吸納貧民就業等六個方面的社會功能。

以上論文對宋代茶館的類型、經營內容、社會功能、盛行的原因等進行了較全面的論述，同類型的其他研究成果基本上未超越以上論文的論述範圍。

## 2, 宋代茶館的社會功能研究

通過上述以劉清榮論文為代表的研究成果，宋代茶館的類型、經營內容、發展原因等宋代茶館的基礎信息已基本明瞭，另外一些研究則著眼於宋代茶館的多個方面來論述，如茶館在飲食業中的位置、娛樂空間、文學作品中茶館的形象等。

### (1) 飲食業

有不少研究從宋代飲食業論述宋代茶館的作用。例如，鐘金雁<sup>18</sup>對宋代兩京的飲食業進行論述時，將其分為高檔酒樓茶館、中低層食店和糧食、蔬菜、肉類、魚等供應食材的市場和商行這三個檔次。其中高檔茶館和酒樓被視為引領社會飲食風俗的存在。此外，侯彥喜<sup>19</sup>在論述宋代飲食文化時，介紹了宋代宮廷飲食、宋代城市飲食、文人飲食與文化、宋代飲茶與飲酒文化以及節日飲食等內容，將茶館視為城市飲食的重要場所。此外，遊彪<sup>20</sup>、劉芳心<sup>21</sup>、劉樹友<sup>22</sup>等學者也論述了茶館在餐飲業中的作用及其概況。這些研究表明宋代茶館在飲食業中佔有重要地位，在宋人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 (2) 音樂

還有一些研究則從音樂的發展方面闡述茶館的作用或茶館中的音樂形態。何麗麗<sup>23</sup>的研究就在闡述市井音樂形成與發展原因的基礎上，將酒館、茶坊演奏的音樂作為市井音樂的一部分對其形態進行了考察。宋代音樂中心由宮廷轉移到民間，眾多宮廷音樂中融入民間音樂從而促使了市井音樂的出現，而宋代市井音樂形態則包含瓦子音樂、酒肆茶坊音樂、民俗節慶音樂、流動演出音樂等幾種藝術形式。此外，李文正<sup>24</sup>在闡述宋代民間娛樂活動與音樂形態的基礎上，指出宋代音樂的形式呈現出商業化、專業化、世俗化的特徵，酒館、茶坊演奏的音

<sup>17</sup> 楊永兵《試論宋代茶館的功能》，《農業考古》第2期，2004年，第181-184頁。

<sup>18</sup> 鐘金雁《宋代兩京飲食業析論》，《雲南教育學院學報》第14卷第4期，1998年，第35-40頁。

<sup>19</sup> 侯彥喜《宋代飲食文化初探》，《開封大學學報》第18卷第1期，2004年，第13-19頁。

<sup>20</sup> 遊彪《宋代商業民俗論綱—以城市餐飲業為中心的透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5年，第94-102頁。

<sup>21</sup> 劉芳心《宋朝京都飲食業經營特色淺論—以酒樓、茶坊為例》，《開封教育學院學報》第31卷第2期，2011年，第8-10頁。

<sup>22</sup> 劉樹友《宋代兩京飲食服務業發展原因及概況》，《渭南師範學院學報》第27卷第3期，2012年，第120-124頁。

<sup>23</sup> 何麗麗《宋代市井音樂文化的形成與形態》，《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6年，第33-37頁。

<sup>24</sup> 李文正《宋代民間娛樂活動中的音樂表現形式及特徵》，《中州學刊》第11期，2014年，第135-137頁。

樂也是民間娛樂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

### (3) 商品經濟的發展

從商品經濟發展方面探討宋代茶館問題的研究也有所增加。李春棠<sup>25</sup>論述了宋代商品經濟發展與茶館發展的密切關係，通過考察宋代茶館、酒店的發展，來說明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狀況。從經濟方面考察宋代社會文化等內容的研究在 2000 年以後有所增加。余江寧<sup>26</sup>就將娛樂視為消費的一種，對宋代豐富娛樂活動的參與者進行考察。與其同樣將娛樂作為消費的一種來看待並進行考察的還有秦開鳳<sup>27</sup>，其對教育消費、娛樂消費、宗教信仰消費和藝術品消費進行了詳細考察，明確了在茶館進行的娛樂活動消費是宋代人日常消費的一種。除此之外，錢慧<sup>28</sup>則考察了茶館中出現的音樂經濟現象，將茶坊中演奏的音樂分為宣傳性音樂和服務性音樂兩大類。雖然這兩種類型的音樂其目的都為促銷，但二者形式有所不同，前者是大聲喊叫邀請客人，後者則以演奏音樂為經營特色從而吸引客戶。但都成為音樂經濟的構成部分，顯示了音樂和商品經濟的結合。

### (4) 信息傳播

關於茶館本身功能的研究中，就有相關研究論述了茶館在信息傳播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唐國鋒<sup>29</sup>則探討了宋代茶館與商業信息傳播之間的關係，揭示了宋代茶館是商業信息聚集、快速傳播的場所。其中引用《東京夢華錄》卷二<sup>30</sup>和《夢梁錄》卷十九<sup>31</sup>的記載論述茶館中行老聚集，把握勞動情報的情況，並指出以這些行老為媒介，茶館發揮了信息傳播的社會功能。除此之外，在相田洋<sup>32</sup>的考察中指出茶館作為一種通信機關進行信息傳播。陸遊的《老學庵筆記》<sup>33</sup>卷三中記載了秦檜孫女的愛貓走失，為了尋找走失的愛貓，就在各地茶坊張貼愛貓的肖像畫進行尋找的故事。這個故事印證了宋代茶館同樣具有的信息傳播的功能。

### (5) 勞動仲介

茶館經常與牙行等仲介行業兼營，也是行老們聚集的地方。于志娥·任仲書<sup>34</sup>對城市中的勞務市場和鎮市農村的勞務市場和其特徵、形態進行了詳細的考察，指出宋代城市中的勞務市場有以牙人為中心的勞務市場；橋樑、街道、市口形成的勞務市場；人情茶中的勞務市場；提供專業性個別服務的機構<sup>35</sup>這四種勞務市場。

### (6) 文學研究

<sup>25</sup> 李春棠《從宋代的酒店茶坊看商品經濟的發展》，《湖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1984 年，第 100-107 頁。

<sup>26</sup> 余江寧《論宋代京城的娛樂活動與城市消費》，《安徽教育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2 期，2004 年，第 29-32 頁。

<sup>27</sup> 秦開鳳《宋代文化消費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9 年。

<sup>28</sup> 錢慧《宋代茶坊經營中音樂促銷的形式與特點——對宋代音樂經濟現象的個案解析》，《西安音樂學院學報》第 34 卷第 3 期，2015 年，第 53-58 頁。

<sup>29</sup> 唐國鋒《宋代茶坊與商業資訊傳播》，《農業考古》第 5 期，2007 年，第 141-144 頁。

<sup>30</sup> “人情茶坊，本非以角部茶湯為正，但將此為由，多下茶錢也。又有一等專種是娼妓兄弟聚處，又有一等專科是諸行借貸人會聚行老處，所謂的市頭。”

<sup>31</sup> “凡雇用請人能力及幹當人，如解庫掌事，貼窗鋪席位。某官員士夫等人，欲出路，還除，上官，赴任，遊學，亦有出陸行老，顧請腳夫腳從，承攬在途服役，無有失節。”

<sup>32</sup> 相田洋《橋と異人 境界の中國中世史》，研文選書，2009 年。

<sup>33</sup> （宋）陸遊《老學庵筆記》，《全宋筆記》第五編第八冊，大象出版社，2012 年。

<sup>34</sup> 於志娥·任仲書《宋代勞務市場發展狀況研究》，《哈爾濱學院學報》第 34 卷第 4 期，2013 年，第 93-98 頁。

<sup>35</sup> 於志娥·任仲書（2013 年）指出：提供專業個別服務的機構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司六局和凶肆。四司六局是為開辦宴會提供專業服務人員，並提供宴會需求之物為租用服務的機構，它通常是由官府籌辦。凶肆則是提供葬禮服務的機構，舉行葬禮時，可向其租用需求的用具和人員。

除了歷史學之外，從文學方面可以看到以茶館為研究對象的成果。岡本不二明<sup>36</sup>就探討城市中的犯罪-美人局。並指出美人局是巧妙地利用被害人好色這一弱點的智力犯罪，一般有複數的共犯進行有組織有計畫的犯罪，是屬於都市型的犯罪。這類犯罪的出現與宋代發達的商業和瓦子、茶館、妓院的繁榮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繫。羅陳霞<sup>37</sup>和梅東偉<sup>38</sup>則討論了文學作品中茶館、酒館的形象。在話本小說中，茶樓酒樓經常被用作故事展開的空間，包含了失意的士子在茶館中出人頭地，在茶館酒樓裏與故人相見，在茶館中行騙等故事。例如，馮夢龍的小說《喻世明言》卷十一《趙伯升茶遇仁宗》和《警世通言》卷六《俞仲舉題詩遇上皇》都講述了失意的士子在茶館與皇帝相遇，通過談話得到皇帝的認可，並以此為契機出人頭地。出現這種文學現象的原因是宋元時期茶館酒樓與說唱文學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繫。因此，故事中的茶館酒樓通常給人以三教九流<sup>39</sup>，神怪聚集的印象。

### (7) 社會生活

從與宋代社會生活的關係方面，對宋代茶館進行概括性論述的有伊永文<sup>40</sup>、謝和耐<sup>41</sup>兩位學者。沈冬梅<sup>42</sup>則對茶在社會生活中的角色或定位進行了研究，從宋代茶藝(茶製造、飲茶方法、茶具)、茶與宋代政治生活、茶與宋代社會生活(日常生活、宗教生活、社會中關於茶的觀念)、茶與宋代文化(茶書、詩詞、書法、繪畫)等方面論述了茶在宋代生活中的重要性。例如，在宋代將對大臣、將校士兵、僧侶、道士、平民和四裔的賜茶進行了制度化，並確定了政府慣例的茶禮儀<sup>43</sup>。另外，其研究對茶在日常生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也進行了總結。宋代與茶相關的生活習俗包括以下內容：以茶招待客人；以飲茶和茶作為鄰里交往的媒介；從親親到舉行婚禮，茶禮被融入婚姻禮儀中；與飲茶相關的禁忌出現(如服喪期間飲茶不用茶託的習俗)；茶和飲食業的兼營等。其研究中還論述了茶與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與宗教生活的關係。在宋代文人們舉辦以交流為目的的茶會，然而，最初正式的茶會就是文人們為了與佛教僧侶們討論佛學和詩詞而舉行的。而茶與佛教之間的密切聯繫則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飲茶成為生活在寺廟裏的僧侶生活的一部分；茶成為祭拜佛像的祭品；成立助緣傳道的茶湯會；茶成為僧侶與文人士大夫交往的媒介；茶是寺院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茶和道教之間也有很深的關係，如道教用茶表示神跡；使用茶作為祭品；神的生日獻茶等。其研究揭示了茶對宋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禮儀、生活、政治生活、文學、宗教)有著深刻影響，宋代茶館與市民日常生活的聯繫日益密切，還對不同類型茶館的功能、茶館中人們的活動進行了探討，揭示茶館大眾化的趨勢。

也有學者對宋代茶館與賭博場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紀昌蘭<sup>44</sup>指出宋代賭場大都與茶館、

<sup>36</sup> 岡本不二明《唐宋の小説と社會》，汲古書院，2003年。

<sup>37</sup> 羅陳霞《宋代小説與宋代民間商貿活動研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21年。

<sup>38</sup> 梅東偉《宋元小說話本中茶坊酒肆的文學形象與意義》，《中原文化研究》第4期，2016年，第123-127頁。

<sup>39</sup> 三教指佛教、道教、儒教。九流是指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雜家、農家、縱橫家、陰陽家。此外，九流是指各種職業的人。

<sup>40</sup> 伊永文《宋代市民生活》，中國社會出版社，1991年。

<sup>41</sup> 謝和耐1938年著/劉東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譯本。

<sup>42</sup> 沈冬梅《茶與宋代社會生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sup>43</sup> 根據沈冬梅(2007)的論著，政府常規的茶禮儀包括：祭奠茶禮儀，即在祭祀祖先時以茶果等祭祀、先皇帝後忌日時以茶祭奠、國喪和外國喪禮時對外國使者進行賜茶的禮儀；常規的茶禮儀：如天子誕辰向大臣賜茶、巡幸時向百姓賜茶、閱武後向將士賜茶，向初授翰林學士的大臣賜茶、使臣覲見辭別時賜茶等等；賞賜性茶禮儀：如學士抄國史賜茶、進書賜茶；政府的茶禮：如都堂點茶，即在日常公務中慣例的茶款款待、另外在唐代存在的省試具茶湯，即對參加科考的舉子提供茶湯的習慣則在宋代被取消。

<sup>44</sup> 紀昌蘭《試論宋代社會的賭場與賭風》，《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第2期，2016年，第19-26頁。

酒樓、妓院等兼營，並對賭場的經營以及官府對賭場的取締進行了考察。在論文中引用《松漠紀聞》中所記載的“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揭示了茶館和賭博場之間的深切關聯。

宋代茶館與浴堂的關係也頗受學界關注。劉盈娟<sup>45</sup>總結了宋代浴室的種類並將其大致分為五大類，一是位於城市和鎮的商業性質浴室；二是家庭中設置的浴室；三是書院設置的浴室；四是寺院、道觀設置的宗教浴室；五是設置在官舍和機構的浴室。而在茶館設置的浴室則是商業浴室的一種，在其論述中以《夷堅志》中的《京師浴堂》一則為例，講述了從地方來開封的官員在茶館休息的時候，遭遇殺人劫財的危機的故事。作為故事背景的茶館中就設置了浴堂，展示了茶館和浴堂的關聯性。

### 3, 宋代茶館的空間研究

#### (1) 娛樂空間

也有一些研究從娛樂空間和娛樂內容對茶館進行分析。馬歡歡<sup>46</sup>在考察北宋開封的娛樂業時，將開封的娛樂空間分為瓦子勾欄這樣的綜合性娛樂場所、兼有娛樂經營的酒樓、茶館等設施和慶典、節日、廟會這樣的集市這三大類。然後對這三種娛樂空間進行了詳細的分析，除了指出作為這些空間之一的茶館經營內容豐富，使用者身份多種多樣外，還指出宋代茶館更講究娛樂性和實用性。李簡<sup>47</sup>指出在社會文化活動日趨活躍的情況下，宋代文人士紳是瓦子勾欄、茶館酒樓娛樂生活的重要參與者，並對其參與方式、參與內容、參與程度及其對宋代城市娛樂產生的作用以及文藝的發展與茶館的關係進行探討。李簡在論述中指出宋代茶館、酒樓中，文人士紳參與音樂、文藝、演唱等娛樂活動，因此茶館、酒樓成為城市中重要的演出場所。另外，在於天池·李書<sup>48</sup>的論述中指出在宋代茶館酒樓中經常進行文藝演出，並且文藝演出場所主要集中在茶館酒樓和瓦子勾欄。與其說茶館酒樓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入的空間，不如說茶館中的文藝演出按照城市中觀眾的喜好而發展。陳凌<sup>49</sup>對茶館酒樓和瓦子勾欄這種娛樂空間流行的原因也做出了類似的推論，並指出這種現象促進了文化娛樂的商品化和世俗文化的繁榮。

以上這些研究表明，在宋代茶館是一個重要的娛樂活動空間，其中開展的娛樂活動多種多樣，茶館的發展以及茶館中開展娛樂活動的形式，影響了宋代社會及文化娛樂活動的發展。

#### (2) 公共空間

近年來也可以看到從社會學中公共空間的視角對茶館進行研究的成果，研究對象主要為清末民初的茶館。如李曉南<sup>50</sup>、王笛<sup>51</sup>就把茶館的空間看做公共空間。而相田洋則從“境界”的角度定位茶館。所謂“境界”，是指在原本的空間和時間上做記號，將內和外分開，張弛有度的觀念裝置。這種“境界”觀念根據時代不同表現各異，其表像和兩儀的性格則是其超越時代超越文明的共同點。茶館作為“境界”是連接內部和外部的邊界線。人們一起床不洗

<sup>45</sup> 劉盈娟《宋代浴室種類初探》，《鄭州師範教育》第4卷第4期，2015年，第81-86頁。

<sup>46</sup> 馬歡歡《北宋開封娛樂業研究》，華東師範大學修士論文，2012年。

<sup>47</sup> 李簡《宋代城市的演藝場所與文人之參與—從瓦子勾欄、酒樓茶肆談起》，《長江學術》第4期，2013年，第49-51頁。

<sup>48</sup> 於天池·李書《宋代說唱伎藝的演出場所》，《文藝研究》第2期，2006年第87-93頁。

<sup>49</sup> 陳凌《論宋代城市文娛場所興盛的原因及影響》，《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8年，第316-318頁。

<sup>50</sup> 李曉南《從城市公共空間的角度看今昔茶館文化變遷》，《社會科學輯刊》第1期，2004年，第35-40頁。

<sup>51</sup> 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 1900-195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臉就去茶館，聚集在茶館一邊聊天一邊喝茶，此時的茶館作為一種通訊機構傳播著信息，在舊中國城市居民和鄉村中上流人群日常生活中佔據了重要位置。茶館具有的“境界”性格與邸店、浴室具有共同的性格且二者之間具有緊密的聯繫。茶館的本質是邊界，其邊界具有不屬於任何地方的特性。因此，茶館被認為是向“三教九流”萬人開放的空間、公共領域。

徐軻<sup>52</sup>將宋代茶館也視為公共空間，對茶館的分佈進行詳細梳理的同時，對宋代茶館的發展歷程進行了考察。並指出宋代商品經濟的發達、城市人口的龐大、流動人口的增加、娛樂時間的增加、飲茶風俗的盛行、茶業經濟的發達推動了宋代茶館的發展，進而茶文化的擴大和下層民眾熱切期待娛樂的需求必然結合在一起，創造了茶館的“公共空間”。

### (3) 宋代茶館的分佈空間與城市空間

宋代城市空間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有部分涉及到茶館的分佈空間。斯波義信<sup>53</sup>在對江南的經濟研究中將臨安城空間按其生態形態劃分為商業區、官紳區、軍營區等區域，並進一步分析城市史料，繪製瓦子、茶肆、酒樓、寺院等設施位置復原圖。根據其研究，臨安城空間分佈情況大致如下：官廳、皇族宅院、御園等設施主要分佈在宮城-崇新門-豐豫門區域及御街西部，也位於御街北端東部區域、餘杭門周邊區域、西湖北岸和南岸沿岸等區域。軍營主要地處御街北端東部區域、外城菜市河東部區域、西湖西岸沿岸區域、外城大運河西部區域，另外在吳山及周邊區域也有軍營分佈。臨安的娛樂設施位置主要在朝天門北部和御街西部區域。臨安的經濟中樞區是朝天門至韓世忠宅之間沿御街的細長區域，臨安的娛樂設施分佈與該經濟中樞區基本重合。根據斯波義信的研究，茶館等娛樂設施主要分佈在官紳區、軍營區和經濟中樞區。另外，高橋弘臣<sup>54</sup>則主要對南宋臨安的空間形態及其變遷進行了詳細論述，同時明確了部分茶館的分佈。在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發展的觀點探討在城市空間中茶館這一分佈空間的形態，及其與城市空間的互動和相互影響的可能性。

綜上，宋代茶館研究成果頗為豐碩，研究視角主要涉及宋代茶館的經營內容、茶館的社會功能，及其社會功能所表現出來的社會風俗文化。就宋代茶館‘空間’研究而言，大多停留在物理空間層面的討論，系統性研究相對薄弱。筆者認為，宋代茶館研究還存在如下幾方面可進一步深入討論的課題。

首先，現有宋代茶館研究中在對史料的整理和使用方面存在問題。宋代茶館研究中主要使用的史料大致可分為《東京夢華錄》、《夢梁錄》、《西湖老人繁勝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等城市史料和筆記小說史料兩大類。城市史料中對宋代茶館的經營內容和類型以及社會功能都有全面的記載，許多研究利用這些城市史料對宋代茶館進行研究。另一方面，筆記小說史料中有補充宋代茶館類型和社會功能的記載。以宋代茶館個別經營內容和社會功能為線索考察宋代社會風俗文化的研究除利用城市史料外，主要使用筆記小說史料。這些研究在利用史料時，選取需要的部分，存在片面性且對史料內容的整理不夠充分。因此，研究宋代茶館應對史料進行全面梳理，根據其場所、登場人物、社會功能、時間等要素整理茶館的相關記載，並進行全面分析。

其次，在宋代茶館研究中，對茶館分佈空間的整理和研究不夠充分。雖然關於宋代城市空間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多，但對宋代茶館的分佈空間很少涉及，且大多集中於宋代茶館數量變化等問題的討論。關於茶館的分佈問題，斯波義信和徐軻論述中涉及了一些茶館的分佈問

<sup>52</sup> 徐軻《宋代茶館研究—以北宋的開封和南宋的臨安為中心》，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sup>53</sup> 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的研究》，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8年。

<sup>54</sup> 高橋弘臣《南宋臨安における空間形態と変遷》，《愛媛大學法文部論集》第33號，2012年，第1-40頁。

題，但只是對首都開封和臨安的茶館分佈進行了簡單的闡述，沒有進行全面的整理。因此，關於茶館的分佈空間，可以在對城市史料、筆記小說、地方誌、歲時記等史料的記載進行整理和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城市空間的研究，對茶館在城市空間中的具體形態問題進行探討。在斯波義信和高橋弘臣等學者研究基礎上，結合城市史料、筆記小說等史料記載可以對宋代首都茶館的分佈空間進行復原。

再者，已有的宋代茶館研究中較少探討茶館地域差異的問題。城市史料記載了首都開封和臨安茶館的情況。而筆記小說、隨筆等史料記載了首都、州、縣、鎮等各種檔次的茶館的情況。許多研究在使用這兩種史料時，不加區別地使用。因此，今後需要留意史料的差異，著眼於首都-地方、首都-州-縣-鎮，捕捉其在數量、經營內容、社會功能等方面的差異，對宋代茶館的整體狀況進行考察。

最後，大部分研究並未對宋代茶館的經營者和使用者的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大部分只停留在指出茶館用戶身份的多樣性的階段。除了考察經營者和使用者的身份外，還應考察他們對茶館的認識以及他們如何經營、利用茶館的問題。因此，需要全面的收集相關史料建立資料庫，對茶館的經營者和使用者進行更全面的分析。除此之外，還應該結合宋代茶文化的研究成果，利用筆記、文集及茶詩等史料闡明宋人對飲茶的態度。通過對以上關於茶館課題的研究，在建立豐滿且立體的宋代茶館形象的同時，嘗試通過宋代茶館研究來探索對宋代社會風俗文化新認識的可能性。

### 三，宋代茶文化與贈茶文化研究

#### 1，宋代茶文化研究

目前對於茶的研究可以說是成果斐然，余悅<sup>55</sup>將茶研究大致分作三類：茶學（屬自然科學）、茶業學（亦稱茶業經營學或茶葉商品學）和茶文化學（屬人文社會科學），即使是排除了茶學與茶葉學的研究，僅在茶文化學方面的研究就成果頗豐，研究內容也非常廣泛。現有的茶文化研究大多是對中國茶文化整體發展的研究。如王玲<sup>56</sup>就對中國茶文化的發展歷史及概況，中國茶藝及其精神內涵，茶與各族人民的生活、茶文化相關研究的介紹以及中國茶文化在世界上的傳播等方面的內容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和論述。丁以壽<sup>57</sup>從茶文化起源、復興的發展脈絡的視角進行了詳細論述。雖然關於茶文化的論著為數不少，但關於宋代茶文化的專著類成果較少，其中論述宋代茶文化內涵較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沈冬梅《茶與宋代社會生活》一書，書中對茶在宋代社會生活中的應用以及其引發產生的各種民俗文化現象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概括與論述，可以說是對宋代茶文化的全面整理和總結，對宋代茶文化的深入研究有著提綱挈領的作用。並且在史料的選取和運用方面呈現出多樣化，其研究中大量利用宋代繪畫資料和出土文物資料，生動形象的展示了茶在生活中的利用場景和宋代茶具、茶藝的獨特審美。但稍顯遺憾的對茶作為交往媒介這一重要的解讀宋代茶文化及社會文化的突破口的問題沒能進行深入探討。

##### (1) 宋詩中的茶文化研究

利用宋代茶詩來探討茶文化的研究中，高橋忠彥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高橋忠彥對

<sup>55</sup> 余悅《中國茶文化研究的當代歷程和未來走向》，《江西社會科學》第7期，2005年，第7-18頁。

<sup>56</sup> 王玲《中國茶文化》，九州出版社，2009年（初版出版時間為1992年）。

<sup>57</sup> 丁以壽《中國茶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

北宋的梅堯臣、歐陽修、蘇軾、黃庭堅、南宋的楊萬里、陸遊六位文學家的茶詩作品進行了整理和分析，並對其各自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對茶的形色味的審美傾向進行總結，由此來探討整個宋代茶文化的發展趨勢<sup>58</sup>。其中指出雖然北宋時期是團茶、點茶盛行的時代，但也有蘇軾、黃庭堅等對團茶的奢華進行批判。南宋時期具有壓倒性流行趨勢的團茶逐漸式微，出現了利用煎茶法飲用草茶的傾向<sup>59</sup>。關於飲茶法的流變高橋忠彥在《唐宋を中心とした飲茶法の變遷について》一文中已有論述，其中明確了從唐至宋到明清時期的飲茶方法的變遷，並指出在點茶法<sup>60</sup>流行的宋代煎茶法仍佔據一席之地。在此論點的基礎上高橋忠彥在《宋詩より見た宋代の茶文化》一文中對兩宋之間飲茶法的詳情與變化進行了探討。但以上對茶文化的探討，主要集中於對各個時期流行的茶的種類、飲茶方法和對茶的審美等方面。而之後高橋忠彥則通過對比白居易和陸遊所作茶詩中的對偶表現，展現了兩個時代不同的茶文化特質<sup>61</sup>。文中指出陸遊茶詩中所展現出的飲茶空間和場景更為廣泛，更多的表現出茶在社會文化方面的地位。《宋詩より見た宋代の茶文化》還只是注重茶藝和茶道本身的討論，在《白居易の茶と陸遊の茶—茶詩の対偶表現をてがかりとして》中則開始探討從唐至宋茶在社會文化中的地位及其變化。但二者都更注重對茶本身的探討，對由茶產生的社會文化現象未有涉及。像高橋忠彥一樣利用個別名人的茶詩作品來進行研究的成果也為數不少，如劉晗<sup>62</sup>則是以蘇軾為例，通過對其茶詩作品內容的分析來對北宋茶的種類、茶具、茶藝及士大夫對茶的審美情趣等進行了探討。還有揚之水<sup>63</sup>則通過搜索《全宋詩》和《全宋詞》中的茶詩與茶事論證了宋代分茶、點茶、鬥茶、點湯等茶事。以上研究其探討內容大多集中於對茶藝和對茶的審美等方面。

## (2) 士人交遊與茶文化研究

通過對茶詩內容的分析，探究其背後的人文生活社會文化等問題的研究也頗有成果，如王柳芳<sup>64</sup>就利用蘇軾，黃庭堅所寫的茶詩及贈答詩，對二人之間的淡薄寧靜但綿遠流長的友情進行了展現。鄧敏<sup>65</sup>則通過分析蘇軾等人的茶詩作品，論述了茶文化在文人生活和交際中的作用。還有對茶在文人生活中展現出來的重要作用的研究，李娟<sup>66</sup>把茶看作為文人展現自身生活情趣和消解自身負重生活的媒介。虞文霞<sup>67</sup>也對文人士大夫賦予茶的精神內涵進行了論述。以上都是圍繞著文人與茶之間關係展開討論的研究。但是其論述大都相對籠統，茶是在什麼情況下被怎樣利用的具體問題未能進行詳細的探討，且其焦點大多聚焦在文人生活中茶的作用。

## 2, 贈茶文化研究

關於宋代的贈茶，論述較為深刻的是合山究<sup>68</sup>《贈答品に関する詩にあらわれた宋代文人

<sup>58</sup> 高橋忠彥《宋詩より見た宋代の茶文化》，《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15卷，1991年，第61-122頁。

<sup>59</sup> 高橋忠彥《唐宋を中心とした飲茶法の變遷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09卷，1989年，第243-272頁。文中的對煎茶法的定義：煎茶法是將茶（茶葉或茶末）放入沸水中煮制，從而把茶的精華提取到湯中的飲茶方法。

<sup>60</sup> 根據高橋忠彥（1989）的論述：點茶法是將末茶放入容器中，並從上方注入開水然後進行攪拌，並將茶和湯同時飲入的飲茶方法。

<sup>61</sup> 高橋忠彥《白居易の茶と陸遊の茶—茶詩の対偶表現をてがかりとして》，《東京學芸大學紀要人文社會科學系》第66卷，2015年，第80-98頁。

<sup>62</sup> 劉晗《從蘇軾茶詩看北宋茶文化》，《農業考古》第5期，2019年，第102-107頁。

<sup>63</sup> 揚之水《兩宋茶詩與茶事》，《文學遺產》第2期，2003年，第69-80頁。

<sup>64</sup> 王柳芳《從蘇黃茶詩看北宋文人的友情》，《農業考古》第5期，2006年，第184-187頁。

<sup>65</sup> 鄧敏《宋代文人的茶詩生活與交誼—以蘇軾及同時代人為視點》，南昌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

<sup>66</sup> 李娟《茶，宋代文人社會交往的媒介》，《農業考古》第5期，2006年，第49-53頁。

<sup>67</sup> 虞文霞《一枝一葉總關情——宋代士人與茶文化淺談》，《農業考古》第2期，2008年，第43-50頁。

<sup>68</sup> 合山究《贈答品に関する詩にあらわれた宋代文人の趣味的交遊生活》，《中國文學論集》第2卷，1971

の趣味的交遊生活》一文，文中指出從宋代開始流行作詩贈物的風俗，並成為文人交遊不可或缺之物。文章在對北宋文人贈答詩整理基礎上，對詩中所展現的文人情趣及其原因進行論述，認為北宋時期商品經濟的發達、獻遺之風盛行的同時，文人對文房用具、書畫金石及古董等體現文人情趣的物品的鍾愛，成為贈答風俗得以流行的重要推動因素。此文對作詩贈物背後的社會文化等因素的探討非常深入，但稍顯可惜的是文中選取了梅堯臣、蘇軾、黃庭堅三人為主要事例進行分析，重點對文人趣味進行了論述，並沒有對整體士大夫的贈答行為進行分析，因此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另外，未能對南宋時期的相關問題進行後續的探討，以觀察兩宋之間社會文化的變遷。

綜上所述，宋代茶文化的研究雖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還存在一些討論不足之處。筆者認為對於宋代茶文化研究還有以下幾點可以進行深入研究的課題。一，是史料相關的問題，關於茶文化的史料比較分散且種類繁雜，有詩詞、筆記、茶書等，在使用這些史料時也不能集中精確地利用。另外，對書信史料缺乏發掘，書信史料相較於詩詞而言，其中關於茶的信息更為清晰直接，並且包含了豐富的茶文化相關信息，能夠更加有效地對茶背後的社會文化現象進行解讀和分析。因此對史料進行總結和整理，並進行宏觀性的數據分析也是茶文化研究能夠繼續深入的重要課題。二，兩宋之間茶文化的是否發展與變化的問題，關於此問題雖然有研究涉及，但遺憾的是其研究或專注於對茶藝的探討，或只對北宋時期的茶文化進行探討。大部分茶文化研究都未將北宋和南宋分別開來進行深入的探討，繼而瞭解兩宋之間的社會生活及文化的發展脈絡。分別梳理和總結兩宋時期茶文化相關史料，然後進行分析和探討也是深入研究茶文化的方向之一。三，關於茶作為與人交往的媒介這一論點，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是非常重要的，是探討宋代茶文化的發展及其特徵的重要突破口之一。因此，如果能對此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 and 探討，則能更深入的瞭解到宋代社會生活文化的詳情及發展特徵。但相關研究大多停留在鄰里交往待客要用茶作為招待、僧人與士大夫交往需要習茶藝、文人之間以茶詩贈答，茶有了交往媒介的作用這樣的簡單分析和論述上。因此，利用作為交流媒介的書信和贈答詩為線索，對宋代盛行的士大夫之間的贈茶行為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探討，則是深入研究茶文化及背後所蘊含的社會文化變遷的一把鑰匙。

#### 四，宋代茶會的研究

目前關於宋代茶會的研究成果較少，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茶會本身的發展和類型研究。如對茶會、茶宴的發展歷史進行梳理，並對唐代、宋代、明清茶會茶宴的總體印象進行總結<sup>69</sup>。另一類則關注於士人之間雅集性的茶會，對茶會中展現出來的文人雅趣進行詳細的論述<sup>70</sup>。此外，在士人交遊的研究中，茶會作為雅集的一種也略有涉及<sup>71</sup>。總體來看，大多數相

---

年，第 23-47 頁。

<sup>69</sup> 陳文華《我國古代的茶會茶宴》，《農業考古》第 5 期，2006 年，第 160-163 頁。陳剛俊《宋代茶宴述論》，《農業考古》第 5 期，2016 年，第 68-71 頁。對宋代茶宴興盛的背景（對唐代宮廷茶宴、文人茶宴、禪寺茶宴的繼承和發展）、宋代茶宴的類型（酒席茶宴、鬥茶茶宴、禮儀茶宴）、宋代茶宴對後世詠茶文學和茶藝的影響等內容進行了總結。

<sup>70</sup> 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 年。楊曉靄《雅宴茶香笙歌闌——宋代士大夫的茶會情趣與茶詞歌唱》，《古典文學知識》第 2 期（總第 167 期），2013 年，第 60-67 頁。鮑志成《論“徑山茶宴”及其傳承與流變》，《第十二屆國際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2012 年，第 228-229 頁。段瑩·鄭慕蓉·王斌·李曉軍《茶會的起源與發展概述》，《茶葉通訊》第 41 卷第 2 期，2014 年，第 43-45 頁。

<sup>71</sup> 梁建國《朝堂之外：北宋東京士人交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其中詳細的考察了北宋士人在朝堂之外，拜謁、走訪、宴飲、雅集、送別等活動，並對這些士人活動與政治制度、文化習俗以及都市空間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行思考，指出士人交遊廣泛彌散於朝堂之外的廣泛空間，和士人的在京生活和仕途密切聯繫。

關研究對茶會的論述相對簡略，對舉行茶會的場所，舉行茶會的具體場景，以及在茶會的具體交流內容，茶會參與者的身份和互相之間的關係等問題未進行深入的探討。另外，忽略了士人日常生活中的會茶。在宋代飲茶成為士人生活方式的一種<sup>72</sup>，士人之間日常性的會茶更加廣泛存在，並作為交流的媒介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因此，可以利用宋代士人的筆記（主要為《全宋筆記》），對其中關於茶會的相关史料進行整理，並結合詩文、書信、地方志等史料，梳理出茶會的具体参与者、举办时机、举办场所及茶會的具体交流內容等。通过对以上內容的梳理，详细探究宋代士人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是如何以茶和茶會為媒介进行私人交游（与友人、与家人、与同好、与同僚、与僧侶）活動的。另一方面，对行宮·台省·府治等官司及太學·縣學·書院等教育設施內所設固定會茶空間形态和作用进行論述的同时、以宋代士人参加茶會并对政治·思想·文学进行交流讨论为线索探讨宋代士人关系网络的维系和发展。以此解明以茶和茶會為媒介所构建出的在宋代士人的日常政治生活、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交流空間。

## 五、本文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

上述內容對宋代茶館、士人之間流行的贈茶文化以及茶會等以茶為中心的社會文化現象和文化活動的相關研究進行了梳理，並對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總結。本文將結合上述成果和問題點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宋代以茶為媒介展開的交流空間進行論述。

### 1、研究視角

關於茶館和茶文化的相關研究已經取得豐碩的成果，但是對於其作為媒介在交流方面發揮的作用還尚未被充分的研究。因此本文則參考“空間”論這一研究方法和視角，從交流空間視角入手，以茶和相關文化現象為切入點，對宋代茶館本身的空間性質，以及其在都市空間中的存在形態和特徵進行分析，從而對茶館這一交流空間對宋人日常生活、城市空間內的信息交換和傳播、甚至於對宋代社會文化交流和傳播等方面產生的作用和影響進行探討。另外，對區別於物理空間的贈茶文化和茶會等以茶為媒介的文化活動和現象進行研究，並注意到宋代官司機構中設置固定會茶空間這一現象，對其形態和性質進行分析，由此探討其作為交流媒介對宋代士人的交遊網絡所產生的影響以及由此所構造出的交流空間。

### 2、研究方法

結合上述相關問題，本文將搜集相關史料進行全面的整理和分析，對《東京夢華錄》<sup>73</sup>、《夢梁錄》<sup>74</sup>、《都城紀勝》<sup>75</sup>、《武林舊事》<sup>76</sup>、《西湖老人繁勝錄》<sup>77</sup>等代表性城市史料、

---

黃寬重《交遊酬唱—南宋與元代士人的蘭亭雅集》，《唐宋歷史評論》（第2輯），2021年，第212-235頁。其中對蘭亭雅集形式內涵的發展變化進行了考察，指出由於唐宋科舉取士，士人新興群體崛起，南宋士人的人際往來頻繁，聚會繁多，因此南宋的雅集聚會發展出多種形式，同僚同年通過各種名目進行聚會。

<sup>72</sup> 水野正明《宋代における喫茶の普及について》，宋代史研究會研究報告第二集《宋代の社會と宗教》，汲古書院，1985年，第193-224頁。

<sup>73</sup>（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全宋筆記》第五編第一冊，大象出版社，2012年。

<sup>74</sup>（宋）吳自牧《夢梁錄》，《全宋筆記》第八編第五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

<sup>75</sup>（宋）耐得翁《都城紀勝》，《全宋筆記》第八編第五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

<sup>76</sup>（宋）周密《武林舊事》，《全宋筆記》第八編第二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

<sup>77</sup>（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錄》，《全宋筆記》第八編第五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

《全宋筆記》<sup>78</sup>、《全宋文》<sup>79</sup>、《全宋詩》<sup>80</sup>中相關史料進行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建立數據表格進行計量史學的分析，並與都城研究相結合，將茶館在城市空間中的具體分佈進行復原，對其呈現出的茶館、茶文化的普遍性進行分析的同時，結合代表性史料對其特徵進行詳細分析。

### 3, 史料

首先，本文研究茶館的相關問題時，在整理和利用城市史料和筆記小說史料時，注意二者之間存在的差異性，及由此產生的異同。平田茂樹指出城市史料和筆記小說史料之間存在差異，前者是從靜態的角度描述首都的茶館，而後者具有動態的視角，意識到這種差異性則能看到宋代茶館研究的更多可能性<sup>81</sup>。而這種差異性則具體表現在對茶館的文字記載上，茶館相關的城市史料概括性的記述了茶館的整體形象，對各種類型的茶館進行了總結性的記載，是茶館研究的重要史料。但是，其中沒有對人們如何利用茶館、茶館如何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的詳細描述。而筆記小說作為社會史史料和歷史史料的可行性和價值性，須江隆<sup>82</sup>和塩卓悟<sup>83</sup>兩位學者也已經進行了論述。可以說筆記小說是生動反映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和風土人情的史料，其中的茶館相關史料多記述了以茶館為舞臺所發生的故事，通過這些故事能更生動直接的認識茶館與人的關係，以及茶館在社會生活中所充當的角色。所以本文對茶館相關史料進行全面的整理，對城市史料和筆記小說史料分別加以應用。

其次，在探討贈茶文化和茶會的相關問題時，對作為交流載體的書信史料進行了發掘。利用宋詩進行茶文化研究的成果豐厚，而利用書信對茶文化進行探討則未有研究涉及。書信史料中記載了對茶的評價，體現了贈茶文化的流行。對書信史料的發掘與利用也是現在宋史研究的一個潮流與趨勢，平田茂樹就明確指出了現今宋史研究關注點向社會史、文化史轉移，並展現出利用書信、日記、題跋、序等史料進行交遊和人際網絡研究的新的發展態勢。在其研究論文中以魏了翁等人的事例為線索，詳細的闡述了士大夫們怎樣以書信為媒介構築了共同的“知”<sup>84</sup>。對怎樣利用書信史料進行了研究做了很好的示範。

### 4, 時期、地域差異

很多研究忽略了兩宋之間茶館以及茶文化發展變化的可能性。北宋至南宋，由於時間上的跨度，以及社會變動的影響，茶館以及茶文化本身也在發展。因此筆者認為想要全面的瞭解宋代茶館及贈茶文化，則需要把南宋和北宋的情況分開來討論。另外，茶館以及茶文化的發展可能存在地域特徵，因此，本文將對首都-地方的茶館分別進行考察並進行對比和總結<sup>85</sup>。

<sup>78</sup> 本文所用《全宋筆記》版本為：大象出版社出版版本。

<sup>79</sup> 本文所用《全宋文》版本為：曾棗莊、劉琳、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全宋文》，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sup>80</sup> 《全宋詩》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整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sup>81</sup> 平田茂樹《從城市史料和筆記小說的比較來看宋代的茶館》，《清華學報》第48卷第2期，2018年，第357-386頁。

<sup>82</sup> 須江隆《アジア遊學181 社會史史料としての〈夷堅志〉—その魅力と宋代社會史研究への新たな試み》，《南宋の隠れたベストセラー〈夷堅志〉の世界》，勉誠出版社，2015年，第75-90頁。

<sup>83</sup> 塩卓悟《歴史史料としての〈夷堅志〉—その虚構と史実》，《中國筆記小說研究》第6號，中國筆記小說研究會，2002年，第1-18頁。

<sup>84</sup> 平田茂樹《南宋周辺社會における士大夫の交流と「知」の構築：魏了翁、呉泳、洪咨夔の事例を手掛かりとして》，《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第18卷，2017年，第1-20頁。

<sup>85</sup> 《東京夢華錄》、《夢梁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西湖老人繁勝錄》等城市史料較為詳細的記載了首都開封和臨安的茶館，因此本文對茶館的分析主要以北宋開封的茶館和南宋臨安的茶館為中心，

# 第一章：北宋開封的茶館

## 一，緒論

中國的茶文化源遠流長，其中宋代是茶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而茶館的發展更是茶文化發展的重要部分。通過前文所述茶館的相關研究，我們對茶館有了基礎的認識，而宋代茶館空間問題則是需要進行深入研究的課題。平田茂樹在《從城市史料和筆記小說的比較來看宋代的茶館》一文中利用不同類型的城市史料和筆記小說史料，來對茶館的空間以及其背後的社會關係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其中對茶館空間作為境界以及其具有的開放性這兩個特徵進行了詳細的討論，並提出宋代茶館的本質是經濟都市發展進程中“都市式場域”階段的一種構成要素<sup>86</sup>。筆者認為在認識宋代茶館本質的問題上，這是一個非常有啟示性的想法。因此，本章通過探討茶館空間內人的活動，茶館的分佈以及其與城市空間存在的互動性與聯繫性，對茶館空間本身及其自身性質進行討論。

本章主要對城市史料《東京夢華錄》進行系統的再整理和分析，並結合其他宋代筆記小說等史料，建立關於宋代茶館史料的數據庫，以此為基礎利用統計計量史學的研究方法，對北宋開封茶館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再探討。筆者抽取《東京夢華錄》中所有關於茶館的部分（表1）進行系統詳細的分析，在此基礎上搜索中國基本古籍庫以及《全宋筆記》中關於宋代開封茶館的史料做成（表2），並進行細緻深入的整理分析。筆者將開封城內茶館，瓦子，妓館等設施的分佈地點製成《東京夢華錄》茶館分佈圖1，《夷堅志》茶館分佈圖2，以及結合了圖1和圖2的開封茶館分佈圖3，開封瓦子分佈圖4，開封妓館分佈圖5、以及結合了圖1、圖2、圖3、圖4、圖5等內容的北宋開封茶館分佈預想圖6，以進行更直觀有效的分析。<sup>87</sup>

## 二，《東京夢華錄》中的茶館

《東京夢華錄》是研究宋代茶館以及宋代開封的重要史料。根據筆者的統計，《東京夢華錄》中記載茶館的史料總計有13處。其中（表1）中史料1,2,3條是關於分茶店的記載。具體如下：

《東京夢華錄》卷二：御街<sup>88</sup>一直南去，過州橋<sup>89</sup>，兩邊皆居民。街東車家炭，張家酒店，

記載較少的地方茶館則在中間小結部分以《夷堅志》中的記載為中心進行簡單的傾向性分析和總結。

<sup>86</sup> 平田茂樹《從城市史料和筆記小說的比較來看宋代的茶館》一文中借用了日本中世史研究者綱野善彥提出的“都市式場域”的概念來認識宋代茶館的本質，指出茶館正是唐宋變革的過程中逐漸發展成熟的“都市式場域”中的一處空間據點。“都市式場域”是指把中世型都市空間成熟並逐漸形成近世型都市空間之間的過渡階段。這一概念的提出在日本中世史學家中引起了不小的議論。其中五味文彥認為“都市式場域”是中世都市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一頁，是以“中”、“津·泊·湊·浦”、“宿”、“町”等交通上的交流場所為載體呈現的自由空間，在其內部“建造屋”、“道路”以及社會關係等“都市”的構成要素，已經相當發達。

<sup>87</sup> 此6幅圖皆由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的研究》中《図2 北宋開封概念図》（徽宗時代後期）改繪而成。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の研究》，汲古書院，2007年。

<sup>88</sup> 入矢義高、梅原郁注釋本《東京夢華錄—宋代の都市と生活》，平凡社，1996年，第63-64頁。據其理解，禦街是宣德樓一直向南的一條道路，寬約兩百餘步，其兩側是禦廊。以前雖然允許商人在此經商，但是政和年間以來就禁止了。兩邊都安上了黑色的杈子，街中心也放了兩列紅色的杈子，禁止人馬從此處通行。行人只能在廊下紅色杈子之外通行。

<sup>89</sup> 州橋為汴河上一處橋樑。（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一，第121頁。

次則王樓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鋪、曹婆婆肉餅、李四分茶。<sup>90</sup>

在此則材料中出現了李四分茶的字樣，關於分茶，在徐軻《宋代茶館研究—以北宋的開封和南宋的臨安為中心》等一些論文中是直接把分茶店作為茶館來理解的。在入矢义高、梅原郁注释本《东京梦华录—宋代の都市と生活》<sup>91</sup>一书中，对于分茶的注释引用了《东京梦华录》卷四和《梦梁录》中的解释，解释为一种大型的食店或面食店。

根據《東京夢華錄》卷四<sup>92</sup>中的記載，分茶店是一種食店，賣羹湯、羊肉、各類麵食等。並且提到除普通的分茶店外，還存在售賣像寺院齋食一樣的素分茶店。《都城紀勝》中也有關於分茶的記載<sup>93</sup>，同樣可以看出分茶是食店的一種。而在《夢梁錄》卷十六<sup>94</sup>中的記載中提到了分茶酒肆<sup>95</sup>，根據其記載可以看出，一些酒肆兼賣一些下酒菜，而這樣的店可以叫做分茶酒肆。在其後分茶酒店一節中的記載也可以證明這一點。除此之外，在《夢梁錄》分茶酒店這一節中還記載說：“大凡麵食店，亦謂之‘分茶店’。”也就是說主要賣麵食的食店也叫做分茶店。而能被叫做分茶的店，都賣有種類多樣的羹類食物。根據《都城紀勝》和《夢梁錄》的記載可以看出分茶主要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兼賣下酒菜和酒的分茶酒肆。第二種是一些麵食店以及食店。第二種的情況與《東京夢華錄》中所記載的分茶的情況是基本一致的。從上面幾則史料來看，筆者認為分茶店可能是提供飲食服務的食店，在功能上與茶館有一定的重合。

上述史料中李四分茶的位置位於過了州橋之後的街道的東側，與車家炭、張家酒店、王樓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鋪、曹婆婆肉餅等店鋪相鄰。在此處街道，各色商鋪並立，而且有飯店有酒店。可以看出，此處街道應當是比較繁華的商業街道。

《東京夢華錄》卷二：街北薛家分茶、羊飯、熟羊肉鋪。向西去皆妓館舍，都人謂之院街。<sup>96</sup>

根據這則史料記載，麵院街北側是薛家分茶以及各種賣羊肉的食店。而向西而去都是妓館。從以上兩則史料可以看出，分茶店多是與酒店以及各色食店相鄰的，並且存在於各色商鋪林立的商業街中。此處各種酒店食店以及商鋪並存的區域，向西就緊靠都是妓館的‘院街’，不難想像‘院街’的妓館的從業者以及妓館的客人將是這些食店、酒店、商鋪的強有力消費者。而在也顯示了茶館的分佈與娛樂空間的緊密聯繫。

《東京夢華錄》卷二：御廊西即鹿家包子。餘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藥鋪、居民。<sup>97</sup>

從此則史料來看，御廊的西面就是鹿家包子。餘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藥鋪、居民等

<sup>90</sup>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第126頁。

<sup>91</sup> 入矢义高、梅原郁注释本《東京夢華錄—宋代の都市と生活》，第69頁。

<sup>92</sup>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四，第144-145頁。

<sup>93</sup>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食店》，第9頁。

<sup>94</sup> (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六《酒肆》，第246-247頁。

<sup>95</sup> (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六《分茶酒店》，第248頁。(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六《麵食店》，第252頁。

<sup>96</sup>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第126頁。

<sup>97</sup>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第126頁。

設施。可以看出御街周圍的空間食店，酒店繁多，是比較繁華的空間。

《東京夢華錄》卷二：其御街東朱雀門外，西通新門瓦子<sup>1</sup>以南殺豬巷，亦妓館。以南東西兩教坊，餘皆居民或茶坊。<sup>2</sup>

此史料中提到朱雀門外向西是新門瓦子，新門瓦子以南是殺豬巷，也是妓館。其南面是東西兩處教坊，剩餘的邊都是民居或者是茶坊了。據《東京夢華錄》卷二<sup>3</sup>中的記載，在瓦子中，不僅有各式娛樂，商品買賣，占卜，還有飲食店以供吃喝。其中存在茶肆，酒店，分茶酒店等生活設施應該是比較合理的推測。在此區域的空間裏，民居與茶坊，妓館教坊等混雜相處，可以看出居民對娛樂的需求，以及開封城娛樂的繁榮。而在此區域的茶坊，除了日常服務於周圍居民，妓館教坊的從業人員以及其客人也是茶坊強有力的消費者。

《東京夢華錄》卷二：潘樓東去十字街，謂之土市子，又謂之竹竿市。又東十字大街，曰從行裏角，茶坊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sup>4</sup>

潘樓往東是十字街，再往東就是東十字大街，叫做從行裏角，在這裏茶坊五更點燈，賣一些衣服，抹領，圖畫，花環等雜貨，等天亮了就散去，被稱為鬼市子。與五更點燈交易雜貨的茶坊不同，《東京夢華錄》卷二<sup>5</sup>中記載了州橋夜市，州橋南去的街道上有很多賣食物的小攤，至三更才散。雖然二者的營業時間不同，卻都是在特殊的時間段進行營業的‘市’。關於夜市，鹽卓悟在《唐宋代之夜市》一文中對漢唐以及宋代的夜市進行了考察<sup>6</sup>。他在文中也指出，宋代夜市在其空間範圍和時間範圍上都有很大的擴展。加藤繁在《中國經濟史考證》一書中提到，隨著唐宋間市制的更革，到了宋代，作為商業區域的市的制度已經破除，不再受到場所和時間上的限制。並且討論了城市中以街路為中心的同行業商店所開設的定期市以及存在其他定期市的問題<sup>7</sup>。此則史料的記載也描繪了一個在特定的時間段進行營業，並且交易各色雜貨的茶坊，此處茶坊的實質應該接近於一個以茶坊為中心的定期交易市場。除此之外在《東京夢華錄》卷二<sup>8</sup>中也有記載說到潘樓酒店的下面，每到五更便起市，買賣珍玩、書畫、犀玉等，等到天亮就開始買賣一些肉類雜碎，野味等食材，而這些買賣完了之後就開始買賣零碎作料等物。在之後還有買賣果子，首飾等物品的。可以說是一個不同時間段賣不同物品的固定市場。由此可以看出，一些茶坊和酒樓的空間其本身就是城市空間中所存在的市，是其所在區域吸引人流和商業聚集的一個中心。此處茶館北面的馬行街是一個溝通東京路與

<sup>1</sup> 入矢义高、梅原郁注释本《東京夢華錄—宋代の都市と生活》，第70頁。其中直接将瓦子理解為繁華的繁華街市。秦建明《勾欄瓦舍試解》，《文博》第4期，2015年，第41-47頁。一文中提出古代所謂的瓦舍，就是並聯的卷棚建築，以形似瓦壘，而名瓦舍。而勾欄則是欄幹的一種，這種欄幹，欄柱外側與底部橫樑間有一斜撐，以形似勾矩，而名勾欄。因其皆為演出場所所用，故勾欄瓦舍，也就成為古代娛樂場所之代稱。

<sup>2</sup>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第126頁。

<sup>3</sup>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第128頁。

<sup>4</sup>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第129頁。

<sup>5</sup>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第127頁。

<sup>6</sup> 鹽卓悟《唐宋代之夜市》，《東洋史研究》第73卷2號，2014年，第186-216頁。

<sup>7</sup> 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商務印書館譯本，1962年，第302頁。

<sup>8</sup>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第128頁。

江淮物流的交匯處，是一個重要的物流中心<sup>9</sup>。而此處茶坊西面則是潘樓酒店，土市子和桑家瓦子，中瓦和裏瓦<sup>10</sup>，向東則有趙十萬宅街，南中山正店、東榆林巷等<sup>11</sup>。此處茶坊的周圍的空間則不僅存在著重要的娛樂場所桑家瓦子，以及以潘樓為中心的商業繁華區，還有作為開封商品流通中心和全國物流中心的土市子<sup>12</sup>。可以看出此處的空間是一個由商品流通所帶來的商鋪林立，娛樂業飲食業發達的一個區域。是一個兼具商業中心、物流中心和重要娛樂休閒場所等多重性質的空間。

《東京夢華錄》卷二：又投東，則舊曹門街，北山子茶坊，內有仙洞、仙橋，仕女往往夜遊吃茶於彼。又李生菜小兒藥鋪、仇防禦藥鋪。出舊曹門，朱家橋瓦子。下橋，南斜街、北斜街，內有泰山廟，兩街有妓館。橋頭人煙市井，不下州南。<sup>13</sup>

由東十字大街繼續向東則是舊曹門街，這裏有北山子茶坊、李生菜小兒藥鋪、仇防禦藥鋪等。出了舊曹門就是朱家橋瓦子，而下了橋就是南斜街和北斜街，兩街都有妓館。此處的北山子茶坊周圍的區域，除了有藥鋪之外，還有作為娛樂空間的瓦子，妓館等。在這則材料中提到北山子茶坊中有仙洞，仙橋等，仕女往往到此夜遊吃茶。由此可以看出，在宋代就出現了以觀光作為賣點吸引客人的茶坊，顯示了宋代茶坊豐富的多樣的行銷手段，體現了茶館休閒娛樂的功能。並且此處的茶坊有很多仕女夜遊在此吃茶，說明女性也是宋代茶館的消費群體。其中對於仕女身份的理解，在鹽卓悟的《唐宋代の夜市》一文中其理解為良家女子，在入矢義高和梅原郁的注釋本《東京夢華錄—宋代の都市と生活》一書中也持類似的理解。而在戴曉峰《宋代兩京都市女性研究——以五種都市筆記為中心》<sup>14</sup>一文中則把‘仕女’同‘士女’聯繫起來，認為仕女其實是指那些擁有一定人身自由的士人或官員的女眷。筆者認為這幾種觀點都指出了一部分吃茶仕女的身份。考慮到北山子茶坊周圍建有瓦子、妓館等設施，這個茶坊的客人除附近居民外，相當大一部分應該是來自於瓦子和妓館的從業者以及其客人。從這一點來說的話，在北山子茶坊吃茶的仕女則有相當一部分是都市中其他具有一定人身自由的女性，比如妓女，女伎藝人等職業的女性。

《東京夢華錄》卷三：寺三門閣上並資聖門，各有金銅鑄羅漢五百尊、佛牙等，凡有齋供，皆取旨方開三門。· · · · · ·每遇齋會，凡飲食茶果，動使器皿，雖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辦。<sup>15</sup>

這則史料記載寺院進行齋會的時候，則需要提供大量的飲食茶果等。在《都城紀勝》的《四司六局 瓦舍眾伎 社會 園苑》中也有相應的記載：“又有茶湯會，此會每遇諸山寺

<sup>9</sup> 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の研究》，第177頁。

<sup>10</sup> 此處的桑家瓦子，中瓦和裏瓦到底是一處瓦子還是三處相近的瓦子，關於這個問題是存在爭議的。但，由於此問題不是本文需要討論的重點，所以在此按照《東京夢華錄》中的記載進行理解，按照同一區域內的三個瓦子來理解。

<sup>11</sup>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第129頁。

<sup>12</sup> 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の研究》，第178頁。書中指出土市子位於左軍第一廂和左軍第二廂的分界線的位置，這個經濟部門的官廳林立的內城東部，不僅僅是開封的商品流通中心，更是全國的物資流通中心。

<sup>13</sup>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第129頁。

<sup>14</sup> 戴曉峰《宋代兩京都市女性研究——以五種都市筆記為中心》，西北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

<sup>15</sup>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第134-135頁。

院作齋會，則往彼以茶湯助緣，供應會中善人。”也揭示了在齋會時對茶湯等飲食的需求。而這種需求則催生了只在齋會或者其他重大活動期間出現的販賣飲食、茶水等物品的攤販。在《夷堅志》<sup>16</sup>丙志卷四《餅店道人》<sup>17</sup>和《夷堅志》丙志卷三《道人留笠》<sup>18</sup>兩則材料中就描述了在青城山道會期間，民眾則結屋山下開設食店，茶肆賣茶果吃食的情況。上述史料都印證了宗教慶典期間會出現臨時茶攤的現象。

《東京夢華錄》卷三：寺東門大街，皆是襪頭、腰帶、書籍、冠朵鋪席，丁家素茶。寺南即錄事巷妓館。繡巷皆師姑繡作居住。北即小甜水巷，巷內南食店甚盛，妓館亦多。<sup>19</sup>

此則材料中的丁家素茶位於相國寺東門大街，在此區域中除了丁家素茶之外，大多是賣腰帶，書籍等學生用品的商鋪，可以推測出，此處應該是士子們活動空間之一，而丁家素茶的利用者中一部分應該是士子群體。而相國寺的南面則是錄事巷妓館，師姑繡作居住的繡巷。相國寺的北面則是小甜水巷，巷內有很多的南食店和妓館。其中南食店主要是賣南方食物<sup>20</sup>，而相國寺及其周邊這一空間除了有交易各種物品的萬姓交易<sup>21</sup>，南食店，妓館，商鋪的存在較多。由此看出，此處聚集的的外地人，士子，商人，妓館的從業人員及其客人是比較多的。而這一區域的茶肆的利用者的大部分也由這些群體構成。

《東京夢華錄》卷三：馬行北去舊封丘門外祇廟斜街州北瓦子，新封丘門大街兩邊民戶鋪席外，餘諸班直軍營相對，至門約十裏餘，其餘坊巷院落，縱橫萬數，莫知紀極。處處擁門，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飲食。<sup>22</sup>

在新封丘門大街兩邊除了民戶和商鋪之外，其餘都是軍營，大概有十餘裏。其他邊都是坊巷院落了，而且裏面都有茶坊酒店，勾欄飲食。而這些茶坊酒店，勾欄最重要的消費群體就是附近的軍人以及其家屬們。《東京夢華錄》卷三中有<sup>23</sup>“或軍營放停，樂人動鼓樂於空閒，就坊巷引小兒婦女觀看”，軍營服役期滿的樂人會在城中空閒處進行鼓樂表演，引坊巷內婦女兒童觀看的記載。軍人及其家屬都是茶坊酒店，勾欄瓦子的重要消費群體。而軍營所在的區域，也是這些設施存在的重要空間。除了史料中所描述的新封丘門大街有諸班直軍營之外，而這個區域也是夷門山五丈河倉的所在地，也是重要物資集散地。就開封城的軍營設置問題，久保田和男認為在西華門外的右軍第二廂有大量軍營的存在可能性較高，外城東水門外汴河附近倉庫云集的區域也可能存在部分的軍營<sup>24</sup>。也就是說，糧倉所在地，如夷門山五丈河倉，也會設置軍營。

<sup>16</sup> 本文所用《夷堅志》版本為：（宋）洪邁《夷堅志》，何卓點校，中華書局，1981年（2013年重印）。

<sup>17</sup> （宋）洪邁《夷堅志》丙志卷四《餅店道人》，第391頁。

<sup>18</sup> （宋）洪邁《夷堅志》丙志卷三《道人留笠》，第386頁。

<sup>19</sup>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第135頁。

<sup>20</sup>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食店》，第9頁。

<sup>21</sup> 趙雨樂《從寺院到市集：析唐宋時期的相國寺》，張其凡、範立舟主編：《宋代歷史文化研究（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文中中文解析了相國寺從寺院到市集的轉變。

<sup>22</sup>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第136-137頁。

<sup>23</sup>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第140頁。

<sup>24</sup> 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の研究》，第171-196頁。

《東京夢華錄》卷三：“至三更方有提瓶賣茶者。蓋都人公私榮幹，夜深方歸也。”<sup>25</sup>  
《東京夢華錄》卷五：“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動使，獻遺湯茶，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門。”<sup>26</sup>

這兩則材料中都提到了提茶瓶買茶者，顯然類似一個流動的茶肆。卷三史料中的提茶瓶者主要出現在夜市上，服務對象主要是忙於公務晚歸之人。而卷五史料中的提茶瓶者主要穿梭於各個住宅之間，為鄰里居民傳遞消息。其主要服務對象是住宅區內的居民。可以看出夜市和住宅區則是這樣一個流動的茶肆存在的重要空間。

《東京夢華錄》卷六：諸坊巷、馬行，諸香藥鋪席、茶坊酒肆，燈燭各出新奇。就中蓮華王家香鋪燈火出群，而又命僧道場打花鈸、弄椎鼓，遊人無不駐足。<sup>27</sup>

《東京夢華錄》卷七：池苑內<sup>28</sup>除酒家藝人占外，多以彩幕繖絡，鋪設珍玉、奇玩、匹帛、動使、茶酒器物關撲<sup>29</sup>。有以一笏撲三十笏者。以至車馬、地宅、歌姬、舞女，皆約以價而撲之。出九和合有名者，任大頭、快活三之類，餘亦不數。<sup>30</sup>

卷六史料中描述了正月十六燈市，各處茶坊酒肆也掛出各色花燈來裝飾的情景，顯示出茶坊酒肆等設施與元宵節慶典活動的密切聯繫。卷七史料描述了在節日期間，金明池向普通庶民開放，其中不僅有酒家等供遊人吃飯喝茶休息的設施，還有關撲等遊戲娛樂活動。這種在特定活動期間開設的茶肆，應該也會出現在元宵節等節日慶典期間。《西湖老人繁勝錄》中的記載也印證了這種推測。在節日期間的西湖旁邊，遊人如織，路邊搭起了浮棚來滿足遊人們喝茶，休息，進食的需求<sup>31</sup>。這些浮棚應該就是各式的食店，茶攤等設施。

從上述史料可以看出臨時茶攤多在節日慶典期間出現在道會、齋會、以及金明池這樣的觀光地，可以推測寺廟、道觀以及金明池這樣的觀光地都是這種茶肆，食店等設施存在的重點區域。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對宋代茶館的一些特徵進行總結。

1，宋代開封茶館經營內容上得到發展，且往往具有多重功能。經營內容除了單一的賣茶水之外，還存在一些像分茶酒肆一樣的兼賣吃食的茶館以及兼賣各種商品的茶館。而茶館的分佈不僅是在熱鬧的商業區在各個居民區也存在著大量的茶館服務城市裏的居民。可以說宋代開封茶館無論在數量還是經營內容上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對茶館的利用更加平民化。

2，從唐到宋，由於坊市制度的崩潰，夜禁的鬆弛等，商業活動在場所以及時間上都沒有限制。<sup>32</sup>宋代開封茶館在其營業時間和場所上突破了時間和地點的限制，營業時間範圍擴大。如在齋會節日慶典等特別時期出現的臨時茶館，不受時間地點限制的流動茶館（移動茶攤，

<sup>25</sup>（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第137頁。

<sup>26</sup>（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第147頁。

<sup>27</sup>（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六，第157頁。

<sup>28</sup>此處的池苑是指金明池和瓊林苑，其位置在城西順天門外。根據入矢义高、梅原郁注釋本《東京夢華錄—宋代の都市と生活》，第239頁。中的對此處的注釋，金明池為太宗的太平興國元年開鑿而成，並引入金水河的水。其目的是為了練習水戰和每年三月在此進行水上演練。而瓊林苑則是與金明池南北相對的御苑。

<sup>29</sup>根據入矢义高、梅原郁注釋本《東京夢華錄—宋代の都市と生活》，第236頁。中對關撲的解釋：關撲是一種向盆裏扔擲頭錢（頭錢是代替骰子的錢），從而博取錢、衣物、器具等用品的賭博類小遊戲。

<sup>30</sup>（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七，第161頁。

<sup>31</sup>（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錄》，第319頁。

<sup>32</sup>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中華書局，2014年，第191頁。

提茶瓶者），還有像鬼市子茶坊一樣，充當定期交易市場的茶館的出現都反映了唐宋期間，社會生活以及城市市場形態的重大變化。

3，宋代開封茶館的分佈空間與城市空間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性。其分佈與瓦子妓館酒樓食店等飲食娛樂空間，土市子和相國寺以及東水門外倉庫等物流中心，州橋相國寺橋等交通便利的區域，軍營所在的區域，州橋以及御街周邊繁華的商業區都具有緊密的聯繫。

通過對《東京夢華錄》關於開封茶肆相關記載的全面分析，瞭解到北宋開封茶館的各種形態，以及其所處的空間形態。除此之外，宋代筆記小說等材料對開封茶館的記載，可進一步補充和豐富宋代茶肆的整體形象。

### 三，《夷堅志》等筆記小說中的茶館

在《夷堅志》等筆記小說中，可考的開封茶館相關的材料大概有 13 條，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豐富宋代茶館的整體形象。

《夷堅志》乙志卷十一《米張家》：京師修內司兵士關喜，以年老解軍籍為販夫。賣果實自給。其妻湯氏，舊給事掖廷，晚乃嫁喜。宣和二年六月，喜賣瓜於東水門外汴堤叢柳間，所坐處去人居百許步，柳陰尤密。午暑方盛，行人不至。聞木杪呼小鬼，繼有應之者。呼者曰：“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再三。仰頭周視，無所睹，懼不自安，欲歸，而妻饋食適至，具以事語之。妻曰：“老人腹虛耳聵，妄聞之，無懼也。”明日，復如前，又以語妻。妻曰：“則翼日我於此代汝，汝當為我饋。”湯氏，慧人也。伺其時至，聞應答聲畢，遽曰：“既在，何不出示？”即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錠，黃白爛然。妻四顧無人，亟收置瓜籃中。未畢而喜至，驚笑曰：“吾不暇食矣。”喜見黃物形制甚異，疑不曉。妻曰：“此裏疏金也。”盡拾瓜皮與所坐敗篋覆籃，共舁以歸。僅能行百步，重不能勝，暫寄於張家茶肆中，出募有力者挈取。張氏訝其蒼黃如許，發篋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閱視，及家始覺。妻曰：“姑忍勿言，明當複用前策，尚可得也。”洎坐樹下，過時無所聞，乃效其呼小鬼，亦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竟。”喜將訟於官，妻曰：“鬼神不我與，雖訴何益，不若謀諸張氏。”張曰：“物已歸我，又無證驗，安得取？且爾夫婦皆老而無子，多貲亦奚為？幸館於吾門，隨所用錢相給，畢此一世，可也。”喜乃止。張氏由此益富，徙居城北，俗呼為“米張家”云。<sup>33</sup>

這則材料主要講述了以販賣果實為生計的關喜夫婦二人在東水門外的汴堤上，獲得金數十顆，銀十餘錠。由於這些金銀太重，夫婦二人便把這些金銀放置到果籃裏，暫時存放在附近的張家茶肆中，並在茶肆招募大力士幫忙提取回家。茶肆的主人張氏見到這些金銀起了貪念，便用瓦礫替換了金銀。張氏也因為得到這筆錢而更加富裕，大家稱之為米張家。

由這則材料可知張家茶肆是可以暫時寄存物品的，並且可以在茶肆直接進行招募。而從張氏被稱為米張家來看，張氏開設張家茶肆的同時應該也是一個米商。由此可以看出：1，張家茶肆不僅僅是有飲茶的功能，還有寄存功能，勞動仲介的職能。2，此處的張家茶肆位於汴堤附近，也就是處在一個交通便利物流發達的區域空間內，此處應該分佈有大量的邸店和客店等設施。保田和男《宋代開封の研究》中也指出了因為汴河漕運等原因，在內城水門（舊宋門）至相國寺橋一帶的汴河附近的旅店業非常發達。在《東京夢華錄》卷三<sup>34</sup>的記載中也描

<sup>33</sup>（宋）洪邁《夷堅志》乙志卷十一《米張家》，第 275 頁。

<sup>34</sup>（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第 134 頁。

述了此區域內客店繁多的盛況，很多南方來的官員，兵級，商賈等都在此住宿。周寶珠在《宋代東京研究》中邸店一節中認為在宋代邸店蓬勃發展，並論述了邸店存儲貨物的功能，描述了寺院，妓館，酒店等設施也承擔了邸店一部分住宿的職能。<sup>35</sup>3，張家茶肆所處位置在東水門外汴堤附近，在此處能順利招募到大力士，說明此處聚集了大量的依託漕運靠出賣勞力生活的勞動者。並且在茶館中發佈招聘信息，說明此處的茶館應該經常有這些勞動者聚集，並且有著能快速的傳播信息的管道，表現出了勞動仲介的職能。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中指出了“宋代仲介業務的存在範圍較廣，並不只是有牙人牙行等仲介，客店，邸店，等倉庫，旅館業也兼營仲介”<sup>36</sup>。這說明茶館可能還具備牙行的職能<sup>37</sup>。4，此区域茶馆的主要服务对象应该是来往于汴河之上的商人、勞動者、外來的官員、士子以及附近的居民等。

《夷堅志》丙志卷九《宣和龍》：宣和元年五月，京師大雨連日。及霽，開封縣前茶肆家，未明起，拂拭案榻，見若犬蹲其旁，至旦視之，龍也，有聲如牛，驚而僕。茶肆與軍器作坊鄰，諸卒適赴役，見之，殺而分其肉。街吏懼不敢奏，都人圖玩其形。長六七尺，鱗色蒼黑。首如驢，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坐極長，於其際始分兩歧，與世間所繪龍相類。後十餘日，忽大水犯都城，高出十丈，自西北牟駝岡至萬勝門外馬監，民居盡沒。時以為大河決溢，然水色清澄，河又未嘗決，終莫知所從來。居數日，水已入汴渠，達曉將溢，朝廷募人乘風水之勢，決其下流，乃由城北入五丈河，下注梁山滌，首尾幾月乃已。故俗傳為龍復讎云。<sup>38</sup>

在此則材料中記載了開封縣前，與軍器作坊相鄰的一個茶肆裏，出現了一只龍，正巧被要去赴役的諸卒發現，然後被分而食之的故事。從中可以了解到以下幾個信息：1，茶館與軍器坊為鄰，可以想像軍器坊的手工業勞動者們應該是此處茶館主要的利用者們。北宋開封城內設置了大量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大多分佈在皇城附近。<sup>39</sup>而在這些作坊工作的手工業勞動者們也是北宋開封城人口構成的重要部分。<sup>40</sup>是開封茶館利用者的一部分。2，茶館裏出現了龍這種非人類的生物。在茶館這一空間中不僅僅是出現過龍，還出現過一些非人類的鬼，仙人等。在《夷堅志》甲志卷一《石氏女》<sup>41</sup>一則中就記載了仙人呂洞賓化身為乞丐到茶肆中行乞的故事。在宋代茶館相關的材料中經常能看到仙人呂洞賓幻化為道士，乞丐等各種身份的人來到茶館度化凡人的故事。比如在上文中提到的《夷堅志》丙志卷四《餅店道人》和《夷堅志》丙志卷三《道人留笠》兩則故事中都描述了仙人呂洞賓化作普通道士來到茶館休息飲茶並度化凡人的故事。除了仙人在茶館的登場之外之外，《邵氏聞見錄》卷七<sup>42</sup>中還記載了魯國公範質在開封城封丘巷內茶肆遇鬼的故事。這些事例都講述了仙人、鬼、龍、道士等特殊身

<sup>35</sup> 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91-297頁。

<sup>36</sup> 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風間書房，1968年，第407頁。

<sup>37</sup> （宋）洪邁《夷堅志》乙志卷七《布張家》，第242頁。這則故事中，有明確提到主人公張牙人是一個布商人的同時還經營著茶肆。在平田茂樹《從城市史料和筆記小說的比較來看宋代的茶館》一文中也有對此事例的具體分析，在此不再贅述。

<sup>38</sup> （宋）洪邁《夷堅志》丙志卷九《宣和龍》，第439頁。

<sup>39</sup> 梁建國《北宋東京的人口分佈與空間利用》，《中國經濟史研究》第6期，2016年，第143-145頁。

<sup>40</sup> 关于北宋东京的总人口数以及人员构成，久保田和男在《宋代開封の研究》一书中对周宝珠以及吴涛对北宋开封人口总数以及人员构成的学说进行了讨论和考证。其中兩者對官營手工業者的人數推算都在十萬人以上。

<sup>41</sup>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一《石氏女》，第7頁。

<sup>42</sup> （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七，《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1983年，第62頁。

份對茶館的利用，而這些以茶館為舞台的各色鬼怪故事的出現則側面證明茶館的普遍性。

《夷堅志》補志卷八《京師浴堂》：宣和初，有官人參選，將詣吏部陳狀，而起時太早，道上行人尚希，省門未開，姑往茶邸少憩。邸之中則浴堂也，廝役兩三人，見其來失期，度其必村野官員乍遊京華者。時方冬月，此客著褐裘，容體肥腴，遂設計圖之。密擲皮條套其項，曳之入簾裏，頓於地，氣息垂絕，群惡誇指曰：“休論衣服，只這身肉，直幾文錢。”以去曉尚遙，未即殺。少定，客以皮縛稍緩頓蘇，欲竄，恐致迷路，遲疑間，忽聞大尹傳呼，乃急趨而出，連稱殺人。群惡出不意，殊荒窘，然猶矯情自若，曰：“官人害心風耶！”俄而大尹至，訴於馬前，立遣賊曹收執，且悉發浴室之板驗視，得三屍，猶未冷，蓋昨夕所戕者。於是盡捕一家置於法，其贖人之肉，皆惡少年買去云。<sup>43</sup>

以上材料講述了以下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外地來的去吏部陳狀的官員<sup>44</sup>，由於起太早，省門未開，便在附近的一家茶邸進行休息，店家見其是外地來京之人，便起了歹念欲殺人奪財，但最終沒有得逞。

其中的茶邸應當是位於尚書省門附近，此茶邸裏設有浴堂。這名官員在茶邸中遇險時離天亮還早，官員逃脫之後還在浴室發現三具屍體，而這些屍體還沒變冷。並且這家店主不僅殺人奪財，還把殺人所得人肉賣給一些惡少年。從這些信息來看：首先，此則材料中的茶邸可能兼營茶館，邸店，浴堂等業務。茶邸的經營時間很早，可能是從晚上就開始了，結合茶邸的營業時間和設置了浴室這一細節，可以推測這處茶邸應該還有住宿的功能，而被害的三人應該是夜晚在此投宿的客人。關於茶館兼營浴堂在劉盈慧《宋代浴室種類初探》一文中<sup>45</sup>將其劃分為商業浴室的一種。由此可知茶館與浴堂的經營內容也有很大的重合，茶館空間與浴堂在空間上也具有緊密的聯繫。《泊宅編》卷四記載有類似情況，外地入京考試的士子們在京城禁門未開時，多會選擇前往附近茶肆休息等待<sup>46</sup>。描述了曾經作為和尚，並且善於看相的士子朱曉容在茶肆中絲毫不差的預言殿試排名的故事。殿唱日在禁門未開時，就與同為科舉士子的馮當世共坐茶肆等待。由文中“姚力挽就鄰邸燈下視之”之語，可以看出此時仍屬夜晚時分。而茶肆也是與邸店相鄰的。不僅顯示了茶館，邸店，浴堂等設施之間模糊的界限，還說明在宮城附近應該存在著很多這種為外來官員士子提供服務的茶館邸店等設施。

其次，其中提到店家認為這位官員是外地人，再加上其值錢的穿著與一身肥肉，讓店家起了殺心。官員以及惡少年應該都是非戶籍人口<sup>47</sup>，具有較強的流動性。正是因如此才使得在外來人口聚集的茶館，邸店，浴堂等地容易成為犯罪的場所<sup>48</sup>。《夷堅志》丁志卷十《秦楚材》<sup>49</sup>中也記述了類似的情況。士子秦楚材夜宿汴河客邸遇到一群惡少子，“或三年，或五年，輒

<sup>43</sup>（宋）洪邁《夷堅志》補志卷八《京師浴堂》，第1625頁。

<sup>44</sup> 平田茂樹在《從城市史料和筆記小說的比較來看宋代的茶館》一文就關於外地官員上京參選等問題，在文中有詳細說明，在此不再贅述。

<sup>45</sup> 劉盈慧《宋代浴室種類初探》，《鄭州師範教育》第4期，2015年，第81-86頁。

<sup>46</sup>（宋）方勺《泊宅編》卷四，《全宋筆記》第二編第八冊，2006年，大象出版社，第184-185頁。

<sup>47</sup> 梁建國《北宋東京的人口分佈與空間利用》一文認為北宋開封的人口主要有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構成。除了登記在戶的城郭戶，就是各種的非戶籍人員。他認為非戶籍人員構成主要分以下七類：一是禁軍廂軍及其家屬。二是參加省試或求學的外地士子。三是僧侶道士。四是妓女。五是進城謀生的小商賈及小手工業者。六是遊民，無賴。七是因災荒而轉入城市的流民。

<sup>48</sup>（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第808頁。“蓋京師升平之人，遊手浮浪最多，除旅居外，皆在火房、浴堂、櫃坊，雜居裏巷，強梁乘此擾攘。”

<sup>49</sup>（宋）洪邁《夷堅志》丁志卷十《秦楚材》，第620頁。

捕人漬諸油中，烹以祭鬼。”，欲將秦楚材作為祭品，最終未果。可以看出都市空間裏的惡少年，無賴等常常充當犯罪中的加害者，而外來人員則往往是被害者的角色。像這樣存在的茶館，惡少年與犯罪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顯示了茶館作為首都與外來人員進行交流的空間，其所具有的開放性和境界的性質<sup>50</sup>。

最後，茶肆空間的利用者還包含士子，官員等士大夫階層的人群。比如，上文提到的應試舉子，外地入京參選的官員，以及《邵氏聞見錄》卷七中提到的魯國公範質等都屬於這一群體。

《春渚紀聞》卷十《瓢內出汞成寶》：承議郎賀致中為餘言，任德翁之猶子嘗隨德翁入都，艤舟相國寺橋，遇一道人邀坐茶肆，手出小藥瓢云：“吾視官人蓋留心丹竈有年，而未有所得者。今能施我百錢，當以此瓢為贈。夜以水銀一兩投中，翌早收取二兩乾銀也。”任意謂必無此理，然亦不能違其請，傾篋得百錢與之，袖瓢而歸。夜取汞試納瓢中，置之枕間，次夕醉中探手撼瓢，則其聲董董然，汞如故也。置之不復視。一日德翁須汞為用，任欣然取器分取，既傾器中，則堅凝成寶矣。入火烹煉，了無耗折。自此夕注晨取，無不成寶者。蓋真仙丹藥所制，汞感丹氣自然凝結。但不知出瓢始凝之理，向使在瓢即堅，則破瓢而取，止於一作而已。此亦真仙神化無方，非塵凡之可理度者。任無妻孥之累，資用素窮。既日獲一星之利，於是厚為己奉。不逾年，一病而卒，瓢亦隨失之也。<sup>51</sup>

以上材料主要講述了任德翁之子乘船過遇到一個道士，並被其邀請到茶肆交談，道人向其請求施捨百錢。在任德翁之子答應後便贈其一個能煉汞成丹藥的神奇藥瓢的故事。在此故事中 茶肆位置應該就在相國寺橋附近。關於相國寺橋附近的空間，在上文中也提到此處空間邸店業發展比較繁榮，很多外來的官員士子商賈等寓居在此。是一個商業繁榮，交通便利的商品流通中心。而關於相國寺橋附近的茶肆以及《括異志》第七卷《郭上灶》<sup>52</sup>中提到的州橋茶肆都是以橋市為依託而出現的設施。兩宋時期城市發展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城區溢出城牆，城郭分隔城鄉作用的消失。<sup>53</sup>因此城市內的商業活動在時間與空間上更加自由，城市商業也得到更大的發展，商業活動除了在本來的市進行之外，還在交通便利的河畔，橋畔等舉行定期市<sup>54</sup>。由此讓茶館分佈空間的拓展更多了一種可能性<sup>55</sup>。

《後山談叢》卷五：太祖閱蜀宮畫圖，問其所用，曰：“以奉人主爾。”太祖曰：“獨覽孰若使眾觀邪！”於是賜東華門外茶肆。<sup>56</sup>

這則材料主要講述了有人進獻給太祖一副蜀宮圖畫，太祖說自己獨看不如讓眾人一起欣

<sup>50</sup> 平田茂樹《從城市史料和筆記小說的比較來看宋代的茶館》，第 357-386 頁。

<sup>51</sup> (宋)何遠《春渚紀聞》卷十《瓢內出汞成寶》，《全宋筆記》第三編第三冊，大象出版社，2006 年，第 283-284 頁。

<sup>52</sup> (宋)張師正《括異志》，卷七《郭上灶》，《古小說叢刊》，中華書局，1996 年，第 75 頁。

<sup>53</sup> 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第 78 頁。

<sup>54</sup> 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商務印書館譯本，1962 年，第 302 頁。

<sup>55</sup> 關於橋市，門市的研究還可參見：梁建國《橋門市井：北宋東京的日常公共空間》，《中國史研究》第 4 期，2018 年，第 113-126 頁。

<sup>56</sup> (宋)陳師道《後山談叢》卷五，《全宋筆記》第二編第六冊，大象出版社，2006 年，第 108 頁。

賞，便把此畫賜給了東華門外茶肆。由此可以看出茶館是一個人流聚集，人來人往之地，可以讓眾人都欣賞到此畫。而東華門外茶肆所處的空間則是非常熱鬧繁華的區域，不僅緊靠馬行街，土市子等商業物流中心，其中還有桑家瓦子這樣的大型的娛樂場所。除此之外，在上元節等節慶期間還有熱鬧的燈市觀看，在《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禮志十六》中就描繪了在上元節時，城內各處張燈結綵，“大內正門結彩為山樓影燈，起露臺，教坊陳百戲。”<sup>57</sup>的熱鬧景象。可見此處區域是一個集商業物流中心，娛樂中心，節慶禮儀中心等多重性質的空間。

《萍洲可談》卷一：太學生每路有茶會，輪日於講堂集茶，無不畢至者，因以詢問鄉里消息。<sup>58</sup>

此則材料主要講述了太學生每路都有茶會，按時日在講堂機會喝茶，大家為了詢問家鄉的消息都會來參加。其中所出現的茶會應該就是集會飲茶<sup>59</sup>。正如《搜神秘覽》卷中所言：“內殿崇班畢周臣，嘗謂予言感應之事。向在陝西水西石壁寺中，乘間與同寮為茶會。”<sup>60</sup>除了茶會亦有會茶之說，在《容齋四筆》第十五卷《經句全文對》<sup>61</sup>中則有“汪聖錫為秘書少監，每食罷會茶”的記述。雖然說法不同，但二者該都有集會飲茶的意思。因為《萍洲可談》與《搜神秘覽》為北宋時期的材料，在此著重分析。從這兩則史料內容可以看出，無論是太學生還是官僚士大夫，他們之間都有與同僚，同學集會飲茶的做法。他們在這種茶會上或交換信息情報或閒談交流，可見茶會是他們交流和維繫關係的重要媒介。其中應該注意的就是這種同舍，同學，同鄉以及同僚之間的以“同”為基礎的集會飲茶。可以想像，在除去這三種同的關係以外，應該還具有別的以這種“同”的關係為基礎的組織或者集會。而茶會則在這些社會關係的交流與維繫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以上是對《夷堅志》等筆記小說中關於宋代開封茶館史料的分析與討論。結合《夷堅志》茶館分佈圖 2 來看，可以對北宋開封茶館的空間分佈及其特徵，茶館空間的特性，以及茶館與茶館利用者之間的聯繫等問題作出以下幾點總結。

首先，宋代開封的茶館具有多重的社會功能，在其基礎的飲茶，休息的功能之外還具有飲食，住宿，存放物品，勞動仲介，等食店，邸店，客店，牙行的部分功能。其次，在茶館的分佈空間上除了分佈在東華門附近、土市子這樣的商業中心之外，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大量分佈在汴河沿岸這一空間區域。再有就是關於宋代開封茶館的利用者，在茶館這一空間裏，仙人，鬼，道士，手工勞動者，普通居民，惡少年等城市遊民，官員士大夫等都悉數登場，可以說是一個任何人都能進入的開放的空間。

<sup>57</sup>（元）脫脫《宋史》，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中華書局，1985年。《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禮志十六》，第2697-2698頁。“三元觀燈，本起於方外之說。自唐以後，常於正月望夜，開坊市門然燈。宋因之，上元前後各一日，城中張燈，大內正門結彩為山樓影燈，起露臺，教坊陳百戲。天子先幸寺觀行香，遂禦樓，或禦東華門及東西角樓，飲從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國歌舞列於樓下。東華、左右掖門、東西角樓、城門大道、大宮觀寺院，悉起山棚，張樂陳燈，皇城雉堞亦遍設之。其夕，開舊城門達旦，縱士民觀。後增至十七、十八夜。”

<sup>58</sup>（宋）朱彧《萍洲可談》，卷一，《全宋筆記》第二編第六冊，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41頁。

<sup>59</sup>沈冬梅《茶與宋代社會生活》茶會一節中，也提到了文人們經常以文會友，以詩會友，以茶會友，在宋代以茶會友也非常流行。並且敘述了茶會除去品茶之外的類似於同鄉會的社會功能。

<sup>60</sup>（宋）章炳文《搜神秘覽》卷中《善報》，《全宋筆記》第三編第三冊，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41頁。

<sup>61</sup>（宋）洪邁《容齋四筆》卷十五《經句全文對》，《全宋筆記》第五編第六冊，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369頁。

## 四，北宋開封城茶館的分佈空間

### 1，《東京夢華錄》中茶館的分佈空間

在《東京夢華錄》中關於茶館的記載有 13 處，其中能確認其大致方位的有 9 處，由此為基礎製作出了圖 1《東京夢華錄》中茶館分佈圖。結合史料和圖 1 可以看出，茶館分佈相對密集的區域主要位於州橋附近。該區域不僅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和物流交換中心，由於州橋以西汴河沿岸有大量邸店存在，還是外來人口聚集地和外來物資集散中心，是聯繫首都開封與全國各地的重要空間。受交通、外來人口及区位优势等因素影响，此區域店鋪林立，食店、酒店、邸店、茶館等設施完備，形成了繁華的商業空間。

與州橋空間比較類似的是朱雀門外的空間，此處空間是朱雀門與新門等城門所在地，也是新橋和蔡河這樣的交通樞紐所在地。參考附錄《開封妓館分佈圖》與《開封瓦子分佈圖》來看，此區域除了茶館的分佈之外，也是妓館與瓦子相對集中的區域，應該可以看做是一個娛樂設施相對集中地空間。

除了這兩處空間外，土市子以東到舊曹門之間的區域茶館分佈也較普遍。通過對（表 1）第 5,6 條的史料分析我們了解到此處空間不僅集中存在茶館，還存在著各種商鋪、市場，是重要的物資集散中心。結合瓦子分佈圖和妓館分佈圖可知，此區域以及周邊區域還集中存在妓館和瓦子等娛樂設施。

除以上三個區域，就是太平興國寺和大相國寺以這兩處寺廟為中心的區域。其中以太平興國寺為中心的區域，其周邊主要為軍營和各個官司以及舊梁門。而大相國寺則是周邊以及周邊的區域主要為相國寺為中心的各種市場以及周邊各色的商鋪。結合瓦子分佈圖和妓館分佈圖來看的話，大相國寺周圍還集中存在著瓦子妓館等娛樂設施。這裏主要是一個集市場，商業區，娛樂中心為一體的區域。

### 2，《夷堅志》等筆記小說中茶館的分佈空間

《夷堅志》等筆記小說中的茶館分佈空間相較於《東京夢華錄》的記載，最顯著的一個特徵是大部分的茶館分佈在汴河沿岸。在 12 則的材料中，能確定其大概位置的總共有 9 則。其中分佈在汴河沿岸的就有 6 處。除此之外，相較於《東京夢華錄》中茶館分佈空間幾乎都在城內來說，《夷堅志》等筆記小說中的茶館有一部分則分佈在城外。究其原因，除了有大運河這一交通便利因素的影響之外，其周邊區域存在倉庫等物資存儲設施，這也是此區域內茶館集中分佈的重要因素。而在內城汴河沿岸分佈的茶館，大多位於汴河上各處橋的旁邊。這些區域空間除了交通便利，還是商業繁榮的區域，更是邸店飲食店等為外來人口服務的設施完備的區域。

### 3，北宋開封茶館分佈空間

在對城市史料和筆記小說史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圖 1 和圖 2 對開封茶館分佈空間進行一個總結。除了能在地圖上明確其大致位置的茶館共有 9 處。而根據史料的分析，瓦子，妓館，軍營等區域也是茶館可能存在的區域，所以據《東京夢華錄》記載，本文也在地圖上標示了瓦子、妓館的大致位置。其中瓦子 9 處，妓館 11 處，分別為圖 3 和圖 4。除此之外根據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研究》為基礎，結合《宋史》等史料，對軍營所在位置也進行了推測，並將其展示在圖 5《宋代開封茶館分佈預想圖》。圖 5 將茶館、瓦子、妓館、軍營、交

通要道等區域進行集中展示，並對未被明確記載但可能存在茶館分佈的區域進行總結，以期更全面立體的展現開封茶館的分佈空間。

結合圖 5 我們可以看出：一，茶館、瓦子、妓館等多分佈於內城，其中東華門外至舊曹門一帶為其分佈空間的中心地帶之一，此處也是茶館分佈空間的中心之一。二，大相國寺周邊區域也分佈著妓館與茶館，還有大量的商鋪，以及各色人等，此處可能存在大量茶館、飲食店等設施。另外，相國寺橋至興國寺橋一帶的汴河沿岸茶館密集。由於汴河是重要的物資集散地，還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在相國寺以南的內城區，集聚了大量的客店以及旅居在此的南方商賈和官員，是外來人口密集的区域，所以有大量的茶館、客店等服務性設施存在，所以此處區域也是茶館分佈空間的中心區域之一。三，保康門—朱雀門—新門這一帶也是茶館、妓館、瓦子集中存在的區域。此處靠近繁榮的商業中心，聚集了大量的外來人口，因此也成為茶館聚集之處。除上述區域外，舊曹門—新曹門一帶、舊封丘門—新封丘門、西華門—舊梁門也存在著茶館、妓館等設施。根據久保田和男的《宋代開封研究》可知西華門外內城西北區域應該是禁軍軍營的主要分佈區域。在舊封丘門—新封丘門一帶和西華門—舊梁門一帶都有茶館和軍營的分佈，此兩處區域應該還存在著其他茶館、酒樓、飲食店等設施，應該是重要的茶館分佈空間。另外，還存在金明池這樣的在特定時期內才會開放，並且會暫時性的成為移動茶館和飲食店等設施聚集的地方。

對於開封茶館的分佈，整體來看茶館的分佈是遍佈城市的各個角落的，但是其中應該是在東華門—舊曹門、相國寺及周邊空間、在保康門—朱雀門—新門、汴河沿岸空間這幾處茶館分佈空間的中心區域，舊曹門—新曹門一帶、舊封丘門—新封丘門、西華門—舊梁門、金明池周邊區域，這幾個重要的分佈空間。總體來說是跟其所在區域的商業，物流，交通，人口等因素密切相關。呈現出內城多於外城，東南多於西北的特點。

## 五，結論

在分析了關於《東京夢華錄》與《夷堅志》等筆記小說中關於宋代開封茶館的史料之後，我們可以瞭解到一個相對全面的宋代開封茶館形象。可以說在宋代的開封，城市的發展影響了茶館的發展。宋代開封的茶館具有這樣的幾種特性：一，宋代開封的茶館在其經營時間和經營場所上的限制變小。無論是街坊巷市，還是居民住宅區都有茶館的存在，並且其營業時間最晚可至夜晚三更，最早五更便開始營業，其營業時間大大擴展。二，宋代開封的茶館具有複合型的功能，在基本的飲茶，休息的功能之外，還具有飲食，住宿，存放物品，勞動仲介，休閒遊玩，會友等功能，一間茶館兼營多種業務的例子有很多。三，茶館的分佈區域主要包括了 1，土市子這樣的商業中心物流中心。2，相國寺和鬼市子茶坊以及橋市等各種定期市。3，還有交通便利，漕運發達的汴河沿岸。4，軍營附近的區域。5，各個坊巷住宅區。6，以瓦子等大型娛樂設施為中心的娛樂中心。7，金明池這樣在特定時期開放的遊覽地、道會齋會期間的寺廟道觀周邊區域、節日期間（元宵節，中秋節等）的東華門外（伴隨各色慶典而出現臨時茶攤）。四，宋代開封茶館的利用者的身份是多種多樣的，包含了仙人、仕女、鬼、道士、手工勞動者、軍人及其家屬、普通居民、惡少年等城市遊民、官員士大夫等群體。五，宋代開封茶館的空間跟酒店食店、妓館瓦子、邸店客店、寺院道觀等空間具有緊密的聯繫，它們的分佈空間也具有高度的重合性。並且像寺院、邸店、倉庫等設施跟茶館一樣具有多重性質，具有住宿、存放物品等功能。

在唐宋之間城市的發展造就城市市場形態的發展和變化，城市空間記憶也隨之發展變化。

而茶館作為一個聯繫人與人，人與城市空間之間關係的媒介，其發展也同樣受到城市發展的影響。無論其所具有的多重空間性質，還是多重社會功能的特性，以及由其多種身份利用者所引發的多重社會關係，都是這一時期城市發展的具體集中表現。而這種集中具體的表現在時間上是否具有延續性，以及在州縣市等地域社會中是否具有縱向的影響性是筆者想在接下來對南宋臨安和地方茶館的問題時想要探討的。

附錄

表 1: 《東京夢華錄》中的茶館史料

順序	名稱	位置	原文	史料出處	功能
1	李四分茶	州橋南面的街道的東面	御街一直南去，過州橋，兩邊皆居民。街東車家炭，張家酒店，次則王樓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鋪、曹婆婆肉餅、李四分茶	《東京夢華錄》卷二	分茶
2	薛家分茶	州橋南的街北	街北薛家分茶、羊飯、熟羊肉鋪。向西去皆妓館舍，都人謂之院街。	《東京夢華錄》卷二	分茶
3		御廊西	御廊西即鹿家包子。餘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藥鋪、居民。	《東京夢華錄》卷二	分茶、民居、香藥店。
4		西通新門瓦子以南、殺豬巷以南	其御街東朱雀門外，西通新門瓦子以南殺豬巷，亦妓館。以南東西兩教坊，餘皆居民或茶坊。	《東京夢華錄》卷二	茶肆、民居、教坊、妓館等設施的關聯。
5		從行裏角	潘樓東去十字街，謂之土市子，又謂之竹竿市。又東十字大街，曰從行裏角，茶坊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	《東京夢華錄》卷二	茶館經營時間範圍和經營內容範圍擴大。
6	北山子茶坊	舊曹門街	又投東，則舊曹門街，北山子茶坊，內有仙洞、仙橋，仕女往往夜遊吃茶於彼。	《東京夢華錄》卷二	女性對茶館的利用。
7		相國寺	寺三門閣上並資聖門，各有金銅鑄羅漢五百尊、佛牙等，凡有齋供，皆取旨方開三門。左右有兩瓶琉璃塔，寺內有智海、惠林、寶梵、河沙東西塔院，乃出角院舍，各有住持僧官，每遇齋會，凡飲食茶果，動使器皿，雖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辦。	《東京夢華錄》卷三	1, 寺院的飲茶活動。2, 在相國寺開展的定期市。3, 齋會期間可能出現的臨時茶攤。
8	丁家素茶	寺東門大街(相國寺)	寺東門大街，皆是襪頭、腰帶、書籍、冠朵鋪席，丁家素茶。寺南即錄事巷妓館。繡巷皆師姑繡作居住。北即小甜水巷，巷內南食店甚盛，妓館亦多。	《東京夢華錄》卷三	1, 茶館經營範圍與分茶店和素分茶店的重合與關聯。
9		新封丘門大街	馬行北去舊封丘門外祆廟斜街州北瓦子，新封丘門大街兩邊民戶鋪席外，餘諸班直軍營相對，至門約十裏餘，其餘坊巷院落，縱橫萬數，莫知紀極。處處擁門，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飲食。	《東京夢華錄》卷三	新封丘門大街軍營、民居、茶坊、酒店、勾欄、飲食店並立的空間狀況。

10		夜市	冬月雖大風雪陰雨，亦有夜市· · · · · ·至三更方有提瓶賣茶者。蓋都人公私榮幹，夜深方歸也。	《東京夢華錄》卷三	流動的茶攤以及夜市上出現的流動茶攤。
11		住宅區	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動使，獻遺湯茶，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門。	《東京夢華錄》卷五	茶是人際交往中重要的媒介。
12		正月十六燈市	諸坊巷、馬行，諸香藥鋪席、茶坊酒肆，燈燭各出新奇。· · · · · ·殿前班在禁中右掖門裏，則相對右掖門設一樂棚，放本班家口，登皇城觀看。	《東京夢華錄》卷六	節日期間出現的臨時茶攤。
13		金明池	池苑內除酒家藝人占外，多以彩幕繖絡，鋪設珍玉、奇玩、匹帛、動使、茶酒器物關撲。· · · · · ·出九和合有名者，任大頭、快活三之類，餘亦不數。池苑所進奉魚藕果實，宣賜有差。	《東京夢華錄》卷七	金明池開放時所出現的眾多茶攤、食店等設施。

表 2: 《夷堅志》等筆記小說中茶館史料

順序	史料出處	時間	場所	登場人物	功能
1	《夷堅志》《米張家》		京師（開封東水門外汴堤）	販夫、婦人、商人、鬼	米商、寄存、招募勞力、牙人
2	《夷堅志》《宣和龍》	宣和元年	京師（開封縣衙前）	龍、卒、街吏	
3	《夷堅志》《京師浴堂》	宣和初	京師（尚書省門旁）（開封）	官員、下僕、惡少年、賊曹	休息、浴堂、殺人奪財、賣人肉
4	《夷堅志》《秦楚材》	政和間	汴河旁	下僕、惡少年、道士（仙人）、商人、士人	邸店
5	《夷堅志》 《石氏女》	北宋	京師（開封）	石氏幼女、乞丐、呂洞賓	飲茶
6	《邵氏聞見錄》卷七	漢乾末	封丘巷	范質、土偶短鬼	休息、休閒
7	《春渚紀聞》《瓢內出汞成寶》	北宋	相國寺橋	任德翁之猶子、道士	談話場所
8	《括異志》《郭上灶》	天禧中	東京州橋	道士、呂公	飲茶
9	《泊宅編》卷四		京師（開封）	士人、看相者	談話、會友
10	《後山談叢》卷五	太祖時期（北宋）	開封東華門外	太祖	
11	《鐵圍山叢談》卷二	政和初（清明節）	京師（開封執政侍從之門）	快行家者	借火種
12	《墨客揮犀》第二卷	紹聖初	太平兴国寺河上	曾布	素分茶
13	《萍洲可談》卷一		太學	太學生	飲茶集會

圖 1: 《東京夢華錄》茶館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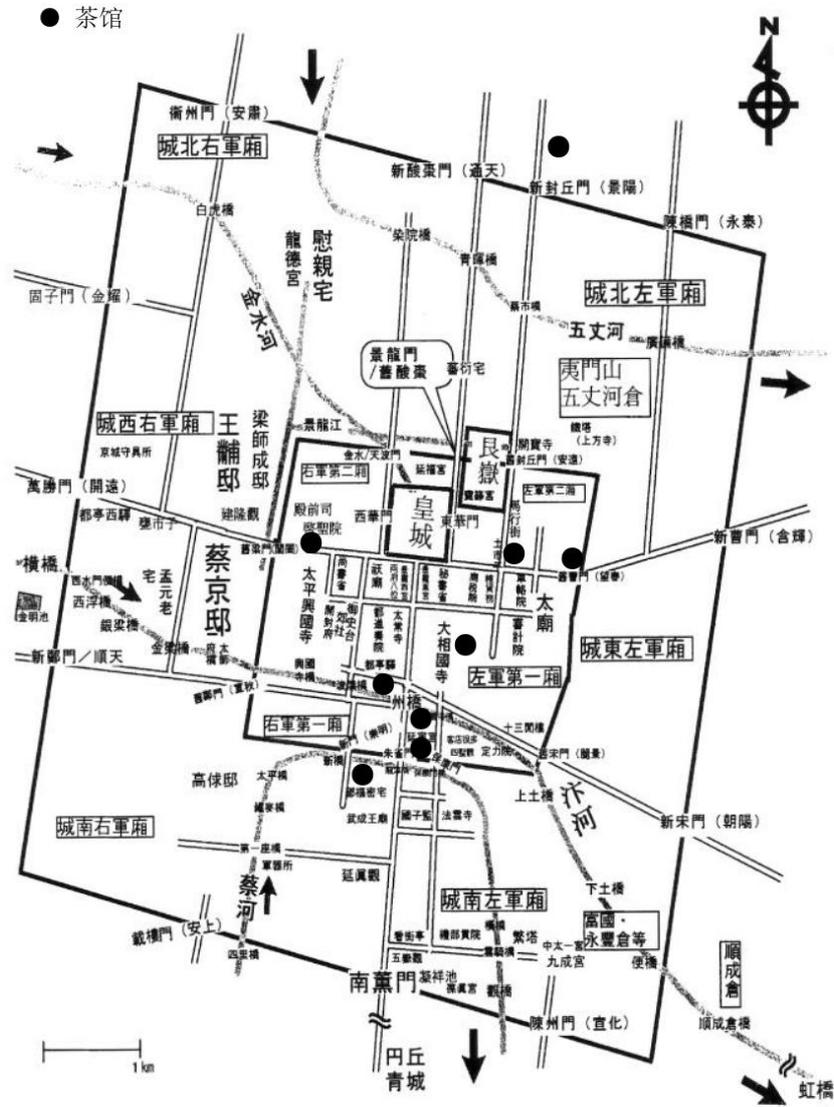


圖 2: 《夷堅志》茶館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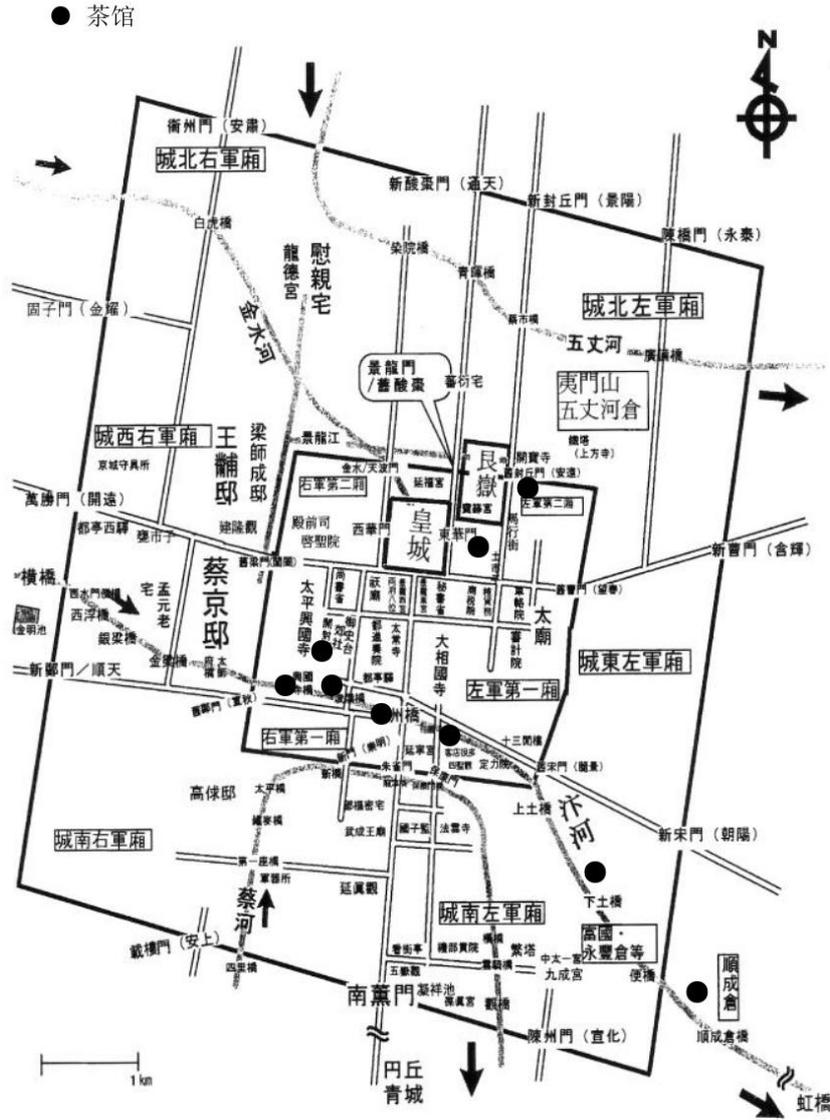


圖 3：開封茶館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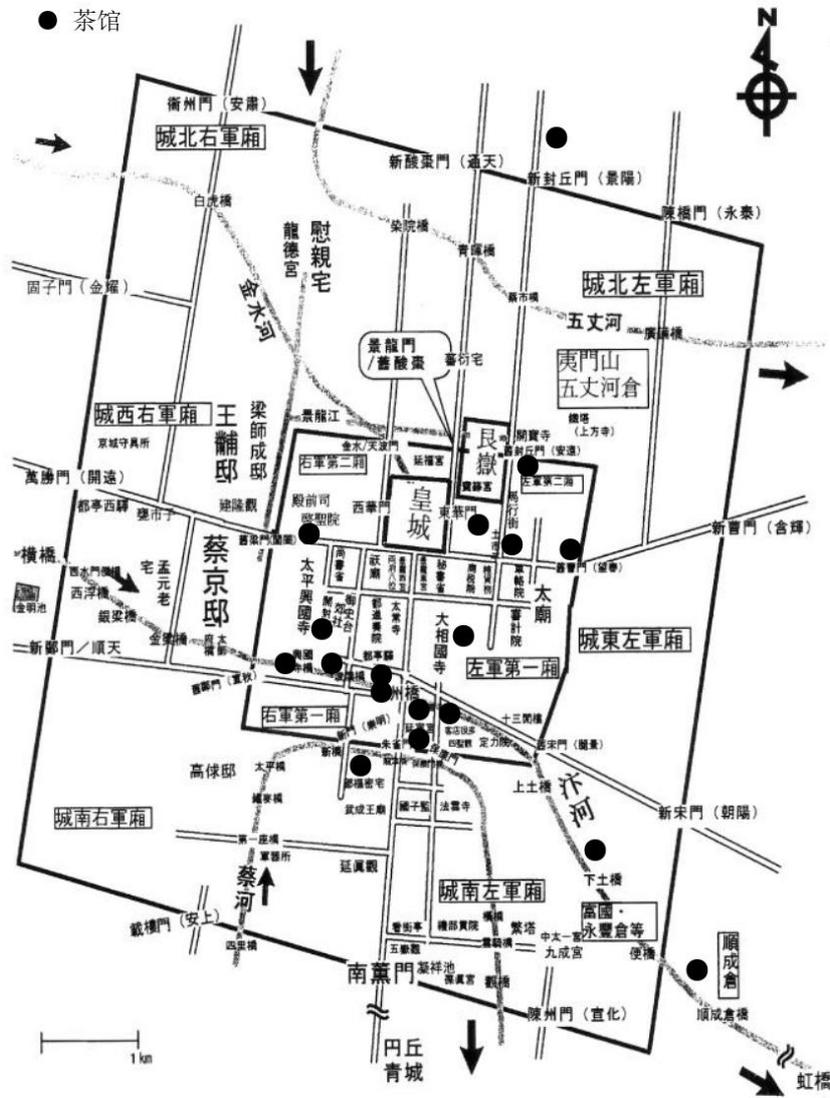


圖 4：開封瓦子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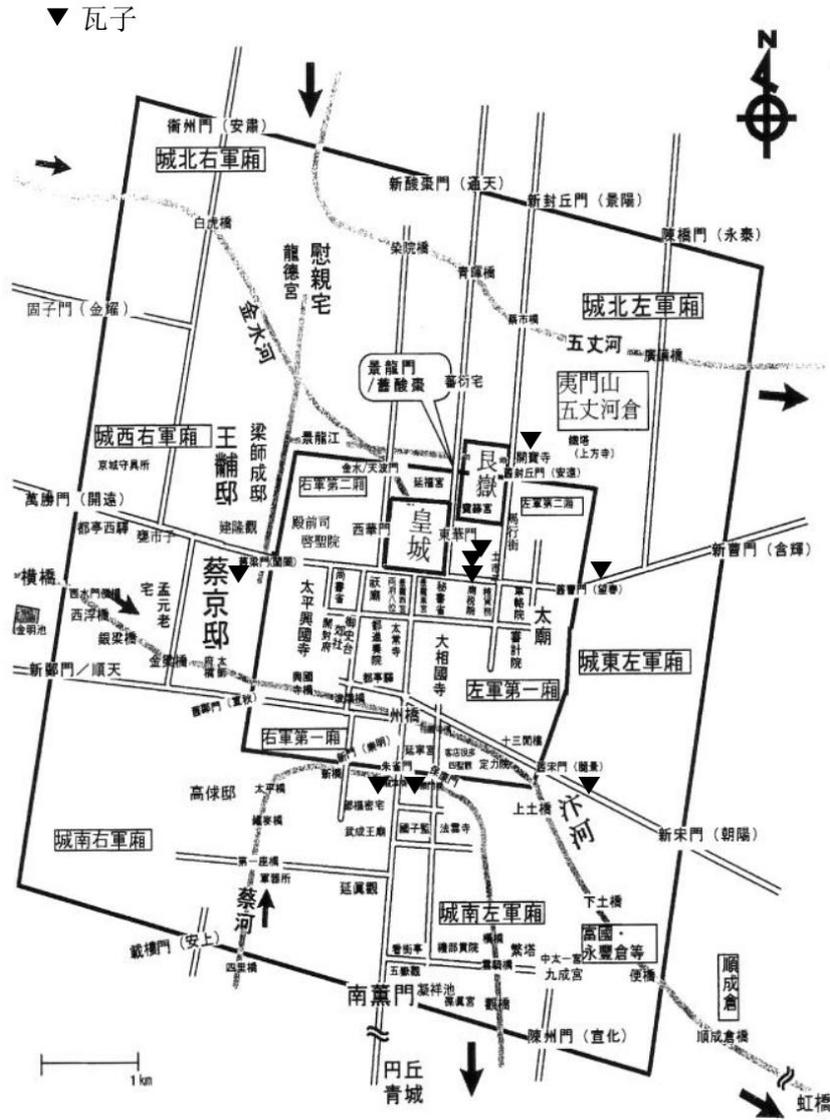


圖 5：開封妓館分佈圖

★ 妓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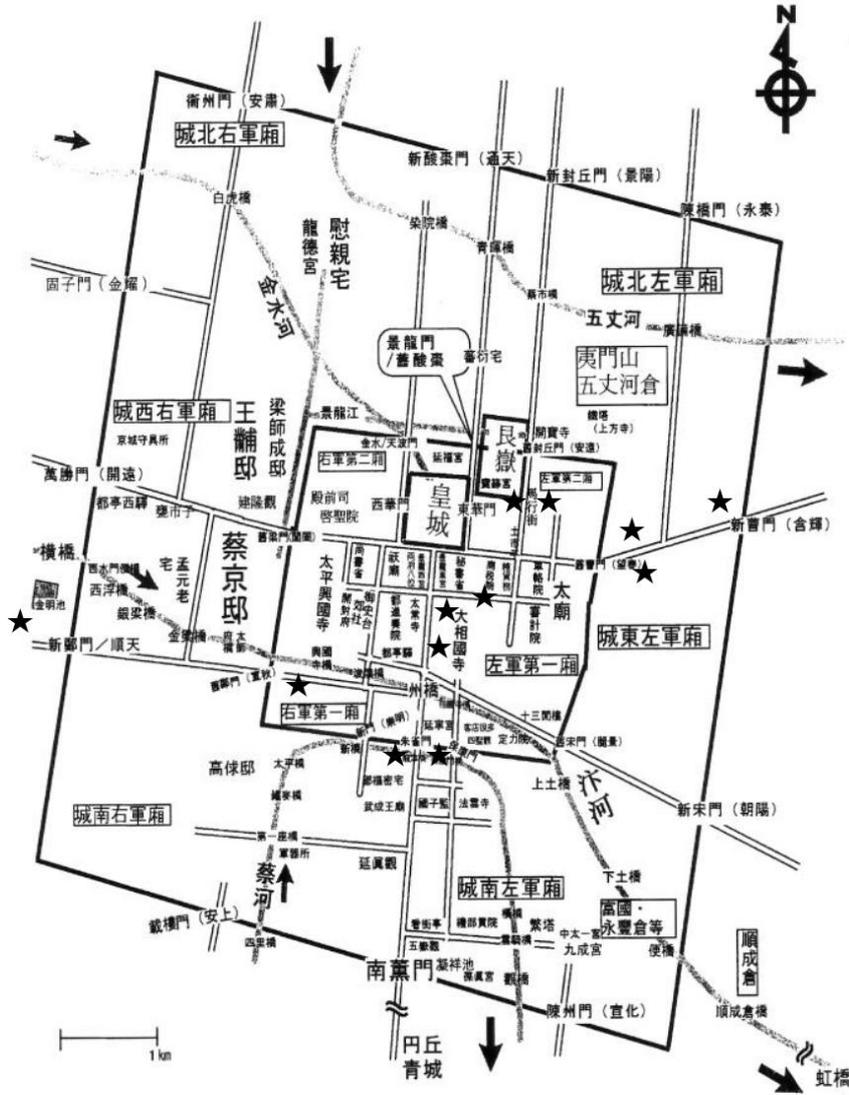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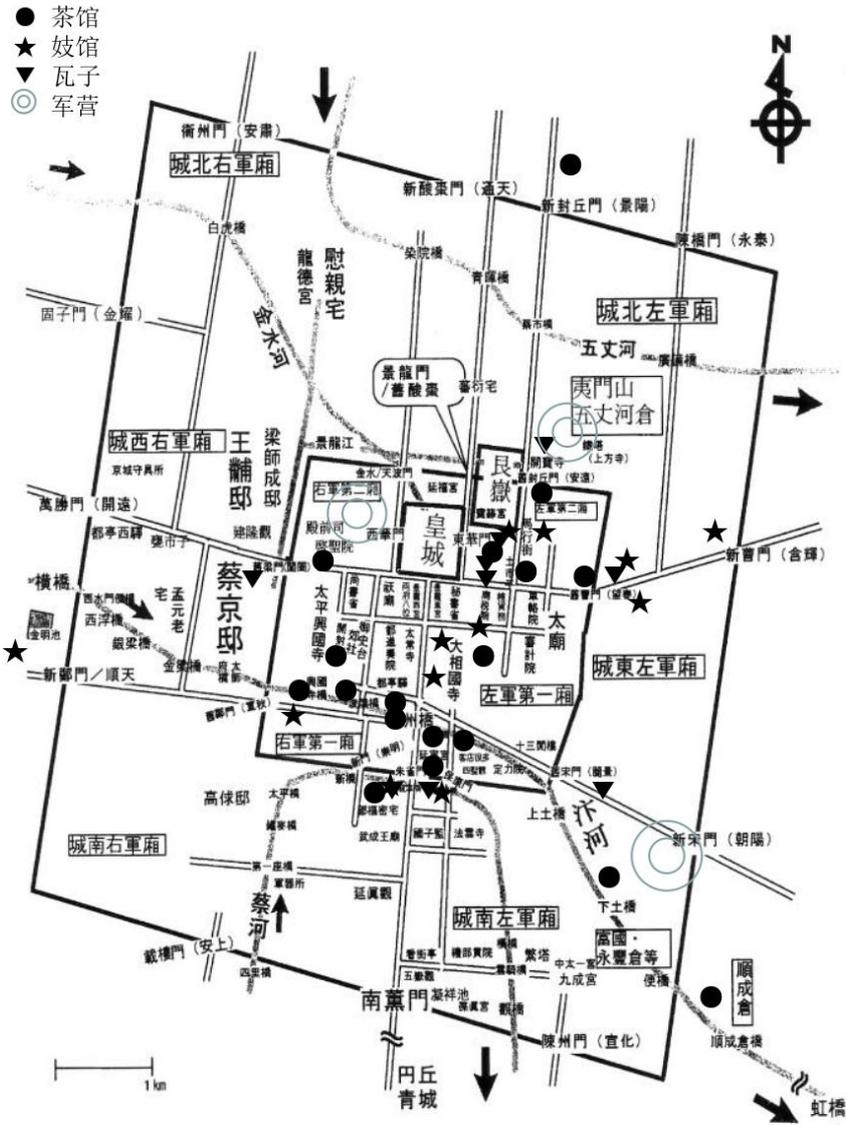


圖 6：北宋開封茶館分佈預想圖



## 第二章：南宋臨安的茶館

### 一，緒論

宋代茶館在形式與內容上都有著獨特之處，兩宋之間茶館也有明顯的發展變化，其發展在中國茶館發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目前對宋代茶館的研究成果頗豐，關於茶館類型、經營內容和社會功能的整理和總結的基礎性研究，序章部分有詳細介紹，不再一一贅述。

本章在現有城市史料基礎上利用宋代筆記小說等史料，建立關於宋代茶館的史料資料庫，再結合都市空間的研究詳細深入系統的探討關於宋代茶館的問題。依照此方法論在第一章中對開封茶館的狀況進行了比較詳細的梳理，從多個側面對北宋的茶館進行了考察。瞭解到北宋開封茶館具有多重經營內容和多重社會功能的特徵。從其分佈空間及其周邊空間形態來看，可知影響茶館分佈的因素大致與其所在區域的商業、物流、交通、人口等因素密切相關。考慮到上述問題，筆者認為同樣需要對南宋臨安的茶館進行詳細的考察與探討，才能更清晰的瞭解宋代茶館的發展和全貌。

關於南宋臨安茶館的史料可以大致分為兩類：首先是《都城紀勝》、《夢梁錄》、《西湖老人繁勝錄》、《武林舊事》、《西湖遊覽志》等城市史料，作為概括性的茶館相關史料需要對其進行詳細梳理和分析。在此筆者把城市史料中關於茶館的史料抽取出來製成了（表1）。其次是《夷堅志》這樣能夠展現豐富的社會風貌並對利用茶館的場景進行詳細描述的筆記小說史料，筆者搜索了《中國基本古籍庫》和《全宋筆記》中茶館相關史料，將其進行整理製成（表2）。並將（表1）和（表2）中茶館的位置在地圖上表現出來製成圖2《南宋臨安茶館分佈圖》<sup>1</sup>，以便對茶館分佈問題進行更直觀的分析和展示。

### 二，南宋臨安茶館的形態及特徵

#### 1，城市史料中的茶館

##### (1) 南宋臨安茶館的稱謂及茶館的界定

在對茶館進行詳細的考察之前，需要先對茶館的概念進行定義，以便確定本文的考察範圍。宋代的時候，茶館的稱謂還未出現，其出現是在明清時期<sup>2</sup>。塩卓悟對《夷堅志》中宋代茶館的稱謂進行了統計：主要包括茶肆、茶店、茶邸、茶坊、賣茶家、鬻茶果等稱謂，其中以茶肆使用頻率最為普遍<sup>3</sup>。但根據筆者對城市史料的統計結果（表1）來看：23例中“茶坊”的稱謂有17例，“茶肆”的稱謂有2例。而參考筆者對筆記小說史料的統計結果（表2）來看：15例茶館相關史料中以“茶肆”為稱謂的有13例。二者結合來看在南宋時期茶館大多以“茶坊”，“茶肆”為稱謂。為何兩種不同類型的史料中關於茶館稱謂的記載會差異巨大，並且稱謂的不同是否代表茶館類型的不同等問題，筆者將會在之後嘗試進行分析和論述。

關於茶館的界定，徐軻認為茶館是“一種以飲茶活動為中心的綜合性群眾活動場所”<sup>4</sup>，把以賣茶為主要經營內容的各種經營形式納入到了茶館的討論範圍內，並把提茶瓶者這種走

<sup>1</sup> 圖2由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中圖《3A南宋杭州城內外的瓦子和酒庫分佈圖》改繪。

<sup>2</sup> 本文為了不造成混淆，在文中還是主要使用茶館的稱呼，在史料分析時則按照史料原文來書寫。

<sup>3</sup> 塩卓悟《南宋江南的外食產業：從〈夷堅志〉看宋代的酒肆、茶肆與食店》，《中國飲食文化》第14卷第1期，2018年，第197-198頁。

<sup>4</sup> 徐軻《宋代茶館研究—以北宋的開封和南宋的臨安為中心》，第10頁。

街串巷的經營形式歸屬為流動的茶攤，從而對茶館進行廣義上的討論。筆者認為茶館應該具有茶水和飲茶空間這兩個基本要素，也就是說一個以飲茶為基本經營，並且能夠提供飲茶場所的設施可稱之為茶館。因此在本文的討論中包含茶肆、茶坊，同時也包含提供飲茶座位的“浮棚”形式的茶攤<sup>5</sup>。而提茶瓶者<sup>6</sup>以及在西湖上賣茶水的小船<sup>7</sup>不能提供飲茶場所，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茶館，但是其以茶水販賣為主要經營內容，在實際意義上發揮了茶館的功能，是茶館物理空間上的延伸和補充，因此在文中也進行簡單的梳理和概括。

## (2) 南宋臨安茶館的各種類型和茶館的專門化發展

### ①茶館

首先我們通過分析（表 1）中的相關史料來瞭解宋代臨安茶館的具體經營內容，以及其發展特徵。

《都城紀勝》茶坊：大茶坊張掛名人書畫，在京師只熟食店掛畫，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冬天兼賣搗茶，或賣鹽豉湯，暑天兼賣梅花酒。紹興間，用鼓樂吹梅花酒餉，用旋杓，如酒肆間，正是論角，如京師量賣。茶樓多有都人子弟占此會聚，習學樂器，或唱叫之類，謂之“掛牌兒”。人情茶坊，本非以茶湯為正，但將此為由，多下茶錢也。又有一等專是娼妓弟兄打聚處；又有一等專是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老處，謂之“市頭”。水茶坊，乃娼家聊設桌凳，以茶為由，後生輩甘於費錢，謂之幹茶錢。提茶瓶，即是趁赴充茶酒人，尋常月旦望，每日與人傳語往還，或講集人情分子。又有一等，是街司人兵，以此為名，乞見錢物，謂之覲茶。<sup>8</sup>

在《夢梁錄》卷十六《茶肆》中有與此段史料相近的記述，並且在內容上較之《都城紀勝》更為詳盡，因此筆者將參考《夢梁錄》中相關內容對此則史料進行整理和分析。首先茶館張貼字畫並根據時令賣不同飲品，以商品的多樣性和變化性來吸引顧客。而在茶館內張貼字畫和置放奇異植物供客人觀賞，這一經營手段在南宋時才出現。說明南宋臨安茶館延伸出了觀賞性的功能，增強了茶館的休閒娛樂功能，說明其經營手段也更加成熟進步。其次，史料一還記載了各種類型的茶館，一是掛牌兒：茶坊中經常有京師的富室子弟們在此處聚會，並在此學習樂器或是唱叫之類的音樂形式，稱之為掛牌兒。此處的茶坊功能除了單純的喝茶之外，還具有聚會娛樂的功能。二是人情茶坊：主要經營內容並不是賣茶，而是借飲茶的名義收取金錢。人情茶坊有很多種：●專門供龜公們相聚飲茶的茶館<sup>9</sup>。●市頭茶坊：專門是各個行業行老們聚集的茶坊<sup>10</sup>。●水茶坊：就是娼家們擺設桌椅，以飲茶為由頭，讓後生子弟們心甘情願在此耗費錢財，實為假借茶館之名的妓院。●提茶瓶者：也就是提著茶瓶到處走街串巷賣茶的人，每天替人傳播消息或是做中間人。從各種類型的茶館來看，各自皆有固定的消費群體，在其經營內容上都各具特色。比如：掛牌兒茶坊的固定消費群體為都城中的富

<sup>5</sup>（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錄》，第 319 頁。

<sup>6</sup>提茶瓶者形象可參見圖 1。

<sup>7</sup>（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二《湖船》，第 213 頁。

<sup>8</sup>（宋）耐得翁《都城紀勝》，第 11 頁。

<sup>9</sup>《夢梁錄》卷十六《茶肆》中，“娼妓弟兄”被改為“五奴”這個稱呼，而五奴在宋代則指在妓院工作的龜公。

<sup>10</sup>也就是各個行業的行老們，在茶坊裏招募工人，買賣伎人。他們在此處交流各自的商業資訊，從事商業活動，此時的茶坊其實就是一個商業資訊的傳播與交換的中心。由於行老們在此彙聚，很多想要找工作的工人，或者是買賣人口的人牙應該也會在此處彙聚，這也使得茶坊和牙行，牙人產生了深切的聯繫。

室子弟，其經營內容也以音樂的教授和演出為特色。而市頭茶坊的固定消費群體則為各色工人及行老。水茶坊的固定消費群體則是年輕有資財的後生們。不僅是富室子弟、龜公、行老們有專門聚集的茶館，就連士大夫群體也有專門聚集的茶館。《夢梁錄》卷十六《茶肆》就提到大街上幾個吵鬧的茶坊不是君子駐足之地，而中瓦的王媽媽家茶肆、蔣檢閱茶肆等幾處都是士大夫和朋友們聚會的地方。

以上可以看出，南宋臨安茶館在其經營手段和社會功能方面都有新的發展，茶館中具有多種形式的娛樂活動，其娛樂休閒功能得到很大發展，也更接近後世茶館休閒的意象，並且南宋臨安的茶館各具經營特色，各自擁有不同的消費群體，其經營模式也逐漸發展為飲茶+自身的特色經營內容=吸引到不同的消費群體的更加成熟的經營模式。從經營內容的豐富、經營手段的進步和多樣、以及經營模式的成熟等方面來看，南宋臨安茶館的發展具有向成熟化、專門化發展的趨勢。

《都城紀勝》酒肆：除官庫子庫腳店之外，其餘皆謂之拍戶，有茶飯店，謂兼賣食次下酒是也。<sup>11</sup>

在這則史料中提到茶飯店，且兼賣吃食用以下酒。其主要經營內容是賣酒和食物，而茶飯店是飲酒吃飯的場所。

《都城紀勝》食店：都城食店，多是舊京師人開張，如羊飯店兼賣酒……南食店謂之南食，川飯分茶。蓋因京師開此店，以備南人不服北食者，今既在南，則其名誤矣。<sup>12</sup>

以上兩則史料主要記述了分茶飯店相關的信息，其中說到川飯分茶店的開設是因為有些南方人不習慣北方的飲食。此處的川飯分茶店主要經營內容還是賣食物為主。關於史料中出現的“分茶店”在拙作<sup>13</sup>中對分茶店與茶館的關係進行了論證，筆者認為分茶店可以看作是一種兼賣茶水吃食廣義上的茶館。通過以內容也可以看出茶館功能與食店、酒店的功能有相當大的重合之處，二者之間的聯繫密切。

## ②流動的茶攤

除了以上論述的各種類型的茶館之外，在南宋臨安的茶館中有一種流動性的茶館普遍出現，它們沒有固定的場所，其消費群體也不固定，但是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對於這種流動茶攤的詳細探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的認識到宋代茶館的全貌，認識到在都市空間中所呈現出的茶館的形態和構造。流動的茶攤其出現的地點，時間和場所各有不同。例如以下史料中就記述了關於流動茶攤出現的不同場景。

### ●宗教集會時催生的臨時茶攤

《都城紀勝》社會：又有茶湯會，此會每遇諸山寺院作齋會，則往彼以茶湯助緣，供應會中善人。城中太平興國傳法寺淨業會，每月十七日則集男士，十八日則集女人，入寺

<sup>11</sup>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第7頁。

<sup>12</sup>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第9頁。

<sup>13</sup> 參見拙作《北宋開封茶館考論》，《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第19號，2019年，第40—63頁。

諷經聽法。<sup>14</sup>

該史料中描述了南宋時期有各個群體進行結社並舉行各種活動的社會現象，其中還有人結成茶湯會。而茶湯會就是在寺廟作齋會的時候，以茶湯助有緣人提供給會中善人。其中，參加齋會的有男有女，並且有飲茶的需要。在《夷堅志》丙志卷四《餅店道人》和丙志卷三《道人留笠》兩則史料就有相關的描述。《餅店道人》中很直觀的描述到：“青城道會時，會者萬計。縣民往往旋結屋山下。以鬻茶果。”由此可見舉辦道會、齋會等宗教聚會時，會催生一些臨時攤販，其中也有茶攤。說明此類宗教集會的舉辦地也是臨時茶攤出現的場所。

●西湖沿岸、諸峰寺院、錢塘江岸等遊覽地的“浮棚”茶攤。

《西湖老人繁勝錄》：寒食前後，西湖內畫船佈滿，頭尾相接，有若浮橋。頭船、第二船、第三船、第四船、第五船、檻船、搖船、腳船、瓜皮船、小船自有五百餘只。南山、北山龍船數只。自二月初八日下水，至四月初八日方罷。還渾木、撥湖盆，它郡皆無。節日大船，多是王侯節相府第及朝士賃了，餘船方賃市戶。岸上遊人，店舍盈滿。路邊搭蓋浮棚，賣酒食也無坐處，又於賞茶處借坐飲酒。南北高峰諸山寺院僧堂佛殿，遊人俱滿。都門閑夜更深，遊人轎馬盡絕，門方閉。<sup>15</sup>

這則史料不僅描述了節日期間西湖和諸山寺院僧堂佛殿遊人如織的景象，還描寫了為遊人提供服務的店舍浮棚客人滿座的景象。說明在西湖寺院等各處熱門的風景名勝區也存在著大量為遊人提供吃食飲品等服務的店舍和浮棚，並且這些設施的數量在節日期間，遊人眾多時更有大量增加的可能。所以賣茶浮棚的存在和增加也是可以預見的。不僅僅是西湖及其周邊的風景遊覽區，在錢塘江觀潮時也會出現類似的情景，在《西湖老人繁勝錄》關於中秋的記載中描述了在中秋時節，水軍在江上演練，人們在浙江亭上觀潮，江岸上的帳篷相連，連轎子和馬都無處停放的熱鬧景象<sup>16</sup>。《夢梁錄》卷四《觀潮》<sup>17</sup>中更是對西湖遊覽和錢塘江觀潮的盛景進行了描述，可以看出人們對這兩處景勝的喜愛。

### ③廣義上的茶館

●西湖上賣茶水的湖船

《夢梁錄》卷十二《湖船》：杭州左江右湖，最為奇特，湖中大小船隻，不下數百舫……湖中南北搬載小船甚夥，如撐船賣買羹湯、時果；……更有賣雞兒、海蜆、螺頭，及點茶、供茶果、婆嫂船、點花茶、撥糊盆、潑水棍小船，漁莊岸小釣魚船。湖中有撒網鳴榔打魚船，湖中有放生龜鱉螺蚌船，並是瓜皮船也。又有小腳船，專載賈客妓女、荒鼓板、燒香婆嫂、撲青器、唱耍令纏曲，及投壺打彈百藝等船，多不呼而自來，須是出著發放支槁，不被哂笑。若四時遊玩，大小船支，雇價無虛日。<sup>18</sup>

<sup>14</sup>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第15頁。

<sup>15</sup>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錄》，第319頁。

<sup>16</sup>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錄》，第324頁。

<sup>17</sup> (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四《觀潮》，第121頁。

<sup>18</sup> (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二《湖船》，第213頁。

該史料記述了在西湖上大小數百只船往來遊玩的熱鬧景象。這些船隻從南岸至北岸不僅搬運客人和商貨，還在船上販賣羹湯、時令水果、酒和各色茶湯茶點，儼然就是西湖上移動的商鋪和酒肆茶館。不僅如此，還有一些小船專門乘載商人妓女，可以在船上聽曲玩耍。在節日期間，湖上游船更是忙碌，節日當天更是得高價才能雇得船隻，可見人們遊湖的熱情。由此看出：①西湖是臨安都城人們休閒遊玩的好去處，對臨安的人們來說西湖及其沿岸周邊是非常重要的娛樂休閒空間。②西湖上的飲茶、遊戲、聽曲等都與自然風光相結合，而各色船隻充當了人們休閒娛樂的工具，可以說這些船隻就是食店、酒店、茶館、妓院、勾欄等物理空間上的延伸，形成了廣義上的酒店、茶館、妓院、勾欄。這些湖船在給遊湖的人們提供了飲食、娛樂等服務的同時，也擴展了城市休閒娛樂的形式及物理空間。③人們在西湖的遊玩四時不斷，節日期間更是遊人如織。可見臨安休閒娛樂生活的豐富以及人們對遊玩的熱情。

#### ●提茶瓶者。

除了以浮棚茶攤形態出現的臨時茶館，還有一種以提著茶瓶販賣茶水為形式的廣義上的茶館。從提茶瓶者在史料一和《夢梁錄》卷十六《茶肆》中相關內容來看，提茶瓶者是一個在街巷內，走街串巷沿門點茶的形象。但是他們除了賣茶水外，還是為鄰里傳遞消息斡旋事務的中間人。上述史料《都城紀勝》茶坊一則中還提到：“街司衙兵百司人以點茶為名，向店鋪索要錢物，並稱之為齷茶。”，其中的街司衙兵等實質上是強行勒索錢物，卻還要借點茶之名，可見茶在人們交往禮儀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sup>19</sup>。《夢梁錄》卷十三《夜市》中有“至三更後，方有提瓶賣茶。冬間，擔架子賣茶，餛子、慈茶始過。蓋都人公私營幹，深夜方歸故也。”<sup>20</sup>的記述，其中描述了杭州夜市的繁華，並提到在三更後才有提茶瓶賣茶的，方便了深夜才回的都人。可見這種提茶瓶者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提供的便利。

根據以上對（表1）及相關的史料分析來看：①茶館的類型是多樣化的，有主營飲茶的茶館、飲食茶館、休閒娛樂茶館、人情茶館、流動的茶攤以及廣義範圍上的茶館等幾種類型。②茶館的娛樂休閒功能得到新的發展，不僅茶館內的各種娛樂形式多樣化，飲茶更是與自然環境相結合，在自然環境中延伸出了廣義上的茶館，不僅豐富了茶館的休閒意象，更是讓城市休閒娛樂在物理空間上得到進一步擴展。③南宋臨安的茶館還出現了向專門化發展的趨勢，在經營模式上更加成熟。④在南宋臨安流動的茶攤普遍出現，出現的時間及地點包括：一年四季的遊覽地（西湖，錢塘江，寺廟道觀等）；節日期間的遊覽地；佛誕辰，齋會等各色宗教集會的舉辦地。這些流動茶攤的出現大大延伸了茶館的時間和物理空間，讓茶館在都市空間及社會生活中發揮了更廣泛的意義。

## 2, 筆記小說中的茶館

相對於城市史料而言，筆記小說有關茶館的內容更為分散，大多是以茶館為舞臺而上演的各種精彩故事，展現了茶館的另一側面，讓人更加瞭解到茶館在社會生活中的形象和地位。

### (1) 各種類型的茶館及其利用者

#### ①以茶館為舞臺的男女姻緣及鬼怪故事

在筆記小說中記錄了很多鬼怪故事，其中許多是以茶館為舞臺，並且相當一部分與男女之間的戀愛姻緣故事相關。在《鬼董》中就講述了都民質庫樊生在茶肆中遇鬼的故事。

<sup>19</sup> 沈冬梅《茶與宋代社會生活》中也敘述了飲茶在日常生活和鄰里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sup>20</sup> （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三《夜市》，第222頁。

《鬼董》卷四：都民質庫樊生與其徒李遊湖上某寺閣，得女子履，絕弓小，中有片紙，曰：“妾擇對者也。有姻議者，可訪王老娘問之。”樊生少年心方蕩，得之若狂，莫知其何人。他時過升陽宮庫前，聞兩姬踵其後相語笑，多道王老娘，伺其入茶肆，亦往焉。兩姬謂淪茶僕曰：“王老娘在乎？”曰：“在。”“為我道欲見。”僕自後呼一姬出，四五十矣。兩姬迎，語之曰：“陶小娘子遣我問親事何如？”王曰：“未得當人意者。且彼自以鞋約：得者諧之。”<sup>21</sup>

這則故事中的樊生通過茶館的主人或是長期在茶館中生活的王老娘在中間斡旋，與陶小娘達成了事實上的婚姻關係。王老娘顯然是受陶小娘所托為其尋找夫婿，由茶僕從後面叫出王老娘這一點來看，王老娘或許就是茶肆主人，至少是長期在茶肆活動的。而這種以茶館主人或者是茶館裏的中間人為媒介，為年輕男女達成婚姻關係則是茶館展現出的社會生活的另一面。《夷堅志》支乙志卷二《茶僕崔三》一則描述了半夜三更女鬼上門，從而與崔三成就好事的故事<sup>22</sup>。說明在宋代人們的觀念中在茶館中議婚或者茶館主人兼任媒人的情況也是存在的，而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茶館在向人們提供交流場所的同時或許還發揮了婚介的社會功能。另外在《夷堅志》丁志卷十二《淮陰民女》一則中描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女鬼在茶肆現身，並向答應為自己作法事的僧人進行勸誡，勸誡僧人不要因飲酒影響自己的法事<sup>23</sup>。此則故事除了反映宋代有為亡故的人請僧人誦經超度的習俗外，僧人在茶肆內聚集飲酒則說明茶肆除了經營內容廣泛外，還是各色人等聚集交流的空間。

## ②茶館與城市中的無賴

臨安城被稱為百萬都市，人口眾多。在城市人口增加後，城市裏無業的遊民就可能成為無賴。林航在其論文中指出：“南宋臨安城的遊手、無賴、流氓的數目更是大得驚人。這些流氓成天偷雞摸狗、拐賣人口、調戲婦女，甚至開黑店、膾炙人肉，實在是無惡不作，讓人乍舌。”<sup>24</sup>在筆記小說中這樣的記載也屢見不鮮，其中也有一些無賴少年與茶館產生了深刻的聯繫。

《癸辛雜識》別集下《吳生坐亡》：故都向有吳生者，專以偏僻之術為業，江湖推為巨擘。居朝天門，開大茶肆，無賴少年競登其門。<sup>25</sup>

該史料中的主人公吳生在江湖上非常有地位，開了一間大茶肆，吸引了大批的無賴少年聚集在此。關於無賴和茶館的聯繫在《中吳紀聞》卷六《凌佛子》<sup>26</sup>中也有體現，主人公凌佛子“書室之前有一茶肆，日為羣小聚會之地，公與賓客談話，甚苦其喧。”可知書室前的茶肆常有無賴聚集，且十分的吵鬧，主人公深受其擾。這兩則史料中還只是看到無賴少年們在茶館的聚集，在《夷堅志》補志卷八《京師浴堂》中則有無賴少年們買食人肉的說法。在林

<sup>21</sup> (宋)佚名《鬼董》卷四，《全宋筆記》第九編第二冊，大象出版社，2018年，第153頁。

<sup>22</sup> (宋)洪邁《夷堅志》支乙志卷二《茶僕崔三》，第805頁。

<sup>23</sup> (宋)洪邁《夷堅志》丁志卷十二《淮陰民女》，第642頁。

<sup>24</sup> 林航《南宋臨安城的流氓無賴》，《文史天地》第12期，2017年，第65-68頁。

<sup>25</sup>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下《吳生坐亡》，《全宋筆記》第八編第二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292頁。

<sup>26</sup>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卷六《凌佛子》，《全宋筆記》第三編第七冊，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269頁。

航論文中更是列舉了無賴流氓們在都市中的種種惡行<sup>27</sup>。而無論是江湖巨擘開設茶館，還是無賴少年聚集在茶館，都顯示了茶館的開放性。

### ③茶館中的科舉士人

在上文城市史料的分析中，我們瞭解到士大夫們也有其特定出入的茶館。但對於他們在茶館中活動的瞭解，僅限於茶館聚會層面。在筆記小說中則描繪了很多科舉士子利用茶館的場景。

《夷堅志》支丁志卷三《班固入夢》：乾道六年冬，呂德卿偕其友王季夷（喁），魏子正（羔如）上官公祿（仁）往臨安，觀南郊，舍於黃氏客邸。王、魏俱夢一人，著漢衣冠，通名曰班固。既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臨去云：“明日暫過家間少款可乎？”覺而莫能曉。各道夢中事，大抵略同。適是日案閱五輅，四人同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說漢書。”相與笑曰：“班孟堅豈非在此邪！”旋還到省門，皆覺微餒。入一食店，視其牌，則班家四色包子也。且笑且歎，因信一憩息一飲饌之微，亦顯於夢寐，萬事豈不前定乎！<sup>28</sup>

該史料中四人坐在嘉會門外的茶肆，並看到用紅紙書寫的“今晚說講《漢書》”的廣告，此處茶肆的經營者是以一種醒目的廣告方式來向客人宣傳其講書的經營特色。除了在茶館裏聽書之外，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們在茶館裏交流並等待科舉考試結果也是經常出現的場景之一。比如《夷堅志》支戊志卷十《李汪二公卜相》一則就描繪了參加完省試的汪聖錫與同輩十餘名士人們聚集在茶肆中交流時，遇到一個蔔者並預言汪聖錫會高中狀元的故事<sup>29</sup>。《錢塘遺事》卷十中亦描述了相關的場景<sup>30</sup>。在科舉結果出來唱名之後，出現了“若自有車馬，雖不用支散，然群不逞隨之，呵殿元者數十為隊，所費亦不貲。不若只行出內門前茶店中，待其人散，徐行歸耳。”的情況，本來該隨著殿元們遊街的十幾人儀仗隊，由於資費太多且圍觀人群太多，至內門茶店中便可，等到人群散去再慢慢回去。這裏可以看出內門前茶店一是距離宮城較近，二是聚集的士子較多。

以上幾則故事展現了茶肆主人斡旋男女之間的婚姻，鬼怪在茶館中登場，城市中的無賴在茶館中集會，科舉士子在茶館中集會交談以及在茶館中聽書的場景。茶館作為一個開放的空間，成為各色人們聚集的場所。

## (2) 茶館的多功能經營

南宋臨安的茶館不僅僅具有茶館的功能，同樣有與別的行業同時兼營的情況，其中與仲介牙行的聯繫尤其深刻。關於宋代的牙人及牙行在商品流通和社會經濟中的重要位置，在斯波義信關於宋代商業的研究<sup>31</sup>以及宮澤知之關於宋代牙人的研究<sup>32</sup>中都有詳細的論述。斯波義信指出：“市場規模越小兼幹其他行業的經紀人就越普遍，尤其顯眼的是牙鋪主人兼營零售

<sup>27</sup> 林航《南宋臨安城的流氓無賴》中概括了臨安城無賴們的幾類惡行：1，市井無賴，活動猖獗。2，流氓集團，設局行騙。3，寺廟裏的騙色流氓

<sup>28</sup> （宋）洪邁《夷堅志》支丁志卷三《班固入夢》，第991頁。

<sup>29</sup> （宋）洪邁《夷堅志》支戊志卷十《李汪二公蔔相》，第1133頁。

<sup>30</sup> （宋）劉一清《錢塘遺事》卷十《擇日唱第》，《全宋筆記》第八編第六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271頁。

<sup>31</sup> 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1968《宋代商業史研究》，稻禾出版社譯本，1997年。

<sup>32</sup> 宮澤知之《宋代中国の国家と經濟—財政・市場・貨幣—》，創文社，1998年。

業和店主牙人兼營旅館業。”<sup>33</sup>由論述來看，在宋代牙人或者牙行兼營別業似乎是很常見的情況。茶肆主人兼職牙人的情況也能在史料中得到印證。在筆記小說《鬼董》的第二卷就描述了一個茶肆姥收了重金為一男子牽橋搭線成就男子與美人姻緣，最終發現美人為水怪所化的故事。

《鬼董》卷二：秦熺之客洛人周浩，卜居西湖，鄰邸有白衣少婦來寓，艷冶而慧。始見猶自匿，稍久，目成心通。叩諸鄰，鄰曰：“汴人李氏。夫死，服將除，方謀再行。”浩厚致媒幣室之。婦能先事中浩意，相得甚歡。歲餘，觀濤於江，見雙鬟女，美出妻右，心慕之。茶肆姥曰：“此女居六和塔，父母亡矣，獨與姨處。方願以樂藝自鬻。”浩捐金數千，方獲焉。始至其家，妻妾順比如麤墳。後忽忿爭，浩諭不可解，至相毆擊。<sup>34</sup>

在這則史料中講述了洛人周浩客居在西湖，先後通過鄰人和茶肆姥娶得妻妾，最終發現兩者皆是水怪所化的故事。周浩兩次通過客邸鄰人和茶肆姥作為中間人周旋而娶得妻妾。第一次是周浩看到到客邸投宿的李氏，主動向鄰人詢問，而詢問的這個鄰人應該就是周浩住所旁的邸店的主人。從鄰人對周浩的回答來看，鄰人對李氏的個人情況非常的清楚，並且主動提到“夫死，服將除，方謀再行。”，示意周浩可以與李氏論及婚姻。而周浩也確實酬以豐厚媒金娶得李氏。從這裏可以看出，鄰人應該是充當了中間人的角色。並且鄰人作為邸店的主人，很可能也身兼牙人的職能。在斯波義信的研究中指出很多邸店不僅僅是旅館，還有推銷貨物斡旋買賣的功能，並且提到有一些客店是商人和牙人斡旋買賣的地方，也有一些是店主兼做牙人的情況<sup>35</sup>。而材料中周浩娶妾的過程，其中間人的角色則是由茶肆姥擔當的。茶肆姥對雙鬟女的個人情況非常清楚，從而充當了中間人的角色，使周浩通過給予重金求娶到雙鬟女為妾。以上兩個場景都表現出了茶肆姥和邸店主人與牙人身份的模糊界限。宮澤知之關於宋代牙人的論述中說到：“牙人的本職就是從中斡旋從而使買賣成立”<sup>36</sup>如果說以上史料中還僅僅是展現了茶肆姥和客邸主人作為中間人斡旋男女關係的話，那在《夷堅志》乙志卷七《布張家》一則故事中則直接展現了茶肆主人作為一個布牙人，通過承接大宗的布匹交易而成為富翁的情景。其中的主人公張翁原本是以承接小商布貨的牙人，並開了一間茶肆，一晚張翁救了一個死囚，過了十年之久，這個死囚成了大客商，為報答救命之恩便讓張翁承接了自己大批的布貨買賣。而張翁也由此起家日益富裕。在這則故事中直接展現了牙人和茶肆主人二者兼具一身的情况。而經營者身份屬性的模糊，也讓茶館的性質發生變化，使茶館在日常生活中與牙行產生了深切的社會聯繫。

以上是筆記小說中關於宋代臨安茶館形象的展現，相比較城市史料中的茶館，則展現出了南宋臨安茶館在社會生活中更為豐富的多個側面。結合二者來看可以瞭解到南宋臨安茶館幾個方面的特徵：①臨安城中的茶館發展在其經營模式上更加成熟化，茶館的功能也逐漸分化，形成了以飲茶為基礎增加特色經營內容吸引客人的經營模式。茶館本身也朝著飲茶休閒的發展方向發展，更為專門化。②茶館的娛樂休閒功能得到發展，不僅茶館內的各種娛樂形式多樣化，飲茶更是與自然環境相結合，在自然環境中延伸出了廣義上的茶館，不僅豐富了

<sup>33</sup> 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 1968《宋代商業史研究》，第 403 頁。

<sup>34</sup> (宋)佚名《鬼董》卷二，《全宋筆記》第九編第二冊，大象出版社，2018 年，第 132-133 頁。

<sup>35</sup> 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 1968 年《宋代商業史研究》，第 417 頁。

<sup>36</sup> 宮澤知之《宋代中國の國家と經濟—財政・市場・貨幣—》，第 207 頁。

茶館的休閒意象，更是讓城市休閒娛樂在物理空間上得到進一步擴展。③流動的茶攤在臨安茶館的類別中是非常重要的，它盡可能的減少了茶館的場所的限制，能在各種需要其服務的場景出現，極大程度的便利和豐富了人們的生活，從而更加完善了茶館在社會結構中的存在。④雖然南宋臨安的茶館朝著更為專門化成熟化的方向發展，但是在某些方面一些茶館仍然沒有完全脫開多重功能性的特徵。仍然與牙行、食店等有功能重合之處。⑤南宋臨安茶館的利用者們身份多樣，無賴、士子、鬼怪、商人、女性等在茶館相繼登場，把茶館作為他們活動的重要空間，顯示了茶館的開放性。

### 三，南宋臨安茶館的分佈空間與都市空間

#### 1，城市史料及筆記小說史料中南宋臨安茶館的分佈空間

##### (1) 城市史料中茶館的分佈狀況及其特徵

在瞭解茶館的分佈空間時，首先應該對臨安的都市空間有所認識。現在關於南宋臨安空間的研究有很多，其中斯波義信和高橋弘臣對臨安城空間狀況的研究非常的詳細完整。參考高橋弘臣<sup>37</sup>對臨安城空間形態的考察，來簡單介紹一下臨安城的空間情況。臨安城的空間呈現出由南至北的長條狀，城內的最南端是宮城，宮城的西面則是鳳凰山-萬松嶺-吳山一帶的區域，主要分佈了禁軍軍營和一些官廳；宮城的北面則是各級官署和重要的祭祀場所太廟。由朝天門一直向北，臨安城的空間則被御街-市河-鹽橋運河由南至北分為東西兩個大的區域，御街以西的區域主要分佈了大量的皇族宅院、宮觀寺院、官署、官員宅院、官倉等；鹽橋運河以東南端的新開門-崇新門一帶主要分佈了一些皇族宅院，而鹽橋運河以東中部的崇新門-東青門一帶則大多是中下層的民戶，在鹽橋運河以東的北部東青門-艮山門一帶則集中分佈了禁軍軍營和官倉等設施。瞭解了臨安城內的基本情況之後，再參考斯波義信的研究<sup>38</sup>，對城外的情況也進行簡單的介紹。臨安城清波門-錢塘門的西面就是西湖及其沿岸，西湖的北岸分佈了大量的別墅寺院，西湖的西岸由南至北分佈了軍營和別墅寺院，西湖的南岸由北至南分佈著寺院、官廳、軍營、錢塘江。在臨安城外東側由南至北分及臨安城北部的錢塘門-餘杭門一帶的城外區域分佈了大量的軍營。

以上就是臨安城內外大致的空間狀況。在此基礎上筆者按照（表 1）和（表 2）的內容確認茶館的分佈位置並在地圖上進行標注<sup>39</sup>，然後對其分佈狀況進行整理和分析。城市史料中關於南宋臨安茶館的史料有 23 則，能確定茶館位置者有 15 處（見圖 2）。而筆記小說中關於南宋臨安茶館的史料總計有 15 則，其中能確認茶館地點的有 12 處，同樣在圖 2 上標注出來。參考圖 2 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史料中茶館的分佈情況：在 15 處的茶館中有 14 處都集中分佈在朝天門以北的御街兩側的區域，這片區域內不僅有客商等普通庶民出入的茶館，還有士大夫們經常出入的幾處茶館。這裏除了茶館的集中分佈之外，還有中瓦和南瓦的存在。根據《武林舊事》卷六《歌館》的描述來看：這片區域還有各色歌館、妓館集中分佈，並且商鋪林立，可以說是整個臨安城最重要的娛樂消費中心。除了朝天門以北御街兩側區域是茶館的集中分佈區域外，只有在西湖東岸的茶坊嶺有一處茶館的分佈。由此看出，城市史料中的

<sup>37</sup> 參見高橋弘臣《南宋臨安における空間形態と変遷》，《愛媛大學法文部論集》第 33 號，2012 年，第 1-40 頁。

<sup>38</sup> 斯波義信著/方健 何忠禮譯 1988 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年譯本。

<sup>39</sup> 參見圖 2。

茶館大多集中分佈在朝天門以北御街兩側區域的商業中心，並且這一空間還兼具娛樂中心，商品流通中心等性質，可是說是一個具有多重性質的空間。

## (2) 筆記小說史料中茶館的分佈狀況及其特徵

筆記小說中能確定其位置的 12 處茶館，參照圖 2 的內容來看其具體情況如下：其中(1)(4)(6)三處茶館主要分佈在錢塘門國子監附近。此區域內的北面，不僅有禁軍軍營，錢塘門內還有錢塘縣治、太學及國子監等機構。從圖 2 來看，錢塘門直接連通城內與西湖白堤，是士子們去西湖遊賞的最近通道。(3)(4)(12)主要分佈在貢院和太學附近。這片區域臨近餘杭門，主要是往來客商、來京參加科舉的士子在此聚集<sup>40</sup>。(7)則分佈在朝天門外，此處緊鄰臨安城內最繁華的商業地，人流眾多，是商業活動活躍的地方。(2)(10)則分佈在候潮門和嘉會門外，嘉會門與候潮門外不僅分佈著茶館，為數不少的瓦子也位於此地。(5)(11)則分佈在御街南端以西的坊巷內。总体而言茶館分佈大致可以分為幾個區域：錢塘門附近區域；太學-國子監-貢院區域；三橋附近區域；嘉會門外區域。從這幾個分佈區域來看，與城市史料中茶館集中分佈的特點不同，筆記小說中茶館的分佈相對分散，並且大多集中在門橋附近。這應該是因為筆記小說的茶館相關史料大多是描述外地官員或士子客商來京的情景，所以筆記小說中茶館大多分佈在南北城門附近、交通便利的區域、客邸盛行及科舉考試相關的區域。

## 2, 都市空間內的茶館分佈區域及其分佈特徵

### (1) 都市空間中茶館的分佈區域及其利用者

結合圖 2 以及城市史料及筆記小說中茶館的分佈來看：都市茶館的分佈主要分為五個區域，其中御街西側的坊巷內是茶館集中分佈最多的區域，利用者大多為士大夫，外來客商，庶民等群體。其次是錢塘門附近區域；太學-國子監-貢院區域；三橋附近區域；嘉會門外區域等幾個次分佈中心區。其主要利用群體分別為：科舉士子-官員-外來客商-軍人；官員-客商-都市無賴；軍人-士子。除此之外，還有分佈著流動茶攤的西湖遊覽區和城內外各個角落。結合圖 2 來看，南宋臨安的茶館分佈大多數在城內，並且有高度集中的聚集區和次聚集區。但結合上文對臨安流動茶攤的分析來看，西湖及周邊區域都是流動茶攤出現的區域，並且西湖上賣茶水的小船及城市中的提茶瓶者都延伸了茶館物理上的空間，實際上發揮了茶館的功能。由此來看，南宋臨安茶館的分佈形態是由這三者所構成的：首先是城市中聚集存在的嚴格意義上的茶館；其次是在風景遊覽區及城市內出現的流動茶攤；最後是廣義範圍上的茶館（城市內走街串巷的提茶瓶者和西湖上販賣茶水的小船）。這三者全面拓展了茶館在物理空間上的延伸以及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的作用。

### (2) 都市空間中茶館的分佈特徵及影響因素

除了史料中明確出現名稱以及其場所的茶館之外，還有很多茶館分散在臨安城的各個坊巷。比如《夢梁錄》卷十三《鋪席》中說到：“其餘坊巷橋道，院落縱橫，城內外數十萬戶口，莫知其數。處處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絨線、香燭、油醬、食米、下飯魚肉蒸臘等鋪。”說明茶館的分佈非常普遍和廣泛。

在《西湖老人繁勝錄》中提到“中瓦南北茶坊內掛諸般琉璃子燈”<sup>41</sup>，說明在瓦子裏也有茶館存在。《夢梁錄》卷十六《茶肆》中也有：“又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的記載，直接指出了瓦子內有名的茶館。瓦子里不僅有茶館更有

<sup>40</sup> (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四《解鬧》，第 120-121 頁。

<sup>41</sup>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錄》，第 326 頁。

各色店舖為前來娛樂的人服務<sup>42</sup>。由此可見茶館的分佈與瓦子密切相關，在考察茶館的分佈時，也應該把瓦子的分佈區域當做茶館可能存在的空間。關於南宋臨安瓦子的分佈問題，斯波義信繪製了詳細的分佈圖<sup>43</sup>，因此我們也參考此圖來觀察瓦子的分佈情況。在其考察中臨安的瓦子總計 21 所。而根據筆者梳理，應還有另外三處瓦子。《西湖老人繁勝錄》中提到臨安城內瓦子 5 所，城外 20 所<sup>44</sup>，但是出現具體名字的其實有城內 5 所加城外 17 所，總計 22 所。而根據《夢梁錄》卷十九《瓦舍》<sup>45</sup>和地方誌《咸淳臨安志》<sup>46</sup>的記載臨安城內外瓦子的數量為 17 所。對比三處史料，除去相同或是同一個瓦子不同名字的瓦子之外，瓦子的數量總計為 24 所。對照斯波義信的瓦子分佈圖來看，其考察缺少了朱市瓦子，龍山瓦子以及北郭瓦子。其中朱市瓦子的地點不能確定，筆者已將剩餘兩處標注在圖 2 上。參考圖 2 來看：瓦子的分佈除了城內的 6 所之外，其餘皆分佈在城外，其中臨安城東側由南至北沿城分佈的瓦子有 7 處，參考斯波義信和高橋弘臣對南宋禁軍軍營的分佈狀況的考察就能看到，二者的分佈空間是重合的。在《夢梁錄》卷十九《瓦舍》一節中說到：“杭城紹興間駐蹕於此，殿巖楊和王因軍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內外創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為軍卒暇日娛戲之地。”。這則史料說到因軍士們多是西北人，為了給軍士提供娛樂，楊和王提議在城內外建立瓦舍。為了滿足在京駐紮的禁軍的娛樂需要，在城內外皆設立瓦子。因此禁軍軍營所在的附近，也可能是茶館瓦子等娛樂性設施存在的場所。

除此之外在城北的餘杭門外鹽橋運河的最北端也分佈著瓦子，而這兩處是北方物資進京最重要的流通通道之一<sup>47</sup>。北方來的物資在這裏卸貨，存儲，再經過牙行等中間環節流通到城內各個商舖。因此在這裏聚集了大量的客商，邸店，客店等商品流通的重要參與者們。在《夢梁錄》卷十九《塌房》<sup>48</sup>一節中就提到了城郭內，北關水門附近的水道中就建了大量的塌房提供給客商店舖等儲藏貨物。由此聚集了大量的外來客商、牙人、以及普通的勞動者。因此對娛樂以及餐飲、住宿等有很大的需求，可以推測此處也可能存在瓦子和茶館。所以，在考慮茶館的分佈時，也需要看到其與運河沿岸的交通要衝以及商品流通中心所在的密切聯繫。

參考圖 2 來看，還有一些瓦子則零星分佈在西湖沿岸，其所在除了設置了禁軍軍營之外，還有很多寺院宮觀。前文談論到有大量流動的茶攤分佈在西湖沿岸及錢塘江觀潮處，其服務對象大多是遊湖、遊宮觀寺廟以及遊山、遊園的遊人。並且在《武林舊事》卷三《祭掃》<sup>49</sup>中也提到在名勝處就存在著村店為遊人服務。結合這幾點來看，在考慮茶館的分佈時，遊覽的風景名勝處，宮觀寺院，園林等空間也應該是我們考慮的要素。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瞭解到，在臨安城還可能存在更多的茶館，而其分佈也往往與商業繁華區；瓦子；軍營；運河等交通樞紐；寺廟、園林、錢塘江、西湖及周邊等風景名勝區的所在關係密切。所以，筆者結合斯波義信對禁軍軍營和宮觀寺院分佈的考察<sup>50</sup>，以及本文對城市史料和筆記小說史料的分析，對可能存在茶館的區域也在圖 2 上進行標注。參照圖 2 可知：宋代臨安茶館的分佈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①茶館的分佈非常廣泛，城內城外多處

<sup>42</sup>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錄》，第 327 頁。

<sup>43</sup> 參見斯波義信著/方健 何忠禮譯 1988 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第 335 頁。

<sup>44</sup>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錄》，第 328 頁。

<sup>45</sup> (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九《瓦舍》，第 290 頁。

<sup>46</sup> (宋)潛說友纂修《咸淳臨安志》卷十九，《宋元方志叢刊》第四冊，中華書局，1990 年，第 3549 頁。

<sup>47</sup> 參見斯波義信著/方健 何忠禮譯 1988 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第 314-316 頁。

<sup>48</sup> (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九《瓦舍》，第 291 頁。

<sup>49</sup>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三《祭掃》，第 40-41 頁。

<sup>50</sup> 參見斯波義信著/方健 何忠禮譯 1988 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第 333-339 頁。

分布，分佈區域有：西湖沿岸及周邊山寺名勝分佈區；城北以及城南沿運河及水道分佈區；城內商業娛樂中心分佈區；貢院-太學-國子監等科舉相關設施分佈區；城東外側沿都城排列的軍營分佈區。②在考慮茶館的分佈問題時，還需要考慮到茶館的分佈與瓦子；軍營；運河等交通樞紐；寺廟、園、錢塘江、西湖及周邊等風景名勝區的所在的密切聯繫。這些所在也是茶館可能存在的空間。③在茶館的分佈形態上，城市史料和筆記小說史料中呈現出的茶館分佈特徵比較不同。城市史料中茶館分佈非常集中，凸顯了商業繁榮對其分佈環境的絕對影響。而筆記小說中茶館的分佈則相對分散，但是也呈現出圍繞交通便利客邸盛行的南北城門附近、以及科舉相關設施聚集分佈的特點。

#### 四，結論

相較於北宋開封的茶館，南宋臨安茶館從以下幾個方面展現出了不同的發展特徵：一，除數量的增加外，茶館內的娛樂活動更加多樣化，並且飲茶與欣賞自然美景相結合，從而使茶館的娛樂休閒功能得到很大的發展。雖然南宋臨安的茶館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北宋開封茶館多功能性的特徵，經營模式成熟化以及脫離其他行業的功能分化，朝著專業化的趨勢發展，更加接近明清時期功能簡練且以飲茶休閒為主的茶館形象。二，在茶館分佈問題上城市史料中茶館分佈和筆記小說史料中茶館分佈呈現出了不同的特徵。而形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大致有兩點：首先城市史料是靜態視角，只能描述某個時間點城內茶館的分佈狀況，而筆記小說則具有動態的視角，可以呈現一段時期裏城內外茶館的分佈狀況；其次是二種史料的書寫方式不同，城市史料是作者總結性的書寫，因此對茶館的描述也大多是概括性的，而筆記小說史料則是由作者搜羅社會上流傳的各種逸聞書寫而成，其內容和細節都更為豐富，可以展現都城人以及外來流動人口利用茶館的生動畫卷，所以也造成了筆記小說中茶館的分佈大多與交通樞紐，以及科舉考試相關設施息息相關的分佈特徵。三，在分佈上與北宋開封茶館主要集中在城內不同，南宋臨安茶館的分佈開始由城內向城市周邊蔓延。其分佈形態是一個全面的三重結構形態，城市中聚集的茶館和臨安城內外出現的流動茶攤、廣義範圍上的茶館（城市內走街串巷的提茶瓶者和西湖上販賣茶水的小船）三者完全的構成了臨安茶館的分佈形態，極大地減少了時間和場所對茶館的限制，全面的拓展了茶館在物理空間上的延伸以及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的作用。這種發展使飲茶行為能夠在更廣闊的時間和空間裏得以進行，而在這種發展的背景下，宋代的飲茶文化是否也會發生新的變化，是筆者接下來想繼續探討的問題。

附錄

表 1：城市史料中的茶館

	史料出處	地點	茶館名稱	史料原文
1	《西湖老人繁勝錄》	西湖岸邊	浮棚	路邊搭蓋浮棚，賣酒食也無坐處，又於賞茶處借坐飲酒。
2	《西湖老人繁勝錄》	中瓦(市南坊北三元樓前)	南茶坊	先舞於街市，中瓦南北茶坊內掛諸般琉璃子燈
3	《西湖老人繁勝錄》	中瓦	北茶坊	先舞於街市，中瓦南北茶坊內掛諸般琉璃子燈
4	《夢梁錄》	清河坊	蔣檢閱家	如清河坊蔣檢閱家，奇茶異湯，隨索隨應
5	《夢梁錄》	西湖上	湖船上茶館	湖中南北搬載小船甚夥，如撐船賣買羹湯、時果
6	《夢梁錄》	市西坊南	潘節幹茶坊	如市西坊南潘節幹、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髏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張七相干茶坊
7	《夢梁錄》	市西坊南	俞七郎茶坊	同上
8	《夢梁錄》	保佑坊北	朱骷髏茶坊	同上
9	《夢梁錄》	太平坊	郭四郎茶坊	同上
10	《夢梁錄》	太平坊北首	張七相干茶坊	同上
11	《夢梁錄》	張賣面店隔壁	黃尖嘴蹴球茶坊	張賣面店隔壁黃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
12	《夢梁錄》	中瓦內	王媽媽家茶肆	同上
13	《夢梁錄》		車兒茶肆	同上
14	《武林旧事》	御街	天街茶肆	而天街茶肆，漸已羅列燈球等求售，謂之“燈市”
15	《武林旧事》	大昭慶九曲	村店山家	如大昭慶九曲等處，婦人淚妝素衣，提攜兒女，酒壺肴饌。村店山家，分餽遊息
16	《武林旧事》		清樂茶坊	外此諸處茶肆，清樂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連三茶坊、連二茶坊，及金波橋等兩河以至瓦子，各有等差，莫不靚妝迎門，爭妍賣笑，朝歌暮弦，搖盪心目
17	《武林旧事》		八仙茶坊	同上
18	《武林旧事》		珠子茶坊	同上
19	《武林旧事》		潘家茶坊	同上
20	《武林旧事》		連三茶坊	同上
21	《武林旧事》	連二巷	連二茶坊	同上
22	《西湖遊覽志》	熙春巷	雙茶坊	熙春巷宋有雙茶坊

23	《西湖遊覽志》	茶坊嶺	茶坊嶺茶坊	茶坊嶺宋時有茶坊在焉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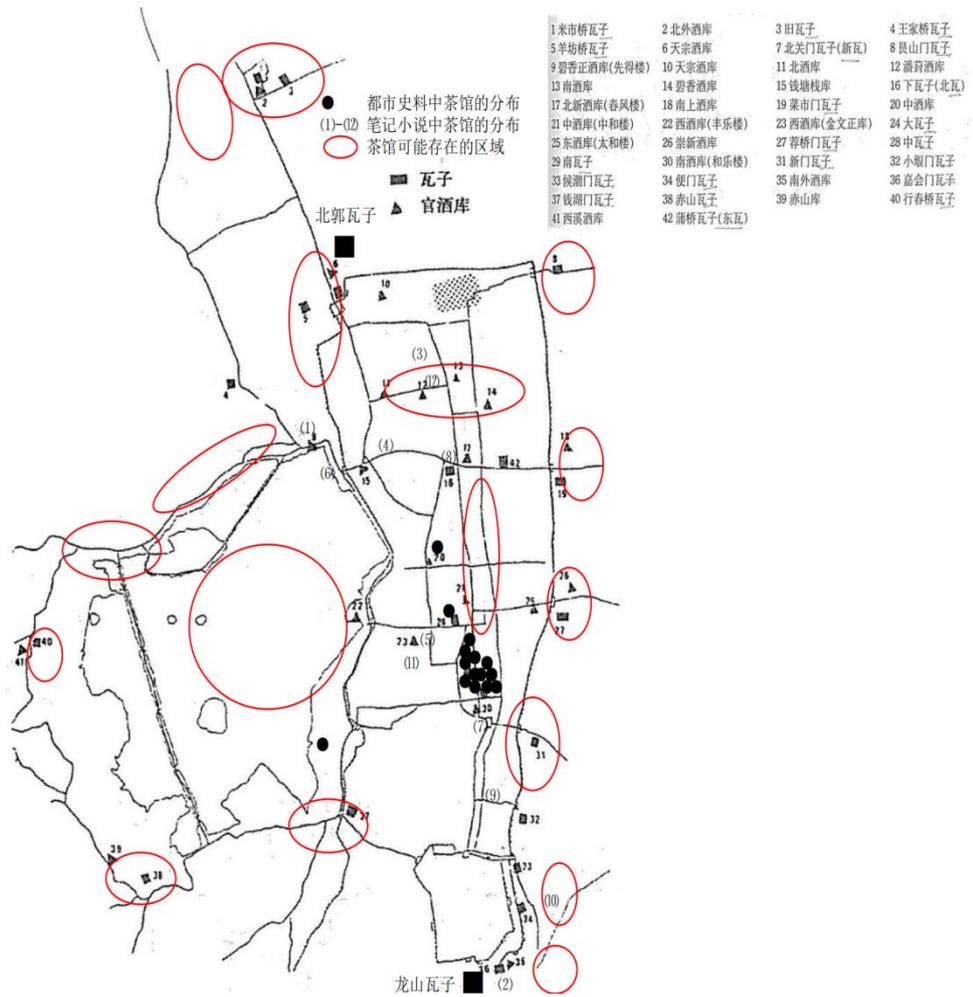
表 2：筆記小說史料中的茶館

	史料出處	時間	地點	登場人物	功能
1	《夷堅志》 《奢侈報》	隆興元年	臨安(漾沙坑茶肆)	酒官、官員	休息
2	《夷堅志》 《王武功山童》	乾道七年	臨安(江岸旁茶肆)	官員、鬼	休息、交流
3	《夷堅志》 《西湖庵尼》		臨安(官員住宅對面茶肆)	少年、尼、官員妻	休息
4	《夷堅志》 《班固入夢》	乾道六年	臨安(嘉會門外茶肆)	士人	茶肆裏講書
5	《夷堅志》 《李汪二公卜相》	政和八年	臨安(貢院外茶肆)	士人、相士	集會
6	《夷堅志》 《吳師顏》	紹興十二年	臨安(眾安橋茶肆)	太史局令史、官員	集會
7	《夷堅志》 《臨安武將》		臨安(三橋黃家店)	僧侶、婦人、茶僕、官員、將官、惡少年	住宿、飲茶、飲酒、美人局
8	《肯綮錄》		臨安(茶肆)	軍人、庫官	在茶肆中傳播關於嶽飛冤獄之事，以致被捕。
9	《齊東野語》		臨安(西陵橋茶肆)	道人、隸職御酒庫陳生以及其妻	休息
10	《癸辛雜識》		臨安(朝天門外茶肆)	江湖巨擘吳生、無賴少年	無賴少年群聚茶肆
11	《癸辛雜識》	丙申歲九月九日	紀家橋河北(國子監前茶肆)	陶氏女	
12	《錢塘遺事》		臨安(內門前茶店)	科舉士子	在茶店中等待放榜的消息。
13	《鬼董》		臨安(觀潮門外茶肆)	洛人周浩、茶肆姥、白衣婦人	茶肆姥作為男女戀愛的中間人
14	《鬼董》		臨安(升陽宮庫前茶肆)	都民質庫樊生、王老娘、老嫗	斡旋婚姻的中間人王老娘長期以茶肆作為據點。
15	《睽車志》		臨安(瓦子中茶肆)	科舉士子	在茶肆中聊天，等待放榜

圖 1：（宋）劉松年《茗園賭市圖》（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圖 2：南宋臨安茶館分佈圖



## 中間小結

### 一，北宋至南宋茶館的發展

通過第一章和第二章對茶館進行的詳細考察，可以從數量、特徵、分佈空間及分佈特徵等方面把北宋開封和南宋臨安的茶館的特徵和差異總結為以下表格中的內容。結合表格的內容比較來看，從北宋到南宋茶館的分佈空間和經營時間有擴大的趨勢和專業化的趨勢。揭示了從唐到北宋，從北宋到南宋，飲茶在階層以及空間上擴大的傾向。

宋代茶館的發展：飲茶空間的擴大		
	北宋開封茶館	南宋臨安茶館
數量和功能	●26  ●餐飲、住宿、勞動仲介、信息傳播、物品暫存、賣雜貨商品。	●38  ●餐飲、住宿、勞動仲介、信息傳播、娛樂、集會。
茶館的特徵	●一個茶館具有多個經營內容和功能的情況很普遍。	●符合經營內容和功能的特徵持續存在的同時，茶館增加了很多娛樂的因素。經營形式逐漸向飲茶+特色經營內容=吸引自己消費群體的形式發展。 ➡茶館的發展有了專業化趨勢。
茶館的分佈	與商業中心、瓦子、妓院、軍營、交通要衝、定期市等設施的分佈有著密切的聯繫。 ➡城內分佈。	商業中心、瓦子、軍營、妓院、交通要衝、寺院名所、西湖沿岸の遊覽區。 ➡向城外溢出。
城市史料與筆記小說史料中的茶館	●城市史料中的茶館：茶館集中分佈於城內商業區。對茶館的具體記載很少。 ●筆記小說史料中的茶館：汴河沿岸分佈。  ➡交通要衝（描繪了外來商人、士子、官員使用茶館時的故事。顯示了茶館和府邸店，食店，仲介業(牙行)，浴堂的關聯性)	●城市史料中的茶館：茶館集中分佈於城內商業區。概括敘述茶館的類型和功能。 ●筆記小說史料中の茶館：城內五個區域 ➡科舉相關設施周邊、商業中心、運河沿岸交通樞紐

### 二，首都的茶館與地方的茶館

本節主要將《夷堅志》中以茶館為舞臺以及與茶館相關的內容進行整理，並結合前兩章內容對首都茶館和地方茶館進行簡單的分析和比較。《夷堅志》中相關史料共計 39 則，根據其時間、地點、登場人物和茶館的功能進行整理製成（表 1）。根據（表 1）的內容來看，39 則中茶館位於首都城內以及城外的有 12 則，茶館地處州府的有 14 則，剩下的 13 則中的茶館則分佈在縣、鎮、村等地。由此可見，宋代的茶館不僅分佈在首都這樣的大都市，也分佈在州、縣、鎮、村，其分佈和發展是全國範圍的。

### 1, 茶館的分佈特徵

由(表1)中茶館的分佈地點來看,宋代茶館分佈有以下幾個特徵:①在首都臨安和開封,茶館的分佈是最為普遍的,發展是最為繁榮的,其分佈的普遍程度和數量都是地方所不能與之相比的。②在臨安和開封的茶館繁榮發展的同時,州縣這樣的地方茶館也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③雖然很多的地方茶館還是分佈在市這樣的商業地區,但是已經突破了這個範圍,向住宅區,交通要衝等地區擴張。④除了在城市地區,在鄉村地區的草市茶館也得到了發展。

### 2, 茶館的功能

《夷堅志》中首都茶館的功能上總體還是屬於第一、二章中所總結的內容。而地方茶館和首都的茶館一樣,具有基本的飲茶、飲酒、吃飯、休息、住宿、傳播信息的功能。結合(表1)可以把地方茶館也按照其經營內容和延伸出來的功能性來劃分為幾個類型:①販賣飲食,包括茶、酒和吃食的茶館。②除了經營茶館還兼營別業以及牙行的茶館。③只在特殊的時期臨時開設的茶館。④以娼妓在內招攬客人的茶館。⑤兼營旅店、邸店的茶館。根據其功能劃分的話具有以下幾種功能:飲食休息的功能、住宿的功能、信息的交流與傳播、牙行的功能。

### 3, 茶館的利用者

關於茶館的利用者,可以將其簡單的劃分為三組。①民眾(京師民、幼女、乞丐、村民、市人、惡少年、布商人、死刑犯、販夫、婦人、商人、茶僕、樵夫、凶盜、行商走卒)。②官員(酒官、官員、賊曹、士人、軍校、太史局令史、將仕郎、將官)。③其他(呂洞賓(仙人)、尼、道士、神將、鬼、術士、龍、僧侶、占卜師)。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茶館的利用者身份範圍很廣,社會上各種各樣身份的人都在其中。由此可見,宋代的茶館利用者是多階層的,也說明了當時社會對茶館利用的普遍性。正是由於不同社會身份的人在茶館中聚集,為了對應各種需求,才造就了宋代茶館功能的多重性。而其中神仙、鬼怪、道士等利用者的出現,則說明茶館是連接著現實世界和神怪世界的橋樑,對於茶館的利用滲透到不同的階層和世界。

### 4, 二者之間的比較

通過以上總結和分析,從其分佈和功能以及利用者等方面對二者進行簡單的比較。首先是關於茶館的分佈,首都茶館不僅分佈在繁榮的商業區,還分佈在住宅區,交通要道,風景區等不同的區域內,分佈範圍廣泛。而地方茶館的分佈也朝著這一趨勢發展。但地方茶館的分佈主要還局限在市、沿河碼頭、橋頭等交通便利的地區。另外,不同於城市的茶館分佈,村、鎮的茶館則基本上分佈在草市這樣的商業聚集區。

從其經營內容和功能的方面來說,首都茶館的經營內容和功能都要比地方茶館要豐富一些。且首都的茶館中有很多娛樂性的功能和經營內容,地方茶館則局限於實用性的功能,如吃飯、飲茶、住宿等,雖然也存在一些娛樂性的茶館,但是在其數量和經營內容上無法與首都的茶館相比。首都的茶館在經營方式上也比地方茶館要更加的成熟,首都的茶館形成了一些例如市頭茶坊這樣的茶坊,更加接近於後世明清時期茶水販賣十一種經營特色的模式。

關於茶館的利用者,由於首都茶館和地方茶館分佈地區的差異,地方茶館的利用者除了

去商業區的本地人以外，最主要的應該還是過往的商賈或旅人。首都的茶館利用者雖然身份多樣，其階層性也比較廣，但首都茶館的利用者也有很多來自於外地，而地方茶館的利用者很多是外出行商的商人，或是上京的官員，或是遊方的道士、術士等。首都作為商業最發達的地方，其茶館的發展也最為繁榮。而首都的各種風俗、信息、文化活動和茶館的經營模式等都可以通過這些利用者向地方茶館傳播開去，也可以通過茶館傳播和交流信息的功能向全國傳播，從而影響整個宋代社會風尚。

(表1)：《夷堅志》中茶館史料

	史料	時間	場所	人物	功能
1	石氏女		京師	京師民、幼女、乞丐、呂洞賓(仙人)	飲茶
2	京師道流		京師(市)	道士、村民、鬼、市人、道士、惡少年、神將	集會
3	鬱老侵地		冥土(市)	村民、鬼	休息
4	小郗先生		建康市(市) (南京)	乞丐、市人、術士	休息、信息傳播
5	布張家		邢州(市)(河北邢臺市)	布商人、死刑囚	牙行、販賣布
6	米張家		京師(東水門外汴堤)	販夫、婦人、商人、鬼	販賣米、寄存、勞動仲介
7	宣和龍	宣和元年	京師(開封縣衙前)(河南開封)	龍、卒、街吏	
8	茶肆民子	乾道五年	平江(湖北岳陽市)	民、幼女、黃衣卒、鬼	飲茶
9	奢侈報	隆興元年	臨安(浙江杭州)	酒官、官員	休息
10	道人留笠		永康青城山(青城山下)(四川都江堰)	道士、呂洞賓(仙人)	休息、信息傳播
11	淮陰民女		淮陰(江蘇淮安)	民、僧侶、鬼	休息、飲酒
12	京師浴堂	宣和初	京師(省門旁)(開封)	官員、下僕、惡少年、賊曹	休息、浴堂、殺人賣人肉
13	徐信妻	建炎三年	建康(市)(南京)	軍校、婦人、商人	休息
14	王武功山童	乾道七年	臨安(江岸旁)	官員、鬼	休息、談話場所
15	茶僕崔三	淳熙八年	黃州(觀楓橋下)(湖北黃岡)	茶僕、婦人、鬼	
16	西湖庵尼		臨安(官員住宅對面)	少年、尼、官員之妻	休息
17	班固入夢	乾道六年	臨安(臨安南郊)	士人	說書

18	黃池牛	淳熙十三年	宣城縣太平州 (安徽宣城)	士人、惡少年、牛	信息傳播
19	李汪二公 卜相	政和八年	臨安	士人、相士	集會
20	鄂州南市 女	乾道五年	鄂州南草市 (富商住宅對 面)(湖北鄂州)	茶僕、婦人、樵夫	
21	方大年星 禽	乾道中	江州(江西)	術士、凶盜、商人、賊曹	住宿
22	無錫木匠		無錫(市)(江 蘇無錫)	商人、鬼	商品交易
23	遊伯虎	淳熙十一年	福州城(福建 福州)	道士、茶肆民、官員	飲茶
24	吳師顏	紹興十二年	臨安(官員住 宅旁)	太史局令史、官員	集會
25	潘見鬼理 冥	紹興三年		僕人、鬼	信息傳播
26	王侍晨	紹興初	福州城(慶城 寺)	術士	
27	餅店道人		青城山下	呂洞賓(仙人)	
28	葉德孚	紹興八年	建安(福建建 甌市)	將仕郎、商人、術士、僧 侶、官員、鬼	
29	秦楚材	政和間	汴河旁	下僕、惡少年、道士(仙 人)、商人、士人	邸店
30	雷震犬	淳熙元年	饒州(市)(江 西)	客人、犬、婦人	飲茶、住宿
31	臨安武將		臨安(三橋黃 家店)	僧侶、婦人、茶僕、官員、 將官、惡少年	住宿、飲茶、飲酒、實施 美人局的場所
32	處州山寺		處州縉云縣 (浙江麗水)	僧侶、鬼	飲食、住宿、寺院
33	黃若訥	淳熙十三年	臨川	士人、行商走卒、龍	邸店
34	武女異疾	乾道七年	鄂州(肆)	商人、道士	飲茶
35	道人治消 渴		臨川(村墟) (江西省撫州 市)	道士、乞丐	飲茶、餐飲
36	醴陵店主 人	乾道元年	吉水縣(江西 吉安)	商人	住宿、飲食
37	李天祐	淳熙十五年	吉州(江西吉 安)	術士、鬼、占師	住宿、飲茶、飲酒、實施 美人局的場所

38	鄒九妻甘氏	慶元四年	鄂州（埠頭）	商人、婦人	住宿、飲茶、招妓
39	小令村民		青田小令村 （浙江麗水）	婦人、富人、鬼	

### 第三章：從宋代士大夫的書信與贈答詩看贈茶文化

#### 一，緒論

茶作為一種日常生活飲品，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至今為止茶的種植技術、製作工藝、飲用方法、儲藏技術等都經過了多次的變遷。在這一個過程中產生了很多由茶引發或者與茶相關的社會文化現象，茶被賦予了更多的精神內涵並反映出時代的特徵。而研究茶本身或者是與之相關的社會文化現象則是探究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課題。而士大夫們對茶的書寫對茶文化的發展影響至深，因此本文意在以宋代士大夫所寫的書信與贈答詩為中心，探討其中展現出的宋代茶文化的內涵和特徵，以此管窺宋代社會文化的一個詳細側面乃至整個宋代社會文化發展的脈絡<sup>1</sup>。

對於茶文化如何定義，學者們的觀點各異，丁以壽在《中國茶文化》一書中對茶文化的概念以及茶文化研究的發展進行了厘清與闡述，認為廣義的茶文化包含茶學和茶葉學，狹義的茶文化則主要指其發展過程中精神財富的總和，就茶文化的具體概念而言，丁以壽稱：“茶文化的本質是飲茶文化，是作為飲料的茶所形成的各種文化現象的合集，其基礎是茶俗、茶藝，核心是茶道，主體是茶文學與藝術。”<sup>2</sup>雖然關於茶文化的界定研究者各有不同主張，但由茶引發的社會現象，以及人們賦予茶的精神內涵都屬於茶文化的範疇。所以本章將以此為前提，深入探討由宋代士大夫們所寫的贈答詩和書信中所表現出來的與茶相關的社會文化現象。

本章主要收集《全宋文》（主要為書信）、《全宋詩》（主要為贈答詩）中所有與贈物相關的史料，並對其中贈茶的史料進行集中整理製成表格，筆者把《全宋文》中與贈茶相關的書信史料整理總結為（表1），把《全宋詩》中與贈茶相關的贈答詩的史料總結整理為（表2）。以（表1）和（表2）的內容為基礎，並結合其他相關史料從而進行一個全面的詳細的計量史學分析。

#### 二，從書信史料看宋代的茶文化

筆者在搜索整理了《全宋文》中與贈物相關的書信史料，大致有1300餘條<sup>3</sup>，其中北宋時期的史料有800餘條，南宋時期的史料大概有500餘條，分別占比大約是61%和39%。其中贈送的物品的品類豐富多樣，主要包含：文房用具、古董石刻、觀賞動植物、飲品（茶和酒）、食物（水果、點心、肉類、魚和海鮮、麵食、醋等）、藥材藥方、生活用品（茶具酒器、拐杖、衣物鞋子、布料、發冠等）這幾大類。其中與贈茶相關的書信史料大致有200條，其在所有贈物史料中占比為15%左右，並且在大多數時候贈茶的同時還有其他物品附贈。在贈茶相關的史料中北宋贈茶史料總計144條，占贈茶史料總數的72%左右，南宋贈茶史料總計56條，占總數的28%左右。北宋與南宋之間的史料數量也存在差異，而對這種差異出現的原因

<sup>1</sup> 士大夫們的書寫形式廣泛，有詩詞、書信文章、筆記小說、書法作品等，而與茶文化相關的書寫以茶書、詩詞的影響最為廣泛，茶書直接對宋代的飲茶制茶方法以及飲茶的審美等進行了書寫，與茶相關的詩詞也體現了宋代士大夫們對茶寄託的精神內涵。這兩類史料都是研究茶文化重要的史料，但本文旨在通過探討宋代興盛的茶的贈答這一社會現象，從而對兩宋之間茶文化以及社會文化的特徵及其變遷的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選擇了以“贈”為中心的書信和贈答詩作為研究的主要史料來進行分析和探討。

<sup>2</sup> 丁以壽《中國茶文化》，第4頁。

<sup>3</sup> 在宋代，士大夫之間進行書信、文章、作品的交流非常盛行，但本文中對於贈物的史料收集僅限於物品贈送，不包含文字思想交流的贈送。

筆者將在下文中嘗試進行論述。

## 1, 贈茶的種類

根據（表 1）的統計來看，士大夫之間所贈送的茶的種類豐富多樣，有龍鳳團茶、建茶、雙井茶、臘茶、安樂茶等多達三十多種類別。其中直接以茶為或茗表述的史料占比最高，其數量總計有 60 條（北宋 40，南宋 20），按其數量依次遞減為建茶 31 條（北宋 26，南宋 5），雙井茶 23 條（北宋 23，南宋 0），新茶 18 條（北宋 10，南宋 8），團茶 13 條（北宋 12，南宋 1），龍鳳團茶 11 條（北宋 9，南宋 2），賜茶 5 條（北宋 5，南宋 0），山茶 4 條（北宋 2，南宋 2），安樂茶 3 條（北宋 0，南宋 3），小春茶 3 條（北宋 1，南宋 2），其餘則是只出現 1-2 次的各類茶品類別總計 31 條（北宋 18，南宋 13）。

首先參考（表 1）中各類茶品出現的次數以及所占總計數量比例的高低等數據進行詳細的分析。從（表 1）來看，除了占比最高的茶品類型不明的茶以外，其中占比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建茶和團茶，分別占比為 15%和 14%。其次是雙井茶和新茶占比分別為 11%、9%。然後是占比大致為 2%小春茶及其他品類的茶品。最後是只出現一次或者兩次的其他品類的茶，大致為 15%。從此數據結構來看北宋時期，士大夫之間贈送茶品時最為青睞的品類是建茶與團茶，然後是雙井茶。據高橋忠彥（1989）和（1991）兩篇論文的考察認為，產於福建的固形茶也就是團茶，通常被稱為建茶。如果把建茶和龍鳳團茶<sup>4</sup>以及賜茶<sup>5</sup>都算做

品類	總計（所占總數比例）	北宋（所占北宋贈茶總數比例）	南宋（所占南宋贈茶總數比例）
茶	60 (30%)	40 (27%)	20 (36%)
建茶	31 (15%)	26 (18%)	5 (9%)
團茶	29 (14%)	26 (18%)	3 (5%)
雙井茶	23 (11%)	23 (16%)	0
新茶	18 (9%)	10 (7%)	8 (14%)
山茶	4 (2%)	2 (1%)	2 (4%)
安樂茶	3 (2%)	0	3 (5%)
小春茶	3 (2%)	1 (1%)	2 (4%)
其他	31 (15%)	18 (12%)	13 (23%)

團茶的品類的話，團茶的占比則高達 36%，由此數據可以看出北宋時期團茶的絕對流行趨勢。而占比 16%的雙井茶則屬於草茶<sup>6</sup>中的名品，其製作方法和飲用方法都與團茶有所不同。但從其 16%的占比數據來看，即使是在團茶文化盛行的北宋時期，像雙井這樣的草茶也已經佔據了一席之地。此外像臥龍茶、岑茶等各個種類茶品也為數不少，占比達到了 12%，這些一般都是各地名茶，被用於士大夫之間的贈答。

參考南宋各類茶品占比圖可以發現，跟北宋時期同樣，表述為茶和茗的占比最高，高達 36%，相較於北宋時期其占比高出了 10%左右。而占比佔據第二位的是小其他這一類別，占比為 26%。接著就是占比為 14%的新茶和占比 9%的建茶。安樂茶、團茶、小春茶、山茶等所占比例相當，大致在 4%-5%之間。而在北宋占比較高的雙井茶在南宋時期並沒有相關事例的出

<sup>4</sup> 根據沈冬梅《茶與宋代社會生活》一書第四章貢茶的論述，龍鳳團茶是北宋官焙製造的貢茶品類，也通常被稱為團茶。

<sup>5</sup> 根據沈冬梅《茶與宋代社會生活》一書第五章賜茶的論述，宋代建立了完備的賜茶制度，皇帝會出於顯示恩寵或作為酬謝的目的，對大臣進行常規和非常規的賜茶。除了賜茶藥以外，所賜之茶一般為官焙貢茶，並且物以稀為貴，受賜之臣無不如獲至寶。

<sup>6</sup> 根據高橋忠彥《宋詩より見た宋代の茶文化》中的論述，草茶一般指宋代江南所產所产的散茶（葉茶）中的名品。

現。從以上數據來看，南宋時期直接贈茶或其他只出現一兩次的名茶品類的占比高達 63%，說明除了建茶、雙井、龍鳳團茶等在北宋時期就流行的名茶外，像小春茶、安樂茶、陽縣茶、江茶等品類的茶也在持續發展並擴大流行範圍。建茶與龍鳳團茶、團茶的占比總計為 15%，相較於北宋時期團茶 36% 的占比而言，差異巨大。說明進入南宋時期，在贈答風俗中團茶的流行逐漸式微。除了茶、其他、團茶這三大類別之外，占比最高的就是新茶，相較於北宋時期 7% 的占比，增加了一倍左右。說明在南宋時期比起單純的贈送名茶，及時贈送新茶成為風尚，人們對茶的時效性的追求更為強烈。關於南宋時期的事例中未出現雙井茶這一現象，高橋忠彥在（1991）一文中指出在南宋時期顧渚茶成為草茶的代表，但為什麼在書信贈答史料中未出現雙井和顧渚茶的身影？筆者將在下文結合贈答詩的相關史料進行分析和解答。

通過分析與比較北宋和南宋贈茶品類的數據結構可以看出：一，北宋時期團茶文化盛行的同時，草茶和各地名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發展和流行。而團茶比較突出的一個特性就是其貴重且難得。在歐陽修的《歸田錄》中就記載到“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一作精絕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sup>7</sup>其中不僅指出了團茶的價值，更是指出了其比金子更難得的稀缺性。可見在北宋時期，士大夫在選擇作為禮物的茶品時，能顯示貴重與身份地位的團茶才是首要的選擇。二，南宋時期相較於對團茶名品的追求，更強調對新茶的追求。

## 2, 贈茶的場景

除了贈茶的品類各有不同之外，贈茶的場景也有所不同，根據整理的史料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 (1) 作為日常贈送或隨信附帶的禮物

這種情況是最為普遍的，在 200 餘條的史料中，90% 以上是屬於這種朋友之間相互問候通信，並附帶所贈物品的情況。以下將根據史料的內容來對其進行詳細的分析與說明。

《與章伯鎮書五》：皇祐元年某自聞子美之亡，使人無複生意。交朋淪落殆盡，存者不老即病，不然困於世路，愁人愁人。就中子美尤甚，哀哉！祭文讀之，重增其悲爾。盛作，俟至西湖，方快吟味。淮陽若區區到彼，必少祛俗慮，尚可勉強以攀作者。惠茗正為所少之物，多荷多荷。自病來絕不飲酒，尤為無聊，正藉此物以增清興爾。<sup>8</sup>

在歐陽修的《與章伯鎮書五》（1007 年-1073 年）中歐陽修就在與朋友感歎閒聊之後，對朋友贈茶予己表達謝意，並說因病不能飲酒生活非常的無趣，恰好朋友給自己送來茶，正是自己現在缺少的物品，就朋友所贈之茶增加自己的生活情趣。這則史料就是朋友之間贈茶的例子，同時也表現了茶在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作為重要的飲品以及增加生活情趣的地位。

### (2) 作為贈別時的饋贈

將茶作為贈別時的饋贈的情況也存在，但其事例只有 1 例相關，數量相對較少。

<sup>7</sup>（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全宋筆記》第一編第五冊，大象出版社，2003 年，第 256-257 頁。

<sup>8</sup>（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卷一四七《與章伯鎮書五》，宋慶元二年周必大刻本。

《與李公擇三》：某再拜。孝叔丈向有徑山之約，今已不遂。無緣一別，且乞致意。陳令舉有書來，云相次去奉謁，相聚必欵。東萊所乏茶與柑橙，而君地生焉，可各致少許為贐。若要瓜薑，到任後當寄獻。呵呵。李君行時，不及奉書，兼醉後揮抹，殊鮮禮。悚！悚！<sup>9</sup>

在這則史料中蘇軾（1037年-1101年）在與友人李公擇的書信中提到，東萊缺乏茶與柑橙，李公擇所在之地產茶與柑橙，從而讓李公擇各贈送少許作為贈別時的饋贈。並承諾如果需要醬瓜的話，自己到任後將寄送給對方。最後對李公擇走時未能奉上書信進行了致歉。蘇軾與李公擇是私交較好的友人，從這則史料可以看出，不僅是茶作為贈別的饋贈，還有就是北宋時期贈別的饋物風氣也由此可見一斑。雖然贈別的風俗在書信史料中體現較少，但在宋詩中則有大量描述送別友人場景的詩，其中飲酒飲茶贈別的場景更是普遍。

### (3) 作為酬勞與潤筆

《與張君子三》：某承欲令寫先塋神道碑，如公家世，不肖以得附托為寵，更復何辭。但從來不寫，除詔旨外，只寫景仁一《志》，以儘先人研席之舊，義均兄弟，故不得免，其餘皆辭之矣。今若為公家寫，則見罪者必衆，唯深察，悚息。不肖為俗所憎，獨公相視親厚，豈復惜一運筆。但業已辭他人，嫌若有所擇耳。千萬見恕。惠貺小團佳醞，物意兩重。捧領慙荷。<sup>10</sup>

蘇軾在這則書信中，拒絕了張君之子請求蘇軾為自己先人的墳塋寫神道碑的請求，蘇軾詳細的說明了自己拒絕的理由，並在最後表達了自己的歉意，同時對對方所贈送的小團和酒表示感謝。而這裏贈送給蘇軾的茶和酒應該是和請求蘇軾書寫神道碑的的書信一起送來的，這些物品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著酬勞的作用的。在歐陽修的《歸田錄》中就記載了宋代這種以文房用具、大小龍茶等趣味品作為潤筆料的情況。其內容如下：“蔡君謨既為餘書《集古錄跋》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餘以鼠須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餘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一作猶無此一種佳一無此字。”<sup>11</sup>在這則史料中歐陽修把鼠須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作為潤筆，請蔡君謨為自己的集古錄刻石。像這種以茶、文房用具等趣味品換取墨寶的情況在宋代並不鮮見。

### (4) 作為壽禮

把茶作為壽禮進行贈送的情況也是存在的，但是作為具體事例來說只有3例。在筆者搜集的所有的關於生日贈物的史料大致有18條左右，都為南宋時期的史料。其中生日贈茶則占比17%左右。

《太守謝送生日訪及狀二》：竊以神嵩生甫，大昴儲蕭。豈惟藩翰之良，時乃邦家之慶。阻奉千齡之酒，先勤七寶之茶。<sup>12</sup>

<sup>9</sup> 本文所用版本為：（宋）蘇軾《蘇軾文集》（全六冊），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宋）蘇軾《蘇軾文集》卷五一《與李公擇三》，第1497頁。

<sup>10</sup> （宋）蘇軾《蘇軾文集》卷五五《與張君子三》，第1648-1649頁。

<sup>11</sup> （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全宋筆記》第一編第五冊，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60頁。

<sup>12</sup>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七《太守謝送生日訪及狀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這則史料是周必大（1126年-1204年）感謝太守生日送狀及禮物的回信，其中提到了奉獻的千齡之酒和七寶之茶。像這樣在生日時把茶作為賀禮的例子還有以下兩個例子。

《回魏王賀生日書》：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座前：即辰天高氣肅，萬寶告成，共惟政績彌彰，堪與顯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日虔問寢，正阻侍見，臨風徒極依戀，敢乞因時御宜，保衛沖粹，永對丕祉，垂副傾禱。不備。某拜覆：久違顏範，雖幸音驛間通，而拳拳尊仰，何以自致！茲者初度載臨，遠勤尊念，特遣騎吏，墜況書翰，申以壽儀，金幣香茗，粲然溢目，物備意厚，深認友愛之情，其為感謝，尺紙莫究萬一，伏乞尊察。<sup>13</sup>

這則史料的主要內容是對魏王祝賀自己生日的回信，其中提到自己生日時，魏王不僅特意派騎吏送來祝賀的書信，還送金幣香茗的壽儀。這時茶是作為壽禮被贈送的。在周必大的另一則書信《回魏王賀生日書》中，魏王依然以金幣香茗作為壽禮送給周必大。兩則材料中的金幣香茗是皇帝賜茶時經常出現的辭彙，此處魏王以金幣香茗為贈是否是與其宗室身份相關是需要之後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 3, 贈茶的對象

除了贈茶的場景各有不同之外，贈茶的對象也各不相同。

#### (1) 贈朋友

在所有的贈物史料中，朋友之間的相贈是最為普遍的，在所有的贈茶史料中，朋友之間相贈的情況占比約為80%。

《與錢穆父三》：某啟。辱書，伏承比來尊體安佳，甚慰所望。毒暑不可過，使客紛紛然，殆不能堪。數日以熱毒發瘡數處，且告謁休養，以備坤成終日之勞也。奉羨清閒，獨無此福。惠茶既豐且精，除寄與子由外，不敢妄以飲客，如來教也。然細思之，子由既作臺官，亦不合與吃。薛能所謂“賴有詩情”爾。呵呵。公久外，召還當在旦夕，掃榻奉候矣。不宣。<sup>14</sup>

這則史料是蘇軾寫給朋友錢勰的書信，在收到朋友來信後，蘇軾給朋友回信，並感謝對方贈給自己的茶。像這樣給朋友寫信並附上禮物的情況非常普遍。

《答檀敦禮一〇》：頓首。伏奉手畢，喜承宿昔起居輕安。惠建溪官焙二餅，皆佳物也，感刻感刻！書砥兩試用之，乃大妙，輒受賜矣。桂林大研遣往，若齋中未有此，可留充一物也。兩帕合併納上。<sup>15</sup>

在這則書信中，黃庭堅收到了朋友送來的建溪官焙，並給朋友回贈了桂林大研這樣的文

<sup>13</sup>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六十二《回魏王賀生日書》，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sup>14</sup> (宋)蘇軾《蘇軾文集》卷五一《與錢穆父三》，第1503頁。

<sup>15</sup> (宋)黃庭堅《山谷老人刀筆》卷十八《答檀敦禮一〇》，元刻本。

房用具。以上例子都是朋友之間互贈物品的情況。

## (2) 贈同僚或上級

除了贈送朋友之外，同僚和上下級之間也會進行物品的贈答，其中贈茶相關史料中大致有 22 條其贈送對象為同僚和上下級，占比為總數的 10% 左右。其具體事例分析如下。

《與任世初察院書》：某頓首啓世初察院執事：久疏修問，良切馳仰。近黃親自行在回，方知去春嘗辱教答，付急足來，途中竄去，書遂浮沉。……來諭中興之說，可謂盡善，安得如公輩行其說於朝廷，使致恢復之績？衰病者得安山林間，何幸如之！無緣面談，但有悞致。建茶數品，沉香少許謾送書室清坐之資，幸檢至。向暄，千萬自重，門中均慶。謹上狀，不宣。<sup>16</sup>

在李綱（1083 年-1140 年）寫給察院執事的任世初的書信中，在問候與交流完相關的政治觀點之後，李綱在書信的最後寫道贈送建茶數品，沉香少許作為對方書室清談之時的助興之物。表現出茶在文人士大夫趣味生活中發揮的作用。

《與張相公第四書》：某惶恐：伏蒙鈞慈，特有頒貺衣著、茶藥多品，禮意勤腴，在於菲陋，何以克當？第深悚感，既不敢固辭，又無以致答，惟當時以藥石之言，仰報盛德耳。昔孔明下教曰：“諸君第勤攻吾短，庶幾蜀可治，而中原可復。”願相公無忘孔明之志，則所以永安宗社而大庇生靈者，必有在矣。惶恐惶恐。<sup>17</sup>

贈茶給同僚上司或下屬還有這則《與張相公書》，史料中李綱特意感謝張相公對自己頒貺衣著茶藥等。明確的展現了贈茶與同僚的場景。

## (3) 贈家人或親人

贈茶與家人或者親人的事例雖然較少，但是在贈茶相關的史料中也有 3 例，其中蘇軾寫給自己堂哥的書信明確的展現了贈茶與親人的場景。

《與子明八》：軾啓：久不上狀，懶惰之性，兄所照知，想未深罪。即辰尊履何如？兄所臨有聲藹然，想諸公文章，別有殊擢。弟已有替人，替成資。二年水旱，無種不有，且只得善去也。闊別十年，瞻奉無期，此懷可知。惟順時保練，卑請區區之至也。謹奉手狀起居，不備。弟軾再拜寺丞子明二哥、縣君二嫂左右。八月十八日。建茶克墨各少許，表信而已。不罪浼瀆。中秋三詩，寄呈以當一笑。軾再拜。<sup>18</sup>

這一封書信是由蘇軾寫個自己堂兄子明的書信，信中蘇軾向堂兄訴說了對自己的一些狀況，並問候了兄嫂，最後寫到奉上少許建茶和克墨聊表自己的心意。在這則史料中茶就作為一種表達自己心意的物品被贈送給了自己的親人。

## (4) 贈僧侶或道士

贈僧道的事例在贈茶相關的史料為數不少，總計數量為 18 例，占比為 9% 左右。其中如

<sup>16</sup> (宋) 李綱《梁谿集》卷一一一《與任世初察院書》，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sup>17</sup> (宋) 李綱《梁谿集》卷一二四《與張相公第四書》，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sup>18</sup> (宋) 蘇軾《與子明八》，《全宋文》第八十九冊卷一九二七，第 103 頁。

黃庭堅與清隱禪師這樣，長期持續保持贈答行為的事例也有很多。

《答清隱禪師一》：頓首。風水淹留，幸得對談塵，殊慰寂寥。二十九日解舟到山下，阻風雨，日相望二十裏，極思茶會，顧陰慘，不敢遣人奉邀爾。到星子便承監院垂訪，出先後所惠書，荷勤懇，並維摩香臺山茗石刻，皆領，並謝嘉貺。到城下，人事便紛紛，不能如阻風處得閑作書奉謝，良草草。雨寒，想道衆肅雍，多愛多愛！<sup>19</sup>

這則黃庭堅（1045年-1105年）的書信是寫給清隱禪師，在書信中黃庭堅提到非常想邀請禪師參加茶會，進行交談，但是沒敢進行邀請。並提到禪師先後所贈送的山茗石刻非常的感謝。從這則史料中也可以看出黃庭堅與這位清隱禪師之間的交往和交流的頻繁，並且保持著長期的贈答和贈物的行為。像這樣跟僧人或者是道士交往互贈的例子還有許多，比如黃庭堅《與芝上人曇秀一》中黃庭堅寫道：“承寄惠瓦爐湯藥，珍感珍感！雙井一小葩，謾助庵中平等煎耳。未緣會面，惟向道自愛，不次。”<sup>20</sup>其中展現了黃庭堅與芝上人曇秀之間的交流，並且在最後也提到了雙方贈送物品的行為，芝上人贈送黃庭堅湯藥，而黃庭堅則回饋對方雙井茶。展現了茶作為士大夫與僧侶之間交往的媒介作用。

#### 4，士大夫對茶的評判

##### (1) 對茶品質的評判

蔡襄在與友人章伯鎮的書信中談論了自己關於茶品的看法。如下：

《與伯鎮書二》：襄啓：端午氣候微熱，想君執事佳安。書問殊慰傾素。臥龍珍茗，猶在日鑄之上，然頃年曾得日鑄，其品甚高，今之造茶者不及曩時。臥龍前無此等，非精意不能至此也。春三月，湖上閑遊，時有篇什，今錄數首，要之雖老，尚管風物耳。不一不一。襄頓首，伯鎮老兄足下。六日。<sup>21</sup>

在此史料中，蔡襄（1012年-1067年）在問候了朋友之後，談論起對茶品的評判，並認為臥龍珍茗的品質在日鑄茶之上，之前自己曾經得到過品質很高的日鑄茶，而現在所造之茶則不如以前。而高品質的臥龍，是需要非常精心才能製造出的。從蔡襄的評價可以看出即便是名茶的製作，其品質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變化，日鑄茶的製作在蔡襄時期就發生了品質的下滑。而像臥龍這樣的珍茗則從無到有，說明在北宋時期茶的流行就在不斷發展與更替。

##### (2) 對茶保存時間的評判

除了對茶的品質的評判之外，還有對茶的保存時間的評判。

《與劉侍讀書二四》：嘉祐七年某啓：自過年便欲奉狀，只俟薛司勳歸，薛既以事滯留，遂成稽殆。但時見賢弟，詞問動靜，以慰懷爾。薛君留此，屢相見，粗悉疲病區區所爲，及其耳目所得，歸必能具道，更不煩言。惟的便無佳物表信，蓋西州所闕惟南味，得春多壞，不堪寄遠，當俟新茶馳獻爾。春早極闊，知陝西尤甚，奈何奈何？保重保重。某

<sup>19</sup>（宋）黃庭堅《山谷老人刀筆》卷一《答清隱禪師一》，元刻本。

<sup>20</sup>（宋）黃庭堅《山谷老人刀筆》卷七《與芝上人曇秀一》，元刻本。

<sup>21</sup>（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九蔡襄《與伯鎮書二》，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頓首。<sup>22</sup>

歐陽修在信中提到想用好的禮物表達心意，但西州所缺的南味等到春天就容易壞掉，不適用於遠寄，因此準備以新茶奉獻，茶葉可以長時間保存的特質是其成為士大夫贈答品的重要因素之一。距離遠近對宋代士大夫之間的贈物種類也存在重要的影響。

通過以上對贈茶相關的書信史料的分析來看，1，從北宋至南宋，所贈之茶的品類發生了變化，即使在團茶盛行的北宋時期，以雙井茶為代表的草茶也佔據了一席之地。在南宋時期，包含建茶在內的團茶逐漸式微，各地的名茶得到發展與流行。2，在流行的贈答風俗中，贈茶的場景雖然以書信附帶朋友之間的互贈為普遍現象，但是同時還有作為贈別時的饋贈、生日禮物、潤筆費等豐富的應用場景。顯示了茶在士大夫日常生活中廣泛的應用場景。3，宋代贈茶的對象包括了親人、朋友、同僚、僧道等幾種類型，其中朋友之間的贈送最為普遍，但贈同僚與贈僧道的現象也較為顯著。可以看出茶在士大夫交往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同時也顯示了進入宋代，仍持續了佛教對飲茶文化的傳播與發展的重要影響。

### 三，從贈答詩看宋代的茶文化

宋代留下了豐富的詩詞史料，其中文人士大夫之間交流往來的贈答詩也是展現宋代贈答送別文化的重要史料。這些贈別，贈答的詩文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是關於茶的贈答。在筆者搜集的《全宋詩》中，贈物的詩文大致有 2245 首。和上文提到的書信史料中的贈物情況類似，所贈物品也大致類屬文房用具、古董石刻、觀賞動植物、飲食、藥品、生活用品等幾個類別。在這些詩文之中贈茶的史料大致有 325 條，約占贈物史料總數的 145%與書信史料贈茶所占比例大致相等。

#### 1，贈茶的種類

在 325 條關於贈茶的史料中，北宋時期的史料有 133 條，占比約為 41%；兩宋之交的有 43 條，占比約為 13%；南宋時期的有 149 條，占比約為 46%。筆者依照所贈茶的品類，並按照北宋、兩宋之交、南宋三個時代劃分對史料中出現的各個品類的數量及其所占比例進行了統計，其詳情參照（表 2）。根據（表 2）的內容來看表述為茶或者茗的情況最為普遍，其數量總計 123，在 325 條史料中占比約為 39%，根據其數量遞減依次為：新茶 60，占比為 19%；團茶 36，占比為 12%；建茶 29，占比 9%，雙井茶 17，占比 6%，日鑄茶 11，占比 4%；山茶 8，占比 3%；顧渚茶 8，占比 3%；小春茶 4，占比 1%；數量為 3 及其以下的其他品類數量為 22，占比約為 7%。

從（表 2）可以看出，除了品類不詳表述為茶或者茗的類別之外，由北宋至南宋，新茶這一類別都是數量最多占比最高的。由此可見，宋代士大夫們在贈送茶的時候相對於茶的價格或者是知名度而言，首先看重茶的“新”，也就是當季新茶更容易被選擇為贈送的禮品。而這種選擇應該與茶的貯藏以及採茶時間有關，據沈冬梅在著作宋代的茶葉製造一章中提到宋代茶葉的製造方法使得茶葉極易吸濕串味<sup>23</sup>來看，茶葉放久容易受潮變質，因此當年當季所產的新茶就成為追求茶的品質的士大夫們的首選。另外，採茶的時間不同茶葉的品質則不同

<sup>22</sup>（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卷一四八《與劉侍讀書二四》，宋慶元二年周必大刻本。

<sup>23</sup>沈冬梅《茶與宋代社會生活》，第 19 頁。

也是士大夫們追求新茶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宋代的茶詩中有很多描述採茶時節的詩句，如梅堯臣在《依韻和杜相公謝蔡君謨寄茶》<sup>24</sup>中描述的“天子歲嘗龍焙茶，茶官催摘雨前牙。”便是描述龍焙茶須得在穀雨之前採摘。再比如歐陽修在《嘗新茶呈聖俞》<sup>25</sup>中所寫“建安三千裏，京師三月嘗新茶。人情好先務取勝，百物貴早相矜誇。”就是描述京師三月份就開始嘗新茶，並強調了飲用新茶的“早”。由對茶的“新”和嘗新茶的“早”的描述可以看出，士大夫們對新茶的追求和喜愛。因此新茶成為他們贈茶時的首選也就順理成章了。

依照其數量和占比順序排列在新茶之後，就是團茶（包含龍鳳團茶及其它種類團茶）與建茶。無論是北宋還是兩宋之交，團茶所占比例都為13%，南宋時期則其占比則稍有下降為9%。而建茶與團茶相比在數量和占比上都稍有減少，北宋和南宋時期其占比分別為9%和7%，而兩宋之交時期的占比則達到了15%。從數量和其占比來看，雖然到了南宋時期團茶與建茶的占比相較與北宋和兩宋之交時期其占比有所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大。說明到了南宋時期團茶與建茶仍然是士大夫們贈茶時的重要選擇對象。除了對茶品質的考慮和對茶口味的愛好之外，團茶的貴重與建茶的聲名遠播應該是士大夫選擇它們作為禮物贈送的重要原因。在宋代龍鳳團茶以及其他各式貢茶都比較貴重，價格較高，這一點在宋詩中也有諸多描述和體現。如梅堯臣在《呂晉叔著作遺新茶》<sup>26</sup>中“歲摘建溪春，爭先取晴景。大窠有壯液，所發必奇穎。一朝團焙成，價與黃金逞。”的描述，主要描述了建溪茶一旦被採摘製成團茶，價格可以與黃金相比。還有梅堯臣在《得雷太簡自製蒙頂茶》<sup>27</sup>一文中“陸羽舊《茶經》，一意重蒙頂。比來唯建溪，團片敵金餅。顧渚及陽羨，又複下越茗。近來江國人，鷹爪誇雙井。凡今天下品，非此不覽省。蜀芽久無味，聲名謾馳騁。”描述了各種名茶及時下所流行茶品，其中說到陸羽《茶經》中推崇蒙頂茶，而近來所流行推崇的只有建溪茶，建溪茶片團的價格就與金餅相當。然後描述了顧渚茶和陽羨茶，以及近來被有些人誇讚的雙井茶等這些茶中名品。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北宋時期草茶的雙井茶就已經聲名鵲起了。

(表 2)

品類	總計(所占總數比例)	北宋(所占北宋贈茶總數比例)	兩宋之交(所占兩宋之交贈茶總數比例)	南宋(所占南宋贈茶總數比例)
茶	123 (39%)	56(44%)	15 (32%)	52 (36%)
新茶	60 (19%)	20(16%)	7(13%)	33 (23%)
團茶	36 (12%)	16(13%)	6(13%)	14 (9%)
建茶	30 (9%)	12 (9%)	7(15%)	11 (7%)
雙井茶	17 (6%)	6 (5%)	5(11%)	6 (4%)
日鑄茶	11 (4%)	2 (1%)	2 (4%)	7 (5%)
山茶	8 (3%)	3 (2%)	0	5 (3%)
顧渚茶	8 (3%)	1	3 (6%)	4 (3%)
小春茶	4 (1%)	0	1 (2%)	3 (2%)
黃檗茶	3	0	0	3 (2%)
焦坑茶	2	0	1 (2%)	1
江茶	2	1	0	1
山藥茶	2	0	0	2 (1%)
其他	12 (4%)	8 (6%)		4 (3%)

<sup>24</sup> (宋)梅堯臣《依韻和杜相公謝蔡君謨寄茶》，《全宋詩》第五冊卷二五三。

<sup>25</sup> (宋)歐陽修《嘗新茶呈聖俞》，《全宋詩》第六冊卷二八八。

<sup>26</sup> (宋)梅堯臣《呂晉叔著作遺新茶》，《全宋詩》第五冊卷二五八。

<sup>27</sup> (宋)梅堯臣《得雷太簡自製蒙頂茶》，《全宋詩》第五冊卷二五八。

在團茶和建茶之後就是屬於草茶的雙井茶和日鑄茶，其中雙井茶在北宋、兩宋之交、南宋時期所占總數比例分別為 5%、11%、4%，雙井茶在北宋興起之後，在兩宋之交則達到了流行的頂峰，在南宋時期其流行則又趨於平淡，回到了與北宋時期大致相同的位置。而同為草茶的日鑄茶在北宋、兩宋之交、南宋三個時期的占比則分別為 1%、4%、5%。由北宋到南宋，日鑄茶在數量和占比上都呈現出了增長的趨勢。在梅堯臣所寫的《晏成績太祝遺雙井茶五品茶具四枚近詩六十篇》<sup>28</sup>中有“始於歐陽永叔席，乃識雙井絕品茶。次逢江東許子春，又出鷹爪與露芽。”這樣關於雙井茶的描述。其在歐陽修的筵席上認識了雙井茶，並以絕品茶稱之。歐陽修《歸田錄》中也稱“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鑄第一。”<sup>29</sup>，結合上文提到的梅堯臣在《得雷太簡自製蒙頂茶》中“近來江國人，鷹爪誇雙井”的描述來看，在北宋時期草茶的流行是在一部分人或者是一部分地域開始流行。到南宋時期開始普遍流行開來。

最後是占比不高的山茶、顧渚茶、小春茶、黃檗茶、其占比分別為 3%、3%、1%、1%不到。還有其他只有 1 例的各地名茶。這些茶的出現頻次雖然不高，但是各地名茶，如浙江湖州的顧渚茶，在唐代就作為貢茶；如江蘇宜興的陽羨茶，福建建安的壑源揀芽等都是各地名茶，其大部分為團茶。由此可以看出，各地的特產名茶也是士大夫們贈茶時的重要選擇。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對當歲茶的“新”和新茶的“早”的追求，讓新茶成為士大夫們在選擇茶作為贈送的禮品時的首要選擇。然後是對茶品的價值和品牌的考慮，貴重的龍鳳團茶和各地名茶也成為了他們重要的選擇。

## 2, 贈茶的場景與對象

與贈茶相關的書信史料不同，在《全宋詩》中的贈茶史料中，對贈茶場景的描述很少，絕大多數為答謝別人寄茶給自己，和對方的贈答詩這樣的形式。具體到不同的贈茶場景也就大致分為兩種，接下來筆者將結合史料進行詳細的舉例與分析。

### (1) 贈茶的場景

#### ①以詩贈茶

首先自己賦詩贈茶給別人情況，如呂南公（1047 年-1086 年）的《以雙井茶寄道先從以長短句》<sup>30</sup>就是自己以詩贈雙井茶給自己的友人。二是別人贈茶給自己，然後自己進行回復或者答謝的情況。這也是最為普通常見的場景，如晁說之（1059 年—1129 年）的《承宣以長句餉新茶輒次韻為謝》<sup>31</sup>就是朋友以詩贈茶給自己，自己再次韻回謝。還有在生日時收到或贈送茶為壽禮的情況，如蘇軾的詩作《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並寄茶二十一片》<sup>32</sup>，就是蘇軾在生日時收到了王郎寄來的慶賀詩文和茶。三是兩位友人之間的贈茶詩文在第三人或者是多人之間進行唱和。如晁沖之（1073 年-1126 年）《謝任伯久無書常子然寄茶謝之因簡任伯》<sup>33</sup>就是將自己答謝友人常子然贈茶與自己的詩文，又轉寄給久未通信的另一名友人謝任伯。由此產生了就贈茶這一件事進行兩人或者多人唱和的情況。與此類似的還有王之道（1093-1169）《次韻因上人謝徐守遺顧渚茶》<sup>34</sup>，在這裏是王之道就因上人謝徐守遺顧渚茶這篇詩文進行唱

<sup>28</sup> (宋)梅堯臣《晏成績太祝遺雙井茶五品茶具四枚近詩六十篇》，《全宋詩》第五冊卷二五六。

<sup>29</sup> (宋)歐陽修《歸田錄》卷一，《全宋筆記》第一編第五冊，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43-244頁。

<sup>30</sup> (宋)呂南公《以雙井茶寄道先從以長短句》，《全宋詩》第一八冊卷一〇三四。

<sup>31</sup> (宋)晁說之《承宣以長句餉新茶輒次韻為謝》，《全宋詩》第二一冊卷一二一二。

<sup>32</sup> (宋)蘇軾《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並寄茶二十一片》，《全宋詩》第一四冊卷八〇五三。

<sup>33</sup> (宋)晁沖之《謝任伯久無書常子然寄茶謝之因簡任伯》，《全宋詩》第二一冊卷一二二三。

<sup>34</sup> (宋)王之道《次韻因上人謝徐守遺顧渚茶》，《全宋詩》第三二冊卷一八一八。

和。以上三種以詩贈茶的情況可以大致分為兩人之間的贈茶往來與詩文唱答與三人或者多人之間的往來與唱和，雖然大部分的情況屬於前者，但後者也並不鮮見。由此情況可見，茶不僅作為贈答的禮物，還是士大夫小團體之間進行交流的媒介。

## ②攜茶見訪

相比較以詩贈茶，攜茶見訪的事例相對較少，且情況也相對簡單。基本就是朋友隨身攜帶茶來訪，然後開始飲茶聊天。如郭祥正（1035年-1113年）的詩作《陳老父攜茶見訪因留小飲二首》<sup>35</sup>，就是朋友攜茶見訪的例子。除了攜茶見訪之外，攜酒見訪的情況更為多見。可見茶和酒還作為訪客的禮品。在《夢梁錄》卷一八《民俗》一節中也談到了鄰里往來有茶水往來，有新住戶搬來“則鄰人掙借動事，遺獻茶湯”<sup>36</sup>。可見無論是在民間庶民還是士大夫之間，茶都起到了交往媒介的作用。像這樣以茶為媒介進行交往的風俗還有客人來了設茶招待，客人走時以湯送客。關於以茶待客的風俗在釋文瑩的《玉壺清話》卷六中還有一段有趣的記載：“一鉅賈姓段者，蓄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李白《宮詞》、《心經》。每客至，則呼茶，問客人安否寒暄。”<sup>37</sup>在這則記載中展現了段姓富商所養的鸚鵡非常聰慧，不僅能誦詩，有客人來就會招呼上茶並向客人問安寒暄。雖然是一段有趣的小故事，但是其中客至呼茶的描述也展現了以茶待客的習俗。另外，在《南窗紀談》中有記載道：“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不知起於何時，然上自官府，下至閭裏，莫之或廢。”<sup>38</sup>其中明確了這種“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的風俗上至官府下至尋常百姓都是如此。可見在各階層的日常交往中茶都發揮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 (2) 贈茶的對象

在宋詩中與贈茶相關的史料裏，贈茶的對象也與書信史料中表現出的贈茶對象大致相同。

### ①贈友人

與書信史料一樣，在贈答詩的贈茶相關史料中，贈茶對象為友人的情況最為普遍。如晁說之的詩作《謝仲長通判朝議兄惠顧渚茶》<sup>39</sup>就是感謝朋友贈自己顧渚茶的詩作。

### ②贈同僚

贈送對象為同僚的例子也較為常見，如以下兩個例子。

《通判國博惠建茶且有對啜之戲因以奉謝》：數餅建溪春，求逾尺璧珍。封從鄉國遠，惠與郡僚均。午榻忘搯臂，晨觴厭啟唇。拜嘉當對啜，相待況如賓。<sup>40</sup>

在首詩作是強至（1022年—1076年）為了感謝通判國博贈送自己建茶所作，其中表達了建茶的珍貴與求取不易，並描述了把這些珍貴的建茶均分給同僚們，然後愉快對飲的情景。

《次韻李公擇謝黃學士惠文潞公所送密雲小團一絕》：小團品外眾茶魁，宅相分從宰相來。南省同僚得傳玩，朵頤終日味山雷。<sup>41</sup>

<sup>35</sup>（宋）郭祥正《陳老父攜茶見訪因留小飲二首》，《全宋詩》第一三冊卷七七五。

<sup>36</sup>（宋）吳自牧《夢梁錄》卷一八，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1頁。

<sup>37</sup>（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六，《全宋筆記》第一編第五冊，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41頁。

<sup>38</sup>（宋）佚名《南窗紀談》，《全宋筆記》第五編第一冊，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203頁。

<sup>39</sup>（宋）晁說之《謝仲長通判朝議兄惠顧渚茶》，《全宋詩》第二一冊卷一二〇七。

<sup>40</sup>（宋）強至《通判國博惠建茶且有對啜之戲因以奉謝》，《全宋詩》第一〇冊卷五九〇。

<sup>41</sup>（宋）蘇頌《次韻李公擇謝黃學士惠文潞公所送密雲小團一絕》，《全宋詩》第一〇冊卷五二九。

這首詩作是蘇頌（1020年—1101年）為了唱和李公擇謝黃學士惠文彥博所贈密雲小團所作，是屬於多人之間的唱和。詩中描述了來自文彥博所贈的小團茶被尚書省同僚傳看把玩，並以一起飲用的場景。像這種同僚會飲的情況在宋代也非常的常見，在章炳文的《搜神秘覽》卷中記載道：“內殿崇班畢周臣嘗謂予言感應之事。向在陝西水西石壁寺中，乘間與同寮為茶會。<sup>42</sup>”，其中就記述了自己與同僚集會飲茶時所遇感應之事。不僅如此，在拙作（2020）對南宋茶館的考察中，則展現了更多更豐富的在茶館中飲茶並進行交流的場景，都展現了茶是怎樣在日常交往中發揮其重要的媒介作用。

### ③贈親戚

在《全宋詩》中以茶贈親人的例子相對較少，但是也有叔侄相互贈茶、兄弟相互贈茶的例子。如劉跂（1079年進士）《舍弟寄茶》<sup>43</sup>是兄弟之間的贈答，曾幾（1084—1166）《迪侄屢餉新茶二首》<sup>44</sup>則是叔侄之間的贈答。

### ④贈僧道

士大夫與僧人道士之間互贈物品及茶的情況也大量存在，如釋重顯（980年—1052年）《謝鮑學士惠蠟茶》<sup>45</sup>是士大夫贈茶與僧人。鄭清之（1176年—1251年）《育王老禪屢惠佳茗比又攜日鑄為餉因言久則味失師授以焙藏之法必有以專之笑謝》<sup>46</sup>的例子則是僧人贈茶與士大夫。士大夫與僧人道士之間，通過這種贈答進行了持續密切的交流，茶也充當著二者之間交流媒介的作用。

## 3. 贈答詩與書信中贈茶的比較

通過對書信史料以及贈答詩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出，二者呈現出來的關於贈茶的內容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性。首先，先是關於所贈茶的品類數量和占比方面分析的相同與差異之處：以茶和茗為表述的贈茶史料占比最高，說明贈茶的一種普遍化。建茶和團茶因為其貴重的價值以及名茶的身份地位，使得士大夫們選擇其作為贈送禮物的重要選擇。二者都顯示出士大夫們在選擇贈送茶的時候，對新茶的追求和青睞。但是相對於書信史料中新茶的占比而言，贈答詩史料則顯示了士大夫們贈送茶品時更強的選擇新茶的傾向性。而關於草茶的代表雙井茶與日鑄茶以及顧渚茶的發展與流行，二者呈現出了不同的態勢。書信史料中在北宋的贈茶史料中占比較高的雙井茶卻從南宋贈茶史料中卻失去了其蹤跡。而在宋詩史料中關於草茶的發展脈絡則是，草茶在團茶盛行的北宋開始就已經在一部分地域和一部分士大夫之間流行，在兩宋之交草茶更加盛行，但是到了南宋時期，草茶的發展漸漸趨於平淡，也未發展成北宋時期團茶盛行的程度。雖然二者呈現出了較為不同的發展脈絡，但是應該與史料的留存問題有很大的關係。結合二者來看，草茶在南宋時期的發展都是趨於平淡的。為什麼在煎茶文化開始盛行的南宋時期，草茶在贈答活動中的發展卻未達到團茶那樣的影響力呢。筆者覺得應該與草茶的樸素的個性有關，在高橋忠彥的論文（1991）中就論述了黃庭堅蘇軾等文人對團茶奢華的批評以及對草茶樸素個性的讚揚，而在宋詩中也多有“團片敵金餅”這樣對團茶

<sup>42</sup>（宋）章炳文《搜神秘覽》卷中《善報》，《全宋筆記》第三編第三冊，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41頁。

<sup>43</sup>（宋）劉跂《舍弟寄茶》，《全宋詩》第一八冊卷一〇七二。

<sup>44</sup>（宋）曾幾《迪侄屢餉新茶二首》，《全宋詩》第二九冊卷一六五五。

<sup>45</sup>（宋）釋重顯《謝鮑學士惠蠟茶》，《全宋詩》第三冊卷一四八。

<sup>46</sup>（宋）鄭清之《育王老禪屢惠佳茗比又攜日鑄為餉因言久則味失師授以焙藏之法必有以專之笑謝》，《全宋詩》第五五冊卷二八九八。

價值貴重的描寫。但是對雙井茶等草茶的描述，大多以頌揚其清香的味道，醒神的功能為主。其相比較新茶和團茶，缺少作為禮物的新奇和貴重之處，因此，在煎茶文化流行的南宋，草茶雖然也開始大範圍流行，但是其在體現贈茶文化的書信和贈答詩中的蹤跡就相對較少了。

然後是關於贈送場景和贈送對象方面分析結果的相同與差異之處：在贈送對象上，二者表現出了大致相同的特徵，即朋友之間的贈答為大多數的基礎上，親人、同僚、上司下屬、以及士大夫與僧侶之間也相互贈送禮物和茶。顯示了在宋代茶作為一般禮品的普遍性，是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們維持交往和人情的重要媒介。相較與宋詩中贈茶的史料而言，書信史料中則展現出了更為豐富的贈茶的場景。而書信史料大多為贈答雙方之間的往來與互動，而宋詩中贈茶史料則展現出文人士大夫集團之間的往來與互動。無論是把茶作為文人玩賞的趣味品，還是把茶作為官僚集團之間維持人情顯示地位的禮品來說，二者都體現了茶在士大夫日常生活和交往中發揮出的重要的媒介作用。

#### 四，結論

通過對《全宋文》的書信中和《全宋詩》的宋詩中與贈茶相關史料的全面整理和分析，我們可以瞭解到以下幾點內容：首先，在宋代茶不僅作為文人生活消遣的趣味品，還是官僚集團之間以及親友之間維持人情與交際的重要媒介，茶作為贈送的禮物在士大夫甚至於社會各階層的人們的交往中都發揮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其次是在團茶文化盛行的北宋時期，草茶已經在一些人群和一些地域得到了推崇與發展，在兩宋之交更是其發展的活躍期，而到了煎茶盛行的南宋時期，草茶卻並未像北宋時期的團茶那樣在贈茶文化中佔據絕對的影響力。最後則是在宋代的贈茶文化中，士大夫們對贈茶的選擇更傾向於高價名品的團茶和新鮮的當季新茶，而這也是相對樸素的草茶在煎茶文化盛行的南宋也未能在贈茶文化中取得像團茶一樣影響力的重要原因。

在整理了《全宋文》和《全宋詩》中關於贈物的史料之後，筆者發現在所有的贈物史料中贈茶史料只占其中的 15%左右。而贈物的種類大致可以分為文房用具、古董石刻、觀賞動植物、飲食、藥品、生活用品等幾個類別。而茶在所有的贈答品中又佔據了什麼樣的位置是更深入研究茶的社會文化地位的方向，也是筆者想在接下來繼續討論的課題。

## 第四章：從茶會和會茶看宋代士人的交流空間

### 一、緒論

中國對茶的利用源遠流長，從最開始對其食用性和藥性的利用，到發展為與精神世界相連的日常性飲品經歷了漫長的過程，而這個過程與中國古代社會文化發展息息相關。飲茶開始普及是在唐代，進入宋代飲茶之風進一步盛行，上至皇室、士人下至庶民百姓，飲茶在宋人的日常生活中得到普及並扮演重要的角色，開始承擔更多的社會功能。因此，在宋代不僅各階層人都可進入飲茶娛樂的茶館蓬勃發展，士人之間也興起了伴隨書信贈茶、品茶寫詩、鬥茶、舉辦茶會等一系列圍繞茶開展的文化活動。這些圍繞茶展開的文化活動在士人的社會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前文明確了作為重要交流空間的茶館向專業化發展的趨勢，在城市內分佈空間擴大、經營時間延長的發展態勢<sup>1</sup>。並對宋代的文化中心士人所寫的書信和贈答詩為中心，探討了宋代士人之間流行的贈茶文化，揭示了贈茶在士人交遊中發揮的媒介作用<sup>2</sup>。本章將繼續對在士人的日常交流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的茶會和會茶進行探討。

茶會在唐代的時候也稱茶宴、茶集，有以茶代酒的文人雅集，也有奢華隆重的宮廷茶宴、還有禪寺茶宴<sup>3</sup>，因此留下很多關於茶會的詩篇<sup>4</sup>。進入宋代，士人更加經常性的舉辦和參加茶會。在北宋時期，聚集在東京的士人廣泛參與拜謁、走訪、宴飲、雅集、送別等一系列朝堂之外的交遊活動，而這些活動與士人的在京生活和仕途緊密相連<sup>5</sup>。南宋時期，士人之間人際往來頻繁，南宋的雅集聚會也發展出多種形式，同僚同年通過茶會、詩會、耆老會等各種名目進行聚會<sup>6</sup>。可以說除了能展現文人趣味和精神情懷的雅集外，士人參與的茶會和宴飲往往與自身的人際交遊和政治需求密切相關。

本章將利用宋代士人的筆記（主要為《全宋筆記》），對其中關於茶會的相關史料進行整理，並結合詩文、書信、地方誌等史料進行分析，由此梳理出茶會的具體參與者、舉辦時機、舉辦場所及茶會的具體交流內容等。通過對以上內容的梳理，詳細探究宋代士人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中，是如何以茶和茶會為媒介進行私人交遊（與友人、與家人、與同好、與同僚、與僧侶）活動的。另一方面，對行宮·臺省·府治等官司及太學·縣學·書院等教育設施內所設固定會茶空間形態和作用進行論述。並以宋代士人參加茶會對政治·思想·文學進行共同討論為線索探討宋代士人關係網絡的維繫和發展，以此試圖解明以茶和茶會為媒介所構建出的在宋代士人的日常政治生活、社會文化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交流空間。

### 二、關於茶會和會茶的概念以及本文考察範圍

茶會和會茶雖然都是集會飲茶，二者也並無嚴格界限區分，但根據相關史料來看二者在

<sup>1</sup> 拙作《南宋臨安茶館的形態及其分佈》，《人文研究》第72卷，2021年，第59-76頁。《北宋開封茶館考論》，《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第19號，2019年，第40-63頁。

<sup>2</sup> 拙作《從宋代士大夫的書信與贈答詩看贈茶文化》，《都市文化研究》第24號，2022年，第138-148頁。

<sup>3</sup> 陳文華《中國茶文化學》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年。陳剛俊《宋代茶宴述論》，《農業考古》第5期，2016年，第68-71頁。

<sup>4</sup> 錢起《過長孫宅與朗上人茶會》，劉長卿《惠福寺與陳留諸官茶會》等都描述了文人參加茶會的場景。

<sup>5</sup> 梁建國《朝堂之外：北宋東京士人交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sup>6</sup> 黃寬重《交遊酬唱——南宋與元代士人的蘭亭雅集》，《唐宋歷史評論》（第2輯），2021年，第212-235頁。

其具體活動內容和舉辦時機上展現出一定的差異性，使二者的整體印象呈現出不同的傾向性。

對於茶會的定義，陳文華認為“按現代詞典的解釋，茶會就是用茶點招待賓客的社交性集會。但在古代用茶來招待客人的集會，集會時，除了飲茶之外，有時還會吃別的東西甚至喝酒吃菜。”<sup>7</sup>在其論述中將以茶招待客人的集會都納入到了茶會的範圍，如宋徽宗在延福宮所舉辦的曲宴，以及宋徽宗所作《文會圖》中所展現的文人集會。根據蔡京所作《延福宮曲宴記》的內容來看，曲宴上有美酒佳餚、歌舞音樂，皇帝親手做茶湯分賜眾臣<sup>8</sup>。而《文會圖》中的飲食主要為茶和瓜果點心，並有插花點綴，主要展現了品茗交流的文士雅趣。除此之外，宋代時期非常流行“鬥茶”，士人也經常聚集鬥茶，評判各自茶的優劣，留下很多關於鬥茶的詩作<sup>9</sup>。《江鄰幾雜誌》中就記載了蘇子翁與蔡君謨的鬥茶<sup>10</sup>，這樣以品茶鑒茶為主題的集會也可視作茶會的一種。由上述研究及相關史料所載，筆者認為大多茶會有明確的主題或目的並提前約定正式的舉辦時間和場所，具有較強的禮儀性，是包含品茶飲酒、吟詩作賦、品鑒書畫、聽曲彈琴等多種活動內容的綜合性集會。

與較為正式且兼具一定的禮儀性的茶會相比，會茶這一場景則較為頻繁的出現在宋代士人日常生活中，具有隨機性和日常性。雖然與茶會的說法不同，但其核心行為仍為集會飲茶並進行交流。從其相關史料如《西征道裏記》中“二日，會茶丹陽樓”、“四日，會茶韓世忠宅”<sup>11</sup>的記載來看，會茶可能並不會事先約定好主題、時間、地點、與會者，而是日常生活中較為隨機的行為<sup>12</sup>。另外，《容齋四筆》中記載<sup>13</sup>“汪聖錫為秘書少監，每食罷會茶，一同舍輒就枕不至。”可以看到一起在秘書省工作的士人們，在每次飯後就會茶並進行日常性的交流。由這一點可以看出會茶還具有日常性和慣例性，是宋代士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根據上述相關史料及分析，筆者認為會茶相較於茶會展現出其非正式的，較為隨性、隨機且日常性的一面，以及其以茶為媒介進行交流的氛圍。

本論主要基於前文茶館和贈茶文化研究，繼續對以茶為媒介展開的士人之間的“交流”進行深入研究。因此，將以士人間圍繞茶展開的“茶會”“會茶”“鬥茶”等為研究對象，對宋代士人由此展開的日常性的交流空間進行探討。

### 三、各種類型的茶會

宋代的茶會根據舉辦者身份和茶會性質不同，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 1、皇家宴會

關於曲宴，陳峰認為：“凡宋朝皇帝在常禮之外隨興安排的小規模宴會，皆可視為曲宴，對應的是“大宴”之類例行禮儀性宴會。”<sup>14</sup>宋代皇帝舉辦的宴會比較著名的是宋徽宗在延福宮舉辦的曲宴，蔡京為此作記，記述了參加此次宴會的具體經過。其所作《延福宮曲宴記》，

<sup>7</sup> 陳文華《中國茶文化學》，第205頁。

<sup>8</sup> (宋)蔡京《延福宮曲宴記》，收錄於(宋)王明清《揮塵錄餘話》卷一，《全宋筆記》第六編第二冊，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6-21頁。

<sup>9</sup> 如(宋)範仲淹《和張岷從事鬥茶歌》、(宋)唐庚《鬥茶歌》等。

<sup>10</sup> (宋)江休復《江鄰幾雜誌》卷上，《全宋筆記》第一編第五冊，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45頁。“蔡茶精，用惠山泉；蘇茶劣，改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

<sup>11</sup> (宋)鄭剛中《西征道裏記》，《全宋筆記》第三編第七冊，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99頁。

<sup>12</sup> 《西征道裏記》是鄭剛中為左宣教郎試秘書少監充樞密行府參謀時的記行之作，主要記錄了其在沿途的經歷。史料中所說的紹興九年五月二日和四日的兩次會茶沒有事先預設好日期、地點和主題的可能性較大。

<sup>13</sup> (宋)洪邁《容齋四筆》卷十五，《全宋筆記》第五編第六冊，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369-370頁。

<sup>14</sup> 陳峰《宋太祖朝的曲宴及其政治功用》，《歷史研究》第4期，2018年，第167-177頁。

被收錄在《揮塵錄餘話》卷一中。具體內容如下：

《延福宮曲宴記》：十三日，臣京序延福宮曲宴記，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於延福宮。特召學士承旨臣李邦彥學士、臣宇文粹中，與示異恩也。……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拂，少頃白乳浮醞，面如踈星澹月，願諸臣曰：此自布茶。飲畢，皆頓首謝。既而命坐，酒行無筭，復出宮人合曲，妙舞踈蹻，態有餘妍，凡目創見。上諭臣邦彥臣粹中曰：此盡是嬪御，自來翰林不曾與此集，自卿等始。又曰：翰林志誰修？太宰王黼奏云：承旨李邦彥。上願臣邦彥曰：好，翰林志可以盡載此事，此卿等榮遇。臣邦彥謝不敏。瓊瑤玉舟，宣勸非一。上每親臨視使醞復願臣某曰：李承旨善飲。仍數被特勸，夜分而罷。……<sup>15</sup>

以上史料主要記述了宣和二年（1120年）宋徽宗在延福宮設宴及宴會的整個過程。參加人員有宰執、親王等。為顯示恩寵特別下詔讓學士李邦彥和宇文粹中參加，此前不能參加該宴的翰林詞臣由此可以參加。在這次宴會上宋徽宗親自注湯擊拂做茶湯，分於眾人飲用（類似的場景可參考圖1宋徽宗《文會圖》）。宋徽宗在宴會上指示承旨李邦彥在翰林志中詳細記載此次宴會，並和蔡京調侃李邦彥善飲。

此次宴會雖展現了皇帝與詞臣、近臣之間比較親密隨意的交流場景，但這樣由皇帝開設的曲宴，往往具有較濃厚的禮儀和政治色彩。

## 2. 宗教茶會

在宋代茶也被應用在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道教中以茶顯示神跡，並把茶果作為貢品。在佛教生活中茶的作用更為重大，茶不僅作為僧人最重要的飲品，也是其與士人交往的媒介，並且茶禮還成為叢林清規的重要組成部分<sup>16</sup>。以下史料就記述了在佛教的傳統節日期間寺院開茶會的風俗。

《歲時廣記》卷二十九《請茶會》：《歲時雜記》解夏受歲事見諸經不可備舉，近世唯禪家解結二會最盛，禮信畢集，施物豐夥，解結齋畢，長少番次召諸僧茶會，諸寮互會茶十餘日乃畢。<sup>17</sup>

以上史料出自《歲時廣記》，主要收集記述了歲時的各類風俗。其中提到解夏、受歲這樣佛教特別是禪宗寺院的重大節日期間寺院諸僧會茶的風俗習慣。雖只是寺院內的習慣，但是被收錄在節日民俗的記載中也可見其對世俗的影響。事實上，寺院僧人不僅在宗教生活和宗教風俗中對茶有廣泛的應用，在對外交往時，茶也是必不可少媒介之物。塩卓悟利用入宋僧人成尋所寫《參天臺五臺山記》，從接待外國來賓的視角論述了宋代寺院僧人以茶待客的普遍性<sup>18</sup>。除以上內容之外，還需要更進一步考慮的是士人與僧人之間日常進行的茶會和交流。

<sup>15</sup>（宋）蔡京《延福宮曲宴記》，收錄於（宋）王明清《揮塵錄餘話》卷一，《全宋筆記》第六編第二冊，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6-21頁。

<sup>16</sup>沈冬梅《茶與宋代社會生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關於《禪苑清規》和叢林茶禮在著作中有詳細的論述。

<sup>17</sup>（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二十九，清十萬卷樓叢書本。

<sup>18</sup>塩卓悟《從〈參天臺五臺山記〉看宋代的公務接待》，平田茂樹·余蔚主編《史料與場域》，上海人民出版

黃庭堅、蘇軾等士人就與佛教禪師交往密切，經常有書信往來，以下就是黃庭堅寄與清隱禪師的兩封書信。

《答清隱禪師一》：頓首。風水淹留，幸得對談塵，殊慰寂寥。二十九日解舟到山下，阻風雨，日相望二十裏，極思茶會，顧陰慘，不敢遣人奉邀爾。到星子便承監院垂訪，出先後所惠書，荷勤懇，並維摩香臺山茗石刻，皆領，併謝嘉貺。到城下，人事便紛紛，不能如阻風處得閑作書奉謝，良草草。雨寒，想道衆肅雍，多愛多愛！

《答清隱禪師二》：寄惠伽陀，大為佳作，甚有警策也。人事多，未暇奉和。建溪三十、烏盞十，右送清隱，接待四海五湖。<sup>19</sup>

第一封書信首先慶倖之前與對方進行清談，極大的安慰了自己寂寥的生活和心情。並表示自己非常想要邀請對方進行茶會，但是顧慮天氣沒敢邀請。不久，對方寺院的監院便來訪並送來問候的書信，附帶維摩香臺、山茗、石刻等禮物。黃庭堅承諾自己得空便會回信感謝。第二首則誇讚對方寄來的伽陀（佛教中的偈），並附送建溪茶和烏盞（茶具）供對方招待各方來客。

從書信的內容可以看出，黃庭堅和清隱禪師的往來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從清隱禪師寄來佛教偈語，黃庭堅評價其大為佳作，非常有警示作用來看，二者在佛教思想上互有交流。這種交流不僅限於文字交流，還有面對面的清談，黃庭堅極思茶會可能是期盼與對方進行面對面的交流，茶會的舉辦為二者的交流提供了一個契機。另外，黃庭堅與僧人之間的來往不僅有清隱禪師，與雲巖禪師、芝上人曇秀等禪師也有書信往來，有求他作序，也有請他鑒賞碑刻，還有與其進行思想交流的<sup>20</sup>。這些交流的書信內容可以展現出土人和僧人之間以茶會或附贈禮物的書信進行愛好或思想上的交流場景。

### 3, 士人的雅集

宋代士人會進行各種雅集，其中非常著名的一次雅集是北宋時期，包括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秦觀等當時著名的文人名士和僧人圓通、道士陳碧虛在駙馬都尉王誥府中作客集會的西園雅集，李公麟為此次集會作畫，米芾作記。關於西園雅集有許多學者對其史實進行過考證<sup>21</sup>。雖然其史實存在爭議，但參考宋徽宗的《文會圖》及其他相關資料來看，其對文人雅集的想像和描繪還是大致相符的。關於南宋士人的雅集，黃寬重（2021年）有以下論述：“南宋士人雅集性的文化活動較之前代更為多樣。南宋業儒任官的士人增多，人際往來頻繁，聚會綿密，遊賞活動增多、類型多樣，如各種耆老會、率真會、詩社、棋社、鄉飲酒禮。同年同僚之間以節慶如中秋茶酒為名的聚會，普遍流行，各種文物都成為同道、同僚共賞怡情的資源”。<sup>22</sup>

社，2020年，第107-130頁。

<sup>19</sup>（宋）黃庭堅《答清隱禪師一》、《答清隱禪師二》，《全宋文》第一〇五冊卷二二九一，第172-173頁。

<sup>20</sup>（宋）黃庭堅《山谷老人刀筆》卷七《與芝上人曇秀一》，元刻本。

<sup>21</sup> 福本雅一《西園雅集図をめぐる》上，《京都國立博物館 學叢》第12號，1990年，第73-86頁。福本雅一《西園雅集図をめぐる》下，《京都國立博物館 學叢》第13號，1991年，第81-95頁。近藤一成《西園雅集考—宋代文人伝説の誕生》《史觀》第139號，1998年，第48-60頁。近藤一成《西園雅集考—宋代文人伝説の誕生》（續）《史觀》第141號，1999年，第16-29頁。

<sup>22</sup> 黃寬重《交遊酬唱—南宋與元代士人的蘭亭雅集》，《唐宋歷史評論》（第2輯），2021年，第212-235頁。

#### 4, 宋代的鬥茶

宋代盛行的“斗茶”也可視為茶會的一種，斗茶也被稱為茗戰。士人經常聚集起來品茶鬥茗，除了上文提到的蘇才翁與蔡君謨的鬥茶，宋代士人唐庚所作《鬥茶記》詳細記述了自己與友人鬥茶的場景，以及對茶和水的選取評判標準。（鬥茶具體印象可參考圖 2 劉松年《鬥茶圖》）

《鬪茶記》：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與鬥茶於寄傲齋。予為取龍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為上，某次之。某閩人，其所齋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較皆精絕。蓋嘗以為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不宜得而得之者。· · · · · · 罪戾之餘，上寬不誅，得與諸公從容談笑於此。汲泉煮茗，取一時之適，雖在田野，孰與烹數千裏之泉、澆七年之賜茗也哉？此非吾君之力歟？夫耕鑿食息，終日蒙福而不知為之者，直愚民爾。豈我輩謂也。是有所紀，以無忘在上者之澤云。<sup>23</sup>

政和二年三月壬戌（1112 年），唐庚與二三君子在寄傲齋鬥茶。借由對茶和煮茶之水的評價表達自己對人生境遇的思考，並以此反省警示自己要感念君主的恩澤。文中提到的鬥茶場所寄傲齋，是唐庚左遷惠州時，在居所開闢的一處書齋。寄傲齋之名取自陶淵明的《歸去來兮》，其意並非是沒有早生歸隱之志而被貶的後悔不及，而是表達早已萌生的田園之志<sup>24</sup>。在其所作《寄傲齋記》中所說的“數懇丞相，求西南一官以歸，蓋將老焉。會奇禍作，以故不果”，則指自己由於宰相張商英罷相受到牽連而被貶至惠州之事<sup>25</sup>。在謫居惠州期間，寄傲齋則是 he 與朋友飲茶交流，讀書論道，寄託自己田園之志的場所。

唐庚這樣的謫居士人在謫居期間也通常與當地士人及其他士人保持著交遊關係<sup>26</sup>。關於唐庚的交遊關係，劉麗丹<sup>27</sup>結合時代背景，尤其是政治環境（主要是黨爭）對唐庚的主要交遊和詩歌創作特徵中呈現出的內涵進行了考察和論述。其中對於唐庚在惠州期間的交遊也做了一定的探討。結合史料內容和相關研究來看，寄傲齋為唐庚與當地其他士人的往來提供了交流的場所，而在寄傲齋中進行的茶會或其他集會，為其交遊關係的建立提供了契機，由此構建起謫居士人與地方士人之間的交流空間。

<sup>23</sup>（宋）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八《鬪茶記》，四部叢刊三編景舊鈔本。

<sup>24</sup>（宋）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八《寄傲齋記》，四部叢刊三編景舊鈔本。“吾謫居惠州，掃一室於所居之南，號‘寄傲齋’。客指而曰：‘此非取淵明之語乎？子居京師時，何嘗念淵明？能念淵明，當不至斥逐。今既至此，然後區區掇‘寄傲’之語，以名其所居而見意焉。晚矣，無及也。’吾愧謝曰：‘子責我是矣。然豈知吾之心哉？吾官閩中時，嘗考論晉、宋人物，至《淵明傳》，慨然有感於吾心。時年三十，便有‘歸歟’之興，求田問舍，親友皆怪之。自是以來，俯仰十年，雖未即去，然田園之樂，未嘗一日不系於心，而《歸去來辭》，未嘗一日不諷於口。頃任博士，自以出處既不與隆替對；而迂愚拙直又不能從英俊遊，數懇丞相，求西南一官以歸，蓋將老焉。會奇禍作，以故不果”。文中就寄傲齋之名的來由與來客進行問答，指出寄傲齋之名並非是客人所說沒有早生歸隱之志而被貶的後悔不及，而是表達自己早已萌生的田園之志。

<sup>25</sup>《宋史》卷四百四十三《唐庚傳》，第 13100 頁。有載：“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稍為宗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置惠州。”，張商英因元祐黨人的身份被罷，唐庚也連坐被貶。

<sup>26</sup>平田茂樹《南宋士大夫のネットワーク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魏了翁の靖州居住時代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東北大學東洋史論集》第 12 期，2016 年，第 215-249 頁。以魏了翁靖州居住期間為線索，對南宋士大夫的交流與溝通進行探討，其中提及其與靖州或是附近官員士人之間的交流。

<sup>27</sup>劉麗丹《北宋徽宗朝唐庚詩歌研究》，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12 年。

#### 四，宋代士人的日常會茶

區別於以上各種類型的茶會，在士人的日常生活中有非常多的“會茶”場景，雖然同樣是聚集飲茶並進行交流，但是其存在場景的普遍性要高於以上各種類型的茶會，這些會茶通常具有日常性和隨意性，為士人之間的交流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 1，會茶的人物和場所

###### (1) 工作場所的會茶：秘書省、縣衙等官廳

###### ①同僚之間→秘書省同僚

在宋代士人的工作日常中經常出現會茶的場景。以下史料就記載了秘書省的官員與同僚會茶的場景。

《容齋四筆》卷十五《經句全文對》：……汪聖錫為祕書少監，每食罷會茶，一同舍輒就枕不至。及起，亦戲之曰：宰予晝寢，於予與何誅。衆未有言，汪曰：有一對，雖於今事不切，然濫是一箇出處。云：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同舍皆合詞稱美。<sup>28</sup>

文中記載汪聖錫為祕書少監，每次吃完飯就與同僚們會茶，每會茶時則有一同僚倒頭睡覺。等這位同僚起來之後戲出一對，汪聖錫以“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為對，同僚皆稱讚。其中提到“每食罷會茶”則說明，吃完飯會茶是祕書省官員們的慣例。雖然其中沒有對大家在會茶時的具體交流內容進行描寫，但實際上在會茶的時間和空間裏是進行著各種交流的，筆者將在後文進行詳細論述。在這裏出現了祕書省同僚們的會茶，雖然沒有明確指明會茶場所，但根據即將在後文進行詳細論述的“館內會茶”、“會茶閣”等記載可以預想會茶場所應該就是其工作場所。

###### ②同僚之間→知縣與幕僚（上下級）

除了館閣內同僚之間日常性的會茶之外，上下級之間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會茶。如下面史料就記述了知縣和幕僚之間會茶時所發生的事情。

《春渚紀聞》卷五雜記《陳塗共為冥吏》：晉江陳彥柔言，文林郎知縣事孫復，為政廉明，郡以其才力有餘，俾參幕事。一日，與幕僚會茶，獨見一黃衣人授以天符，且云：當與州之舉子塗楷者同領職，迨還家，越夕而卒。……<sup>29</sup>

該史料記述的故事主要是講紹興十一年（1141年）間，文林郎知縣事孫復在與幕僚會茶時，遇到一個黃衣人授其天符，並告知其將與本州的舉子塗楷共領天職的消息，而孫復回到家中第二天就死去了。通過上述史料中故事發生時的場景和具體人物關係可以看出，知縣與幕僚這樣的上下關係之間在常的生活中也通過會茶進行交流<sup>30</sup>。

###### (2) 教育設施內的會茶：太學

###### ①同學之間→太學生

<sup>28</sup>（宋）洪邁《容齋四筆》卷十五，《全宋筆記》第五編第六冊，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369-370頁。

<sup>29</sup>（宋）何蘧《春渚紀聞》卷五，《全宋筆記》第三編第三冊，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232-233頁。

<sup>30</sup>皇帝與大臣之間也會有這樣禮儀外的會茶，在（宋）黃震《黃氏日鈔》（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十四《讀本朝諸儒書》中就記述了劉安世在給宋哲宗講經完畢後與皇帝會茶的場景。

會茶場所除了在官廳之外，在教育設施內的學生們之間也經常進行。如以下材料中就記述了太學生之間舉辦的茶會。

《萍州可談》卷一：太學生每路有茶會，輪日於講堂集茶，無不畢至者，因以詢問鄉里消息。<sup>31</sup>

材料中提及每路太學生之間都有茶會，他們輪流在講堂集會飲茶，以伺機詢問打探鄉里的消息。這裏的茶會可能不是簡單的喝茶、聊天。從每路有茶會來看，太學生之間的茶會是基於同鄉組織的。並且每路的茶會輪流在講堂集會飲茶時，每一個學生都會到場，具有明確的探聽鄉里消息的目的。

在《朝野類要》相關記載中就提及同鄉或同路的官員或太學生組建同鄉會，同榜進士則又作同年會<sup>32</sup>。這裏的茶會也具有類似的性質，各路茶會的太學生之間的聯繫大概率不僅限於學生時期，通過在太學生時期參加茶會的交流和瞭解，他們在之後也可能保持長期的聯繫。宋代士人的人際網絡往往基於科舉-官僚制、地緣、血緣、姻親、學問·文化·宗教等建立，而士人的人際網絡還具有多重、複合的特性<sup>33</sup>。像這樣基於地緣和學緣建立的太學生茶會和日常的會茶則成為這種人際網絡建立和深入聯繫的紐帶，為他們的交流提供了契機。

### (3) 開放空間的會茶：茶館、寺院等

#### ①友人之間

宋代士人在茶館、寺院等開放的空間會茶的情況也非常多見。在前兩章關於茶館的考察中，就對士人在茶館中聚集飲茶的情況進行了考察，在此不再一一贅述。比較代表性的描述就是《夢梁錄》中的相關記載。另外，關於士人在寺廟會茶的場景在唐宋時期都有相關記述，以下結合相關史料進行論述。

《夢梁錄》卷十六《茶肆》：大街有三五家開茶肆，樓上專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蓋此五處多有炒鬧，非君子駐足之地也。更有張賣面店隔壁黃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皆士人期朋約友會聚之處。<sup>34</sup>

上文主要對南宋臨安城的茶館概況進行描述，並提到市西坊南潘節幹、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髏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張七相干茶坊這五處茶坊太過吵鬧，並非是君子士人駐足之地。而黃尖嘴蹴球茶坊、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等幾處茶館都是士人們約朋聚會、飲茶的地方。

除了在茶館集會飲茶之外，在寺院聚會飲茶的例子在唐宋時期都不鮮見，如上文中提到

<sup>31</sup> (宋)朱彧《萍州可談》卷一，《全宋筆記》第二編第六冊，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41頁。

<sup>32</sup> (宋)趙升《朝野類要》卷一《題名》、卷五《同年鄉會》，《全宋筆記》第八編第三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436頁、第481頁。“題名進士及第，各集鄉人於佛寺，作題名鄉會。此起於唐之慈恩寺塔也。若官司州縣廳事，各立題名碑者，蓋備遺亡爾。”、“同年鄉會諸處士大夫同鄉曲並同路者，共在朝及在三學相聚作會，曰鄉會。若同榜及第聚會，則曰同年會。”。山口智哉《宋代〈同年小錄〉考—〈書かれたもの〉による共同意識の形成—》，《中國社會と文化》第17號，2002年，第100-124頁。論文對於這種基於同年關係而構築的共同關係和共同意識進行過考察。

<sup>33</sup> 平田茂樹《宋代之朋黨形成の契機について》，宋代史研究會研究報告第六集《宋代之社會とネットワーク》，汲古書院，1998年，第3-46頁。平田茂樹《南宋士大夫「重層」且「複合」的網絡與交流—以崔與之所謂「書信」的材料為線索—》，《宋學研究》第2輯，2020年，第217-239頁。

<sup>34</sup> (宋)吳自牧《夢梁錄》卷第十六，《全宋筆記》第八編第五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246-247頁。

的唐代錢起的《過長孫宅與朗上人茶會》，劉長卿的《惠福寺與陳留諸官茶會》都描述了在寺院與僧人和同僚們一起參加茶會的場景。在《搜神秘覽》卷中記載：“內殿崇班畢周臣，嘗謂予言感應之事。向在陝西水西石壁寺中，乘間與同寮為茶會”<sup>35</sup>其中畢周臣為作者講述了自己所經歷的感應之事。這個感應之事發生的時候，畢周臣正與同僚在陝西水西石壁寺中參加茶會。

#### (4) 私人空間內的會茶：私人宅邸

##### ①親人之間

在唐代就有官員奚陟請同僚來家中品茶的故事<sup>36</sup>。到了宋代則有以茶待客的風俗<sup>37</sup>，且從官府至尋常百姓家都是如此。因此，士人在家裏開設茶會的情況也經常出現，並且還有朋友攜茶見訪品茗聊天的情況<sup>38</sup>。另外，士人的家庭生活也與茶密切相關，以下史料中就提及了相關內容。

《梅溪先生文集》卷四《哭孟丙》：幼兒孟丙，年四歲，謝任之發蒙，六歲周誠叔誦求孝經論及五言詩，書院游近百人，誦道其姓第名字或優劣品藻，之於所親之前，予每書則與二兄侍立其側會茶與舉故事，在群兒中粗爲了了者。年才七歲而死，紹興壬申實五月二十四日也，我輩鍾情痛不自已爲詩以哭之。<sup>39</sup>

以上是紹興二十二年（1152年）王十朋為作詩悼念自己早夭的幼兒所作之文，其中記述了自己聰慧的幼兒與兄長們會茶舉故事其樂融融的場景。由“予每書則與二兄侍立其側會茶”來看，會茶在士人的家庭生活中也是日常性的行為。

## 2, 會茶所交流的內容

### (1) 學問的交流

根據會茶場所和參加者身份關係的不同，其交流內容也各不相同。其中就有關於學問的交流。

《龜山先生集》卷十三《南都所聞》：己丑四月自京都回至七月。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於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於聖人之僞。真個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疏闊，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爲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讓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僞爲也。”<sup>40</sup>

<sup>35</sup> (宋)章炳文《搜神秘覽》卷中，《全宋筆記》第三編第三冊，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41頁。

<sup>36</sup> (宋)《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七夢二《奚陟》，民國景明嘉靖談愷刻本。“時已熱，餐罷，因請同舍外郎就廳茶會。陟為主人，東面首侍。”

<sup>37</sup> (宋)佚名《南窗紀談》，《全宋筆記》第五編第一冊，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203頁。“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不知起於何時，然上自官府，下至閑裏，莫之或廢。”

<sup>38</sup> 參見拙作《從宋代士大夫的書信與贈答詩看贈茶文化》，《都市文化研究》第24號，2022年，第138-148頁。

<sup>39</sup> (宋)王十朋《梅溪先生文集》卷四《哭孟丙》，四部叢刊景明正統刻本。

<sup>40</sup> (宋)楊時《龜山先生集》卷十三《南都所聞》，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

以上材料是楊時在元豐八年（1085年）所記會茶時論“禮”的場景。當時，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在會茶時提出了關於對孔子《論語》中“禮之用，和為貴”中禮是否出於人的本心之問。楊時問如果不是出自本心又為什麼召集我們來會茶呢。薛宗博則以只是前後例都如此，如若不然就過意不去，所以邀請大家為答。楊時又說，只是因為前後例都是這樣，心中自然過不去，這難道不是出自於自己的辭讓之心嗎。

關於此次爭論，朱熹<sup>41</sup>以薛宗博和楊時的爭論來說明闡述自己關於“禮”的思考。之後真德秀在其讀書記《專言禮》<sup>42</sup>一篇中也對此次茶會上的對話加以引用並闡述自己關於“禮”的解釋。

薛宗博借由請諸職事會茶而得以聚集同僚和楊時，從而提出自己關於禮並非出自人心的觀點，由此引發了楊時與之關於“禮”的對答。楊時與薛宗博二者之間的爭論體現了各自對“禮”的思考和認識。由此可見士人之間的會茶也為學問的交流提供了交流的橋樑。另外，從文中提到前後例皆如此，須一請之，也可看出，職事之間的會茶應是慣例，而這樣慣例的會茶則為士人之間的交流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 (2) 文學的交流

士人之間日常的會茶除了關於學問的討論之外，還有關於文學方面的討論，如一下兩則材料中就記述了相關內容。

《五總志》：館中會茶，自秘監至正字咸集。或以謂少陵拙於為文，退之窘於作詩，申難紛然，卒無歸宿。獨陳無己默默無語，眾乃詰之。無己曰：“二子得名，自古未易定價。若以謂拙於文、窘於詩，或以謂詩文初無優劣，則皆不可。少陵不合以文章似吟詩樣吟，退之不合以詩句似做文樣做。”於是議論始定，眾乃服膺。<sup>43</sup>

材料中主要記述了館閣之中會茶，從秘書少監至正字齊聚，開始討論評價韓愈和杜甫的文學才能。有的說杜甫不善於寫文，有的說韓愈不善於作詩。只有陳師道默默無聲，眾人開始責問陳師道。陳師道以“少陵不合以文章似吟詩樣吟，退之不合以詩句似做文樣做。”答之，才平息了爭論。跟此類似的情況還有《道山清話》中的記載<sup>44</sup>，同樣是館中會茶，一新進職事說韓愈詩太過孟浪。而恰巧劉攽在場，便以韓愈所作“風約半池萍”舉例，令對方無言。

從以上兩則材料的內容來看，宋代館閣之中職事們經常聚在一起會茶聊天。關於文學的交流在士人的日常生活中也非常頻繁，特別是關於詩文的交流和唱和。

《梅溪先生文集》卷四《萬季梁和詩留別再用前韻》：三年燕雁不同飛，一相逢尉遠歸。搜我肺腸茶著令，飲君文字酒淋衣。詩方唱和如仙館，人遽飄零似省闈。畢竟此心元不別，祇應形影暫相違。自注：予歸與諸友講茶令，每會茶指一物為題，各牽故事不通者罰，命季梁掌之。自注：予昔招仙館與同舍結詩社近諸友亦多唱和。<sup>45</sup>

<sup>41</sup>（宋）朱熹《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二《禮之用和為貴章》，明成化九年陳焯刻本。“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中自有和。須是知得當如此，則行之自然和。到和處方為美。因舉龜山與薛宗博說逐日會職事茶事。”

<sup>42</sup>（宋）真德秀《西山讀書記》卷八《專言禮》，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sup>43</sup>（宋）吳炯《五總志》，《全宋筆記》第五編第一冊，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4頁。

<sup>44</sup>（宋）佚名《道山清話》，《全宋筆記》第二編第一冊，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92-93頁。“館中一日會茶，有一新進曰：“退之詩太孟浪。”時貢父偶在座，厲聲問曰：風約半池萍，誰詩也？其人無語。”

<sup>45</sup>（宋）王十朋《梅溪先生文集》卷四，四部叢刊景明正統刻本。

上述史料是王十朋與朋友進行唱和時所作詩文，其中自注：經常與友人一起聚會飲茶，每次會茶都會指定一物為題講茶令，輸的人則要受罰。還與友人同僚一起組建詩社並經常唱和。從以上內容可見，士人的日常生活中經常以會茶和茶會為媒介，進行文學相關的交流和詩文的唱和。

### (3) 關於日常政務的交流

前文提到士人在日常的會茶和茶會進行各種交流，其交流內容當然也包括日常工作相關內容<sup>46</sup>。

《能改齋漫錄》卷十八《擊大鼓享厚味》：蔡巖文饒，與許光凝嘉謨俱為尚書。因會茶，嘉謨歎簿書之煩曰：“吾儕外望雖重，然日困刀筆，反與村縣長官無異。思典外藩，擊大鼓，享厚味，豈易得也？”文饒曰：“擊大鼓，享厚味，在公優為，巖安得而有之？”嘉謨歸，怪其語謬。未幾，嘉謨出知成都，文饒落職宮祠。<sup>47</sup>

蔡巖與許光凝為尚書，二人會茶時，許光凝抱怨自己的工作庶務太多，與村縣長官沒有區別，不如到地方去。後許光凝果然出任成都知州。

雖然關於士人同僚們會茶的記載很多，但是具體討論到其工作內容的記載還相對較少，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在日常會茶時對工作相關內容的討論。

## 五，交流空間的構築

### 1，固定會茶空間的設置

在宋代，不僅士人之間會自己組織茶會和會茶，日常工作場所會進行慣例性的會茶，甚至在行宮·臺省·府治等官司及太學·縣學·書院等教育設施內設置專門用以會茶的固定飲茶空間。

#### (1) 行宮

《景定建康志》卷一：景定三年，留守臣姚希得奉旨修葺行宮，準差承信郎內轄司提舉鮑體仁到府，檢計合修去處。曰：寢殿。曰：朝殿。· · · · · ·曰：會茶亭。曰：東華門。曰：內藏庫。曰：椿積庫。曰：皇城門裏外。曰宮門。· · · · · ·。<sup>48</sup>

以上材料主要記述了景定三年（1262年）姚希得奉旨修葺行宮時，承信郎內轄司提舉鮑體仁到府共同討論應修之所，其中就提到了會茶亭。結合會茶亭的名字和下文提到的相關史料來看，會茶亭應該就是一處固定的會茶空間。

#### (2) 臺省

<sup>46</sup> 除了這種對日常政務的抱怨，士人在日常會茶中還可能借茶表達對政治時局的諷刺與不滿。參見(宋)釋文瑩《湘山野錄》卷中，《全宋筆記》第一編第六冊，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35頁。

<sup>47</sup>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八《擊大鼓享厚味》，《全宋筆記》第五編第四冊，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227頁。

<sup>48</sup> (宋)馬光祖修，應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一，《宋元方志叢刊》第二冊，中華書局，1990年，第1339-1340頁。

《咸淳臨安志》卷五：廳以內為兩監察位，又內為殿中位，為會茶堂，又內為中丞侍御史位。<sup>49</sup>

《咸淳臨安志》卷十：在油車巷為廳五又有廳為會茶議事之所。<sup>50</sup>

臺諫和中書省御史閣也都有會茶空間的設置。以上兩則材料就提到了御史閣位的空間佈局，在殿中位和中丞侍御史位之間就是會茶堂，可以確定這也是一處固定的會茶空間<sup>51</sup>。《南宋館閣錄》省舍一節中在介紹秘書省的空間佈局時，也提到職事們閒暇會茶之所。秘書省中的空間設置，除了工作空間外，還設置了一些生活設施如澡室，還放置了手巾、水盆、湯瓶、茶盞托之類的生活用品。其中汗青軒這一處空間，則是職事們閒暇時會茶的空間。

結合以上三則材料內容來看，宋代秘書省臺諫宅等官廳應該都設置了固定的會茶空間，這些空間成為士人們在工作場中不可或缺的放鬆和交流的空間。

### (3) 府治

《夢梁錄》卷十《府治》：……入府治大門，左首軍資庫與監官衙，右首帳前統制司。次則客將客司房，轉南入簽廳。都門系臨安府及安撫司僉廳，有設廳在內。僉廳外兩側是節度庫、鹽事所、給關局、財賦司、牙契局、戶房、將官房、提舉房。投南教場門側曰香遠閣，閣後會茶亭，閣之左是見錢庫、分使庫、搭材、親兵、使馬等房。……。

<sup>52</sup>

該段文字詳細描述了府治的空間設置和府治內的格局，同樣提到了會茶亭這一空間設置，從香遠閣之前後左右的相關設施如見錢庫、分使庫、搭材、親兵、使馬等房來看，基本屬於功能性設施，香遠閣後的會茶亭也可能屬於會茶的功能性空間。

### (4) 縣學

《淳祐玉峯志》卷上《風俗》：……惟歲節冬至，縣官率鄉之寓賢士友，聚拜於學之明倫堂會茶而散，禮儀雍雍，長幼有序，自樂庵李公行之至今五六十歲，則它邑所無，今令尹項公澤又捐金置田租以充所費云。<sup>53</sup>

在前文提到太學生各路有茶會，並輪流在講堂會茶。地方縣學中也有類似的場景。在《淳祐玉峯志》的風俗一篇中描述昆山縣的風俗時提到：在每年的冬至時，縣官會率領當地以及寓居當地的士人一起彙聚於縣學的明倫堂<sup>54</sup>進行會茶。明倫堂會茶的習慣起始於樂庵先生李衡，<sup>55</sup>至今已經有五十六年。現在的令尹項公澤又捐金置辦田地，將其租費充當茶會的費用<sup>56</sup>。

<sup>49</sup> (宋) 潛說友纂修《咸淳臨安志》卷五，《宋元方志叢刊》第四冊，中華書局，1990年，第3400頁。

<sup>50</sup> (宋) 潛說友纂修《咸淳臨安志》卷五，《宋元方志叢刊》第四冊，中華書局，1990年，第3448頁。

<sup>51</sup> (宋) 陳騏《南宋館閣錄》卷二《省舍》，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sup>52</sup> (宋) 吳自牧《夢梁錄》卷十，《全宋筆記》第八編第五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183-184頁。

<sup>53</sup> (宋) 項公澤修，凌萬頃、邊實纂《淳祐玉峯志》卷上，《宋元方志叢刊》第一冊，中華書局，1990年，第1061-1062頁。

<sup>54</sup> 明倫堂一般為學堂正殿，是學校的講學讀書之所。

<sup>55</sup> 李衡致仕後就定居於昆山。《宋史》列傳一百四十九《李衡傳》，第11948頁。有載：“衡後定居昆山，結茅別墅，杖履徜徉，左右惟二蒼頭，聚書逾萬卷，號曰‘樂庵’，卒，年七十九。”

史料中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縣令項公澤特意捐金置辦田地，專門充作茶會的費用。二是，每年的冬至縣官率領當地和寓居當地的士人聚拜於縣學的明倫堂會茶。從這兩點來看，縣官與士人會茶於學校的明倫堂是當地一個正式且長期存在的一種風俗禮儀。山口智哉對學校禮儀中比較重要的“鄉飲酒禮”進行過考察，對唐、北宋及南宋明州地區“鄉飲酒禮”的發展及其內涵功能上的變化進行論述，並指出南宋時期“鄉飲酒禮”成為地方士人聚集進行交流的場所<sup>57</sup>。在這一點上，明倫堂會茶也具有類似的性質。與“鄉飲酒禮”不同之處在於明倫堂會茶還有寓居士人的參與，宋代官員被貶並寓居他地的例子並不鮮見，在寓居期間他們通常保持著自己的人際交遊網絡。平田茂樹以魏了翁靖州居住期間為線索，對南宋士大夫的交流與溝通進行探討。其中對魏了翁在寓居靖州期間的交流對象和內容進行了考察，並提及與靖州或是附近官員士人之間的交流<sup>58</sup>。同樣的上述史料中寓居士人對明倫堂會茶的參與則連接了本地士人和寓居士人，為二者提供了交流契機和交流場所，由此形成士人間的交流空間。

## (5) 書院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九《建明道書院》：祠堂居中三間，廣四丈，深三丈。中設塑像。榜曰：河南伯程純公之祠，東西兩廊各一十五間。御書閣在春風堂之上五間，廣八丈，深四丈，上嚴奉宸翰，環列經籍。春風堂在祠堂之後七間，廣十丈，深五丈，蓋會講之所也。……主敬堂在春風堂之北三間，廣三丈八尺，深二丈三尺，蓋會食會茶之所也，庭中荷池前植三槐。燕居堂在主敬堂之後，山長張顯設先聖及十四先賢神位於堂中。……<sup>59</sup>

以上材料主要記述了明道書院的建立歷史，以及明道書院具體的空間佈局。該書院主要為了傳播明道先生程頤之學，淳熙初由劉珙開始建立，期間經過多次擴建和修繕。嘉定八年（1215年）時，真德秀曾出資擴建。從明道書院空間佈局來看，各個建築空間的功能明確，各司其職。其中的主敬堂就是專門的會食會茶空間。

## 2, 通過茶會連接的士人

也可以看到通過茶會或會茶進行交流從而建立起聯繫，或以此為手段從而達到交流或建立聯繫等其他目的例子<sup>60</sup>。士人通過茶會建立起聯繫比較直觀的例子是蘇昞和尹焞的例子，其具體內容如下：

士人通過茶會建立起聯繫比較直觀的例子是蘇昞和尹焞的例子，其具體內容如下：

<sup>56</sup> (宋)項公澤修，凌萬頃、邊實纂《淳祐玉峯志》卷上，《宋元方志叢刊》第一冊，中華書局，1990年，第1062頁。其中有“知縣項公澤置一百七十一石六鬥二升內一十八石鬥升，系充茶會用”的記載。

<sup>57</sup> 山口智哉《宋代鄉飲酒禮考—儀禮空間としてみた人的結合の〈場〉》，《史學研究》第241編，広島史學研究會編，2003年，第66-96頁。

<sup>58</sup> 平田茂樹《南宋士大夫のネットワーク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魏了翁の魏了翁の靖州居住時代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東北大學東洋史論集》第12期，東北大學東洋史論集編集委員會編，2016年，第215-249頁。

<sup>59</sup> (宋)馬光祖修，應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九，《宋元方志叢刊》第二冊，中華書局，1990年，第1811-1812頁。

<sup>60</sup> (宋)錢世昭《錢氏私志》，《全宋筆記》第二編第七冊，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63頁。其中記述了王珪為擇駙馬人選特意設齋會茶以此為機觀察對方。

《和靖集》卷八：先生年十七為舉子時，教授蘇昞季明一見大奇之，謂先生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先生疑。一日，蘇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先生，遂往見伊川先生。<sup>61</sup>

上述材料為尹焯《和靖集》中對其生平的描述，記述了其在會茶時受到教授蘇昞的指點，拜在伊川先生門下的事情。根據《宋史》相關記載，蘇昞師從張載、二程，尹焯師從程頤，可以說二者師出同門，且與“洛學”的傳承和發展密切相關。另外，二人在政治主張上也有相通之處，都因元祐黨人的相關問題或被罷黜，或歸隱的政治境遇也有相似之處。

## 六，結論

總結來看宋代的茶會和會茶一般在君臣之間、同學之間、同僚之間、友人之間、士人和僧侶之間舉行，是維繫和發展宋代士人關係網絡的重要紐帶。茶會和會茶的舉辦時機則稍有不同，茶會有皇家禮儀性的茶會、也有某個節日或風俗中固定舉行的茶會、還有士人間約定好的雅集茶會。太多的茶會具有較強的禮儀性，具有明確的主題或目的，並提前約定正式的舉辦時間和場所，是包含品茶飲酒、吟詩作賦、品鑒書畫、聽曲彈琴等多種活動內容的綜合性集會。而會茶相較於茶會具有非正式的較為隨性、隨機且日常性的一面，有較強的以茶為媒介進行交流的印象。會茶有日常生活中據自己的心情隨時舉辦的情況；也有同學和同僚之間進行的慣例的會茶。根據舉辦者和參加者的身份不同，其在茶會和會茶上的交流內容也各有不同。既有進行詩詞創作、遊戲、品茗、參悟佛法等文人愛好為主的雅集與交流，也有士大夫之間進行的政治交流和太學生們之間進行的學業諮詢和信息交換。除此之外，舉行茶會和會茶的場所也各不相同，除了士人間在行宮·臺省·府治等官司及太學·縣學·書院等教育設施內設置的固定飲茶空間進行的日常性會茶，茶會主要在私人空間和開放空間進行，私人空間包括了私家的府邸和園林，開放的空間則有茶館、酒樓、風景宜人的室外等。

通過以上對宋代士人之間舉行的茶會、鬥茶、會茶的分析，可以明確士人之間以茶會和會茶為媒介所進行的廣泛的基於共同愛好·共同思想·共同人際網絡的交流。另外，在官廳及教育設施內設置的固定飲茶空間成為士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功能性空間，與士人們自行會茶的茶館、酒樓、寺院等開放空間·私家府邸和園林等私人空間，共同組成構建了宋代士人的交流空間，為士人網絡的建立提供了契機也是維持士人之間關聯的重要紐帶。。

<sup>61</sup> (宋)尹焯《和靖集》卷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附錄

圖 1：（宋）趙佶《文會圖》（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 2：（宋）劉松年《鬥茶圖》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表 1：茶會相關史料

序號	場所	人物	交流內容	茶會性質	出處
1	寺院	僧侶之間		佛教盛大節日(解夏、受歲)的茶會	《歲時廣記》卷二十九《請茶會》
2	寺院(或士大夫家)	士大夫與僧侶之間		日常往來之茶會	《山谷全書·續集》卷一《答清隱禪師》
3 (唐)	就廳茶會(家中)	同事之間	行茶(行茶的具體情景)、品茶	日常請同僚品茶之茶會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七夢二《奚陟》
4 (唐)	寺院	官員士大夫	飲茶作詩	日常同僚品茶作詩茶會	劉長卿《惠福寺與陳留諸官茶會(得西字)》
5	學(學校)之明倫堂	縣官率鄉之寓賢士友		歲節冬至的風俗禮儀	(淳祐)《玉峰志》卷上《風俗》
6	學校(昆山縣縣學)	學生等		日常茶會(知縣設立茶會專用的錢項)	(淳祐)《玉峰志》卷上《學校》
7,		以茶會親友	以茶會親友衆心和同所謀必成		《夢林玄解》卷十七《夢占》
8	秘書省省舍(清河坊糯米倉巷西懷慶坊北)	秘書省職事(同僚之間)	許職事暇時入會茶	省內設置會茶空間,日常職事閒暇之餘會茶	《南宋館閣錄》卷二《省舍》
9	秘書省暴書會		朝食五品午會茶菓晚食七品		《南宋館閣錄》卷六《暴書會》
10		知縣與幕僚(上下級之間)	會茶	日常會茶	《春渚紀聞》卷五雜記《陳塗共為冥吏》
11	秘書省	汪聖錫(秘書省同僚)	每食罷會茶	日常慣行的會茶	《容齋隨筆》容齋四筆卷第十五《經句全文對》

12	寺院	衆僧會 茶			《夷堅志》支志 乙卷六《了爽應夢》
13	皇宮	皇帝(哲 宗)與大臣 (劉安世)之 間	哲宗初銳意於 學一日講畢會茶(經 筵講畢會茶時進諫)		《黃氏日鈔》卷 四十四《讀本朝諸儒 書》
14	啓聖院(寺 院)	王珪與 同僚		臨時設置的會茶	《錢氏私志》
15	御史閣位	同僚	廳以內為兩監 察位又內為殿中位 為會茶堂又內為中 丞侍御史位	固定的會茶空間 (會茶堂)的設置	(鹹淳)《臨安 志》卷五《行在所錄》
16	臺諫宅	同僚	在油車巷為廳 五又有廳為會茶議 事之所	日常茶會	(鹹淳)臨安志 卷十《行在所錄》
17	寺院	僧侶			《林間錄》卷下
18	寺院(超然 自見軒)				《石門文字禪》 卷十二
19					《石門文字禪》 卷二十五
20		符昭遠 與同僚們	嘗為御史同列 會茶		《清異錄》卷四 《冷面草》
21		與友人 們行茶令(雅 集)	與諸友講茶令 每會茶指一物為題	雅集	《梅溪集》梅溪 先生文集卷第四《萬 季梁和詩留別再用前 韻》
22		家人	予每書則與二 兄侍立其側會茶與 舉故事	教育	《梅溪集》梅溪 先生文集卷第四《哭 孟丙》
23	館中	劉攽與 同僚	品論韓愈的詩 文	日常工作中會茶	《道山清話》
24	館中	秘監至 正字(同僚, 上下)	評論前人的詩 詞文章少陵(杜甫) 拙於為文退之(韓 愈)窘於作詩	館中會茶自秘監 至正字畢集	《五總志》
25		同僚之 間(蔡薺,許)	嘉謨(許光凝) 歎簿書之煩	日常的會茶	《能改齋漫錄》 卷十八神仙鬼怪《擊

		光凝)			大鼓享厚味》
26	府治	官員同僚	投南教場門側曰香遠閣閣後會茶亭	固定會茶場所的設置	《夢梁錄》卷九《府治》
27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同僚之間)	論禮		《龜山集》卷十三語錄四
28		蘇昞	交際,	日常茶會	《和靖集》卷八年譜
29	丹陽樓韓世忠園	同僚(行府官)	會茶丹陽樓,登連滄觀,觀人馬輜重渡會茶韓世忠園		《北山集》卷十三《西征道裏記》
30					《文忠集》卷十六《跋東坡與趙夢得帖》
31	行宮				《(景定)建康志》卷一留都錄一
32	書院內(主敬堂)	同學	會食會茶之所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九儒學志二《建明道書院》
33	太學	同學	“太學生每路有茶會,輪日於講堂集茶,無不畢至者,因以詢問鄉里消息。”	固定茶會	《萍州可談》卷一
34	中書省	呂公著與同僚	因聚廳啜茶	日常會茶	《湘山野錄》第二卷

## 結尾小結

第三、四章主要對宋代的贈茶文化和茶會進行分析和討論。其中第三章以士大夫所寫的書信和詩歌為中心，對茶在宋代贈茶文化中的位置進行了探討。通過對贈茶相關案例的分析，揭示出兩宋時期贈茶的種類、贈茶場景、贈茶對象的傾向。

贈答文化在唐代後期開始出現，到了宋代廣泛流行於士大夫之間，文學作品、茶酒特產等作為禮物被贈送。根據筆者對《全宋文》和《全宋詩》中關於贈物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來看，贈茶的比例約占 15%，且通常與其他物品組合送出。筆者收集並總結了《全宋文》中關於贈物的史料，總計有 1300 餘例，其中關於贈茶的例子有 200 餘例。另外收集總結了《全宋詩》中關於贈物的史料，總計有 2245 餘例，其中關於贈茶的例子有 325 餘例。根據史料中記載的所贈具體物品來看，有文房四寶、古董、金石、觀賞動植物、茶酒、食物（水果、海鮮等）、藥材藥方、生活用品（拐杖、衣帽、布匹、茶器、酒器等）。在唐代贈送禮品種類往往比較單一，而宋代不僅所贈物品種類十分豐富，包含從實用品到趣味、嗜好品，並且贈送禮品時往往會同時贈送數種品類組合，這種多數化的現象也是宋代出現的新趨勢。如將所有贈送物品按四大類分類可大致分為：文房四寶、觀賞動植物、飲食、生活用品四類，其中飲食類（主要為酒和茶）所占比例最高，其他三種所占比例基本相同。贈送物品的種類也與“訪問”、“感謝”、“慶祝”、“委託”、“文學交流”、“基於文房興趣和古董愛好的交流”等不同情況的交流和“上司-部下”、“朋友”、“家人”、“特定的興趣·愛好者”、“宗教關係的交往”等交流對象的類別密切相關。第三章的分析主要停留在對贈茶趨勢的分析上，今後可以繼續深入“交流”這一方面進行分析，分析所贈物品的品類傾向與交流場合、交流者類別，考察宋代人在何種交流場合下進行贈答，繼續對交流空間相關的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與贈答文化的發展相似，茶會的發展也經歷了不同的階段，結合序章所列茶會相關研究以及相關史料來看，唐代茶會除了宮廷茶會和寺院的茶會之外，大多為文人雅士之間的雅集。到了宋代，茶會更普遍的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在南宋期間在很多官司機構以及書院學校中專門設置會茶空間，使其在士人日常交流方面所起到的媒介功能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加強。而茶會的組織形式及會茶空間的形態在之後的元明清時期是如何發展變化的，是探討士人交遊以及士人群體變化發展的突破口之一，值得在之後的研究中繼續探究。

## 終章

本文主要從交流空間的視角出發，對宋代圍繞由茶發展出的社會文化現象和文化活動（城市空間內茶館的發展和興盛以及士人之間流行的贈茶和茶會等文化活動和現象）進行分析，並對由此所構造出的城市交流空間和士人之間的交流空間進行探討。

### 一、本文總結

本文主要以唐宋代開始發展的茶館以及士大夫間圍繞茶展開的贈茶文化和茶會為切入點，對宋代以茶為媒介所構建出的交流空間的功能和特徵進行探討。本文則參考“空間”論這一研究方法和視角，從交流空間這一視角入手，以茶和相關文化現象為切入點，對宋代茶館本身的空間性質，以及其在都市空間中的存在形態和特徵進行分析，從而對交流空間對宋人日常生活、城市空間內的信息交換和傳播、甚至於對宋代社會文化交流和傳播等方面產生的作用和影響進行探討。交流空間的產生並不局限在類似於茶館這樣具有建築物的物理空間，也會從連接人們的交流活動、書信等各種載體實現交流的這一過程中產生。因此，同時對宋代士大夫通過書信贈答詩和贈茶贈物等贈答行為所構築出的交流空間進行探討，對贈茶文化和茶會等以茶為媒介的文化活動和現象進行研究，並注意到宋代官司機構中設置固定會茶空間這一現象，對其形態和性質進行分析，由此探討茶作為交流媒介對宋代士人的交遊網絡所產生的影響以及由此所構造出的交流空間。以此嘗試揭示唐-宋這一歷史性的展開中宋代交流空間的形態和特徵。以下為本論大致內容。

在序章的部分主要對交流空間的內涵進行闡述，明確本文所論述的交流空間不僅包含在物理空間茶館產生的信息交流場域，還包括由士人之間進行的書信往來、詩文贈答、茶會等一系列交流活動所形成的信息交流場域。其中，茶館的相關研究主要分為以下三種類型：①茶館發展史及其經營內容和類型研究。②茶館的社會功能研究、③對茶館本身性質（或茶館空間性質）的研究。茶的研究範圍廣泛，除去茶的種植科學、茶葉經濟及其經營的相關研究，僅從茶文化來說，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的研究：①飲茶之風、茶的流行種類、飲茶法、茶藝、茶具的發展與變遷等基礎研究。②茶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發揮的作用及其功能的發展與變遷。③對由茶引發的各種文化現象（如茶書、關於茶的詩詞、書畫作品、士人間的贈茶等）的研究。④探討茶文化的精神內涵的研究。關於宋代的贈茶文化和茶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以下問題的探討：①贈茶文化與文人趣味之間的密切關聯性。②贈茶在士人交遊中發揮的作用。③茶會的發展歷史和茶會的類型。

從現有茶館、贈茶和茶會的研究來看，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茶館、贈茶和茶會研究存在的共同問題：①對於茶作為媒介在交流方面發揮的作用還尚未被充分研究。②對史料的利用問題，無論是茶館研究還是贈茶文化的研究缺乏對史料的整理和發掘。宋代茶館研究中主要使用城市史料和筆記小說史料兩大類。大多數的研究在利用史料時，選取需要的部分，存在片面性且對史料內容的整理不夠充分，並且忽略了城市史料和筆記小說史料之間的差異性。而在探討贈茶文化和茶會的相關問題時，利用宋詩進行茶文化研究的成果豐厚，利用書信對茶文化進行探討則鮮有研究涉及，缺乏對作為重要交流載體-書信史料的發掘。二，茶館研究存在的問題：①很多研究忽略了兩宋之間茶館發展變化的可能性，以及地域之間（首都-地方）存在差異的問題。②未對茶館在都市空間中的具體分佈形態進行探明。③未對宋代

茶館的經營者和使用者的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三，贈茶文化和茶會研究存在的問題：①缺乏對伴隨書信進行贈茶的專門討論。②多數相關研究對茶會的論述相對簡略，對舉行茶會的場所，舉行茶會的具體場景，以及在茶會的具體交流內容，茶會參與者的身份和互相之間的關係等問題未進行深入的探討。③忽略了會茶士人日常中的會茶。

基於以上關於研究視角、史料、對茶的交流媒介性質研究不夠充分等相關問題，本文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進行解決：①導入交流空間的研究視角，探討人與空間的聯繫。從交流空間的視角對茶館、贈茶文化、茶會進行分析，對茶作為交流媒介，以及以茶所構築的交流空間的形態和特征進行探討。②採用大數據分析的研究方法，搜集（主要從《全宋筆記》、《全宋文》、《全宋詩》及其他相關文獻中進行搜集）相關史料進行全面的整理和分析，對城市史料、筆記、書信、贈答詩中相關史料進行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建立數據表格進行數據（統計學史學的研究方法）分析。③針對茶館研究的相關問題，本文關注茶館分佈空間與城市空間之間的關聯性與互動性。將茶館研究與都城研究相結合將茶館在城市空間中的具體分佈進行復原，對其城市空間內的分佈特征和影響其分佈的因素進行探討。④關注時代、地域之間的差異性，分別對北宋和南宋、首都-地方的茶館別進行考察並進行對比和總結。⑤對於贈茶研究的相關問題，本文收集整理《全宋文》中相關史料，對士大夫間伴隨書信贈茶的具體情況和特征進行分析。⑥對於茶會，本文以對各類型茶會進行總結的同時，對會茶的具體參與者、舉辦時機、會茶時交流內容等進行分析，並對官廳及教育設施內設置的會茶場所的形態和特征進行探討。

第一章主要利用城市史料和筆記小說史料，搜集茶館相關史料對其進行全面的整理並建立資料庫，以這些資料庫為基礎結合具體相關史料，對北宋開封茶館進行分析。宋代開封的茶館無論是在其經營時間的範圍還是其地點設置的範圍上，都有了很大的擴展。並且大多數茶館具有多重的社會功能，在其基礎的飲茶，休息的功能之外還具有飲食，住宿，存放物品，勞動仲介，等食店，邸店，客店，牙行的部分功能。開封茶館的分佈情況，除了分佈在東華門以外，土市子這樣的商業中心之外，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大量分佈在汴河沿岸這一區域，可以說商業和交通物流是影響其分佈的重要因素。另外，其在城市內的分佈跟酒店食店、妓館瓦子、邸店、客店、寺院道觀等空間具有緊密的聯繫性，寺院、邸店、倉庫等設施跟茶館一樣具有多重性質的特性，一樣可以住宿、存放物品等，它們的分佈空間也具有高度的重合性，這些設施與茶館共同形城市空間的一個個核心。

第二章同樣用計量史學結合具體史料分析的方法，對南宋臨安的茶館進行詳細的分析。在對城市史料的相關分析中可以看出，南宋臨安的茶館在其娛樂休閒功能上得到很大發展，茶館也有向專門化發展的趨勢。與此同時在分析筆記小說中茶館的相關史料時也可以看出，南宋臨安茶館的功能與邸店、牙行、瓦子、酒樓、食店等設施的功能也有重合之處，一定程度上繼承發展了北宋開封茶館身兼多重實用功能的特徵。除此之外，對茶館的分佈以及城市空間內茶館的分佈特徵等問題進行了探討，由此瞭解到茶館的分佈區域除了歷來研究中所指出的，商業區、城門道路附近、坊巷之中、以及名勝觀光地之外，還與大運河和錢塘江等交通要道、瓦子、軍營、寺院及西湖周邊的休閒娛樂空間息息相關。通過對以上內容的探討，明確了南宋臨安的茶館朝著專門化、多功能化發展的同時，其在城市中分佈空間呈現擴大大城外溢出的趨勢。城市中聚集的茶館和臨安城內外出現的流動茶攤、廣義範圍上的茶館這三者也構建了一個三重的南宋臨安茶館的分佈形態，從而極大地擴展了茶館的物理空間以及在社會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

第三章主要以宋代士大夫所書的書信與贈答詩為中心，探討其中展現出的宋代茶文化的內涵和特徵，以此管窺宋代社會文化的一個詳細側面以及整個宋代社會文化發展的脈絡。利用《全宋文》和《全宋詩》中有關贈茶的史料進行全面梳理並進行宏觀數據分析。可以發現，在兩宋盛行的贈答文化中，送茶的場景非常廣泛。另外，從對送茶的品種變化的分析來看，在贈答習俗中，茶的定位有從高檔昂貴的禮品向常規禮品變化的趨勢。其變化的原因與茶葉產地和飲茶方法的变化有密切的關係。通過分析和探討，可以窺見兩宋茶文化的特點及其變遷，也揭示了在士大夫日常生活和交遊中都發揮了重要媒介作用的茶，其社會地位也從高級的文人趣味品向一般禮品變化的趨勢。

第四章繼續對以茶為媒介展開的士大夫之間的“交流”進行深入探討。以宋代士大夫圍繞“茶會”、“會茶”、“鬥茶”等展開的交遊活動為研究對象，對宋代士大夫的集會及由此展開的日常性的交流進行探討。宋代的茶會和會茶一般在君臣之間、同學之間、同僚之間、友人之間、士人和僧侶之間舉行，是維繫和發展宋代士人關係網絡的重要紐帶。茶會和會茶的舉辦時機則稍有不同，茶會有皇家禮儀性的茶會、也有某個節日或風俗中固定舉行的茶會、還有士人之間約定好的雅集茶會。大多的茶會具有較強的禮儀性，具有明確的主題或目的，並提前約定正式的舉辦時間和場所，是包含品茶飲酒、吟詩作賦、品鑒書畫、聽曲彈琴等多種活動內容的綜合性集會。而會茶相較於茶會具有非正式的較為隨性、隨機且日常性的一面，有較強的以茶為媒介進行交流的印象。會茶有日常生活中據自己的心情隨時舉辦的情況；也有同學和同僚之間進行的慣例的會茶。根據舉辦者和參加者的身份不同，其在茶會和會茶上的交流內容也各有不同。既有進行詩詞創作、遊戲、品茗、參悟佛法等文人愛好為主的雅集與交流，也有士大夫之間進行的政治交流和太學生們之間進行的學業諮詢和信息交換。除此之外，舉行茶會和會茶的場所也各不相同，除了士人間在行宮·臺省·府治等官司及太學·縣學·書院等教育設施內設置的固定飲茶空間進行的日常性會茶，茶會主要在私人空間和開放空間進行，私人空間包括了私家的府邸和園林，開放的空間則有茶館、酒樓、風景宜人的室外等。宋代士大夫們以茶和茶會為媒介展開各種交流，在日常政治生活、社會文化生活、交遊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終章是對本文內容的整體概括，對宋代交流空間及其內涵特征進行更深層次的論述，並在此基礎上對未盡的課題進行展望。根據本文對茶館、贈茶文化和茶會的分析 and 考察，可以發現在都市空間中的茶館是一個實際存在的物理空間，以飲茶為名客觀上為人們提供了可供交流的場所。在茶館中活動的人們如市頭、行老以及仲介、牙婆聚集在茶館中獲得和傳播一些特定的信息，當他們脫離茶館這一物理空間時將獲得的信息向更廣泛的都市空間內外傳播，而他們進入茶館這一空間時又帶來不同的信息並進行新一輪的傳播，使茶館這一空間和都市空間之間通過茶館中人的活動實現了某些特定信息的交換與流動，而在這一過程之中茶館客觀上成為一種信息交換的特定場域，形成即本文所探討的交流空間的一部分。而茶館的利用者往往並不局限於首都居民，如在本文前兩章中提及的上京的科舉士人、地方官員、外地客商等，由於茶館兼具飲食住宿、休閒娛樂的功能、信息交換場域的屬性，這些外地入京人士選擇進入茶館休閒並以期獲得一些信息，通過他們的活動則可能實現首都和地方之間客觀上的信息流通。當然交流空間不僅包含在物理空間內形成的信息交換場域，還可以通過各種介質形成。本文第三、四章的考察對象贈茶和茶會則屬於人與人之間展開的交流活動，通過贈茶和書信、茶會等載體和中間媒介從而實現交流，此二者並非是一個具體存在的物理空間，而是達成溝通和交流的重要中間環節（或生成媒介），在通過這種中間環節達成交流目

的這一過程中客觀上形成了一個信息交換的場域即交流空間。綜上所述本文將交流空間總結為“由各種可實現交流和信息交換的介質所形成的客觀存在的場域”。本文通過由交流空間這一視角，對以茶為媒介所構築的交流空間進行的探討，一定程度上明確了宋代茶館和茶文化的發展特征。同時對現有茶文化研究中幾未涉及的茶在宋代士人交往及人際網絡建立和維繫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進行了探討，既是對茶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也是對士人網絡研究的補充，同時也為觀察唐宋時期影響社會構造形成的重要因素即信息交流與傳播方式的發展與改變、人與人之間聯繫的形成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 二、今後的課題

### 1. 交流空間

上述內容中對本文的考察內容進行了總結，其中對“交流空間”的概念進行了闡述即：“由各種可實現交流和信息交換的介質所形成的客觀存在的場域”。而交流空間的存在是多樣的，並不僅僅是本文的考察對象，關於今後如何對交流空間進行更深入的發掘與研究則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慮：首先，可以對更廣泛的交流空間進行深入的探討，如在結尾小結部分指出的繼續利用書信<sup>1</sup>和贈答詩<sup>2</sup>等相關史料對贈答雙方的身份地位、關係往來、以及其具體交流內容進行分析，書信和贈答詩作為重要的信息載體在士人的交流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由其所構建出的交流空間也是多元存在的。其次，可以以士人群體的活動為線索，對地方來京士人群體的活動進行探討。宋代時期由於科舉考試導致士人群體不斷擴大，參加科舉考試的士人、太學生、在首都等候職位的地方官員等外來士人聚集在首都。通過他們的活動和交流構建出溝通地方與首都，乃至全國範圍的交流空間。如他們在城市空間存在的茶館、太學、園林等物理空間的交流和活動。這些空間除了原有的娛樂、講學等功能外，還將通過士人的交遊活動和交流開展信息交換和文化傳播(中央-地方)。通過在城市空間的交遊活動和相互交流，官僚、科舉考生和太學生還通過地緣和學緣、業緣建立聯繫，建立自己的人際網絡。另外，還可以對圍繞城市物理空間變遷所進行的一系列信息交流及由此產生的交流空間進行研究。例如，城市中祠廟、道觀的設立與銷毀體現了朝廷與地方、官府與民間對民間信仰的看法與交流。從以上這些方面進一步嘗試在唐到宋這一歷史發展中揭示交流空間的形態和特徵。

### 2. 跨域交流

另外一方面可以利用遊記、日記、旅行記等史料進行跨域交流研究，如范成大所著使金日記《攬轡錄》、樓鑰所著使金日記《北行日錄》等。當然還有入宋僧人成尋所著《參天臺五臺山記》<sup>3</sup>。其中記述了成尋從日本出發到天臺山·五臺山巡禮的一路經歷與見聞。其內容不僅在佛教史上是獨一無二的記事，其中還記錄了關於運河、驛站、遞鋪的信息，也是交通

<sup>1</sup> 平田茂樹《南宋周辺社會における士大夫の交流と「知」の構築：魏了翁、吳泳、洪咨夔の事例を手掛かりとして》，第17頁。其中將宋代書信大致分為三個類別，第一種是具有公文書性質的，用於上奏或下達命令的書信；第二種是被稱為“啟”的書信類型，多寫於赴任升遷時的禮節性書信，在官僚交際中起到了潤滑油的作用；第三種則屬於交換政治、思想、文學想法或私人資訊情誼的私人信件。淺見洋二《文本的“公”與“私”——蘇軾尺牘與文集編纂》，《文學遺產》第5期，2019年，第72-84頁。

<sup>2</sup> 淺見洋二《距離と想像—中國における詩とメディア、メディアとしての詩—》，《宋代社會のネットワーク》宋代史研究會研究報告第六集，汲古書院，1998年，第275-320頁。文中對詩文作為情報載體在士人情報網絡中的重要作用、交換方式、以及支撐其存在的詩學人士等進行了探討。

<sup>3</sup> 成尋《新校參天臺五臺山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史研究的重要史料<sup>4</sup>。其中還記述了非常多成尋與宋朝官員、士人和僧侶進行交流的場景，是研究跨域交流的重要史料。除此之外《參天臺五臺山記》中抄錄了很多宋朝的文學作品，其中非常有趣值得探究的一點是，其中抄錄了《楊文公談苑》<sup>5</sup>中關於日本僧人的記載，在《楊文公談苑》原本散佚的情況下，《參天臺五臺山記》則成為珍貴的補充史料。其中關於日本僧人的記載<sup>6</sup>，由成尋的抄錄傳回日本，而後在《楊文公談苑》原本散佚的情況下又參考成尋所抄錄內容對原本進行補充和校注。不僅僅在其記錄內容上為中日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來源，在這種文本的抄錄-傳播-互相佐證的過程中也實現了跨越時間和空間的交流，也為跨域交流空間的研究提供了史料上的佐證與可能性。

---

<sup>4</sup> 高橋弘臣《成尋の天臺山巡禮をめぐる》愛媛大學四國遍路と世界の巡禮研究會編《巡禮の歴史と現在》，岩田書院，第163-181頁。高橋弘臣《成尋の天臺山・五臺山巡禮と宋朝の対応》，《四國遍路と世界の巡禮—人的移動・交流とその社會史的アプローチ》，2005年，第53-62頁。

<sup>5</sup> 《楊文公談苑》是楊億口述、黃鑒筆錄、宋庠整理而成的筆記。初名《南陽談藪》，後由宋庠重加整理去其重複，改題作《楊文公談苑》。今原書已佚。《宋朝事實類苑》、《詩話總龜》、《厚德錄》、《類說》、《分門古今類事》、《苕溪漁隱叢話》、《能改齋漫錄》、《說郛》等書中保存佚文二百餘則。

<sup>6</sup> 成尋《新校參天臺五臺山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56-460頁。廿九日癸卯天晴。於梵才三藏房，見僧裔然法橋並寂照大師來唐日記，即借取，書取楊文公談苑，如右：雍熙初，日本僧裔然來朝，獻其國《職員令》、《年代記》。•••••。

## 參考文獻目錄

### 一. 古籍文獻

1. (唐)陸羽《茶經》，沈冬梅校注，中華書局，2021年。
2.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趙貞信校注，中華書局，2005年。
3. (宋)洪邁《夷堅志》(全四冊)，何卓點校，中華書局，1981年(2013年重印)。
4.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全宋筆記》第五編第一冊，大象出版社，2012年。
5. (宋)吳自牧《夢粱錄》，《全宋筆記》第八編第五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
6.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錄》，《全宋筆記》第八編第五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
7.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全宋筆記》第八編第五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
8. (宋)周密《武林舊事》，《全宋筆記》第八編第二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
9. 《全宋詩》，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整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10. 曾棗莊、劉琳、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全宋文》，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11. (宋)洪皓《松漠紀聞》，《全宋筆記》第三編第七冊，大象出版社，2008年。
12. (宋)陸遊《老學庵筆記》，《全宋筆記》第五編第八冊，大象出版社，2012年。
13. (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1983年。
14. (宋)方勺《泊宅編》，《全宋筆記》第二編第八冊，大象出版社，2006年。
15.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中華書局，2006年。
16. (宋)何薳《春渚紀聞》，《全宋筆記》第二編第八冊，大象出版社，2006年。
17. (宋)張師正《括異志》，《古小說叢刊》，中華書局，1996年。
18. (宋)陳師道《後山談叢》，《全宋筆記》第二編第六冊，大象出版社，2006年。
19. (元)脫脫《宋史》，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中華書局，1985年。
20. (宋)朱彧《萍洲可談》，《全宋筆記》第二編第六冊，大象出版社，2006年。
21. (宋)章炳文《搜神秘覽》，《全宋筆記》第三編第三冊，大象出版社，2008年。
22. (宋)洪邁《容齋四筆》，《全宋筆記》第五編第六冊，大象出版社，2012年。
23. (宋)趙升《朝野類要》，《全宋筆記》第八編第三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
24. (宋)佚名《鬼董》，《全宋筆記》第九編第二冊，大象出版社，2018年。
25. (宋)周密《癸辛雜識》，《全宋筆記》第八編第二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
26.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全宋筆記》第一編第五冊，大象出版社，2003年。
27. (宋)佚名《南窗紀談》，《全宋筆記》第五編第一冊，大象出版社，2012年。
28.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全宋筆記》第三編第七冊，大象出版社，2008年。
29. (宋)劉一清《錢塘遺事》，《全宋筆記》第八編第六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
30. (宋)江休復《江鄰幾雜誌》，《全宋筆記》第一編第五冊，大象出版社，2003年。
31. (宋)鄭剛中《西征道裏記》，《全宋筆記》第三編第七冊，大象出版社，2008年。
32. (宋)王明清《揮塵錄餘話》，《全宋筆記》第六編第二冊，大象出版社，2013年。
33. (宋)潛說友纂修《咸淳臨安志》清道光十年錢塘汪氏振綺堂刊本，《宋元方志叢刊》第四冊，中華書局影印版，1990年。
34.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宋慶元二年周必大刻本。

35. (宋)歐陽修《歸田錄》《全宋筆記》第一編第五冊，大象出版社，2003年。
36. (宋)蘇軾《蘇軾文集》(全六冊)，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
37. (宋)黃庭堅《山谷老人刀筆》，元刻本。
38. (宋)周必大《文忠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9. (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40.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二十九，清十萬卷樓叢書本。
41. (宋)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四部叢刊三編景舊鈔本。
42. (宋)《太平廣記》，民國景明嘉靖談愷刻本。
43. (宋)朱熹《朱子語類》，明成化九年陳煒刻本。
44. (宋)真德秀《西山讀書記》，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5. (宋)吳炯《五總志》，《全宋筆記》第五編第一冊，大象出版社，2012年。
46. (宋)佚名《道山清話》，《全宋筆記》第二編第一冊，大象出版社，2006年。
47. (宋)王十朋《梅溪先生文集》卷四，四部叢刊景明正統刻本。
48.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全宋筆記》第五編第四冊，大象出版社，2012年。
49. (宋)馬光祖修，應合纂《景定建康志》清嘉慶六年金陵孫忠潛祠刻本，《宋元方志叢刊》第二冊，中華書局，1990年。
50. (宋)陳騏《南宋館閣錄》，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1. (宋)項公澤修，凌萬頃、邊實纂《淳祐玉峯志》清宣統元年《匯刻太倉舊志五種》本，中華書局，1990年。
52. (宋)楊時《龜山先生集》卷十三《南都所聞》，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
53. (宋)尹焞《和靖集》卷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4. (日)成尋《新校參天臺五臺山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二. 專著（按文中出現順序排序）

### 中文譯本

1. 謝和耐 1938年著/劉東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譯本。
2. 加藤繁 1952年著/吳傑譯《中國經濟史考證》，商務印書館，1962年譯本。
3. 斯波義信 1968年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稻禾出版社，1997年譯本。
4. 斯波義信 1988年著/方健·何忠禮譯《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譯本。

### 日語文獻

1. 山崎孝史《政治・空間・場所—政治の地理学にむけて》，ナカニシヤ出版，2010年。
2. 《宋代人の認識—相互性と日常空間—》宋代史研究會研究報告第七集，汲古書院，2001年。
3. 平田茂樹・遠藤隆俊・岡元司 編《宋代社會の空間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汲古書院，2006年。
4. 《宋代社會のネットワーク》宋代史研究會研究報告第六集，汲古書院，1998年。

5. 相田洋《橋と異人 境界の中國中世史》，研文選書，2009年。
6. 岡本不二明《唐宋の小説と社會》，汲古書院，2003年。
7. 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8年。
8. 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の研究》，汲古書院，2007年。
9. 入矢義高・梅原郁注釋本《東京夢華錄—宋代の都市と生活》，平凡社，1996年。
10. 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風間書房，1968年。
11. 宮澤知之《宋代中國の國家と經濟—財政・市場・貨幣—》，創文社，1998年。

### 中文文獻

1. 陳文華《中國茶文化學》，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年。
2. 丁以壽《中國茶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
3. 伊永文《宋代市民生活》，中國社會出版社，1991年。
4. 羅陳霞《宋代小説與宋代民間商貿活動研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21年。
5. 沈冬梅《茶與宋代社會生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6. 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 1900-195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7. 王玲《中國茶文化》，九州出版社，2009年（初版出版時間為1992年）。
8. 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中華書局，2014年。
9. 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
10. 梁建國《朝堂之外：北宋東京士人交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 三. 論文（按文中出現順序排序）

#### 日語文獻

1. 高橋弘臣《南宋臨安における空間形態と変遷》，《愛媛大學法文部論集》第33號，2012年，第1-40頁。
2. 高橋忠彦《宋詩より見た宋代の茶文化》，《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15卷，1991年，第61-122頁。
3. 高橋忠彦《唐宋を中心とした飲茶法の変遷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09卷，1989年，第243-272頁。
4. 高橋忠彦《白居易の茶と陸遊の茶—茶詩の対偶表現をてがかりとして》，《東京學芸大學紀要人文社會科學系》第66卷，2015年，第80-98頁。
5. 合山究《贈答品に関する詩にあらわれた宋代文人の趣味的交遊生活》，《中國文學論集》第2卷，1971年，第23-47頁。
6. 水野正明《宋代における喫茶の普及について》，宋代史研究會研究報告第二集《宋代の社會と宗教》，汲古書院，1985年，第193-224頁。
7. 須江隆《アジア遊學 181 社會史史料としての〈夷堅志〉—その魅力と宋代社會史研究への新たな試み》，《南宋の隠れたベストセラー〈夷堅志〉の世界》，勉誠出版社，2015年，第75-90頁。
8. 塩卓悟《歴史史料としての〈夷堅志〉—その虚構と史実》，《中國筆記小説研究》第6號，2002年，第1-18頁。

9. 平田茂樹《南宋周辺社會における士大夫の交流と「知」の構築:魏了翁、吳泳、洪咨夔の事例を手掛かりとして》，《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第18卷,2017年,第1-20頁。
10. 塩卓悟《唐宋代の夜市》，《東洋史研究》第73卷2號,2014年,第186-216頁。
11. 福本雅一《西園雅集図をめぐる》上，《京都國立博物館 學叢》第12號,1990年,第73-86頁。
12. 福本雅一《西園雅集図をめぐる》下，《京都國立博物館 學叢》第13號,1991年,第81-95頁。
13. 近藤一成《西園雅集考—宋代文人伝説の誕生》《史観》第139號,1998年,第48-60頁。
14. 近藤一成《西園雅集考—宋代文人伝説の誕生》(続)《史観》第141號,1999年,第16-29頁。
15. 山口智哉《宋代〈同年小録〉考—〈書かれたもの〉による共同意識の形成—》，《中國 社會と文化》第17號,2002年,第100-124頁。
16. 平田茂樹《宋代の朋黨形成の契機について》，宋代史研究會研究報告第六集《宋代の社會とネットワーク》，汲古書院,1998年,第3-46頁。
17. 山口智哉《宋代郷飲酒禮考—儀禮空間としてみた人的結合の〈場〉》，《史學研究》第241編,広島史學研究會編,2003年,第66-96頁。
18. 平田茂樹《南宋士大夫のネットワーク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魏了翁の靖州居住時代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東北大學東洋史論集》第12期,2016年,第215-249頁。
19. 高橋弘臣《成尋の天臺山巡禮をめぐる》愛媛大學四國遍路と世界の巡禮研究會編《巡禮の歴史と現在》，岩田書院,第163-181頁。
20. 高橋弘臣《成尋の天臺山・五臺山巡禮と宋朝の対応》，《四國遍路と世界の巡禮—人的移動・交流とその社會史的アプローチ》，2005年,第53-62頁。

## 中文文獻

1. 劉學忠《中國古代的茶館》，《社會科學戰線》第5期,1994年,第120-124頁。
2. 劉清榮《中國茶館形制、功能的演變與前瞻》，《農業考古》第6期,2009年,第193-200頁。
3. 王春華《我國茶館功能發展和變遷》，《貴州茶葉》第3期,2014年,第52-53頁。
4. 蔣力《宋代的茶肆》，《商業文化》第0期,1994年,第50-51頁。
5. 王俊奇《宋代的茶肆》，《文史雜誌》第3期,1999年,第78-79頁。
6. 楊永兵《試論宋代茶館的功能》，《農業考古》第2期,2004年,第181-184頁。
7. 劉清榮《宋代茶館的論述》，《中州學刊》第3期,2006年,第189-192頁。
8. 鐘金雁《宋代兩京飲食業析論》，《雲南教育學院學報》第14卷第4期,1998年,第35-40頁。
9. 侯彥喜《宋代飲食文化初探》，《開封大學學報》第18卷第1期,2004年,第13-19頁。
10. 遊彪《宋代商業民俗論綱—以城市餐飲業為中心的透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5年,第94-102頁。

11. 劉芳心《宋朝京都飲食業經營特色淺論—以酒樓、茶坊為例》，《開封教育學院學報》第31卷第2期，2011年，第8-10頁。
12. 劉樹友《宋代兩京飲食服務業發展原因及概況》，《渭南師範學院學報》第27卷第3期，2012年，第120-124頁。
13. 何麗麗《宋代市井音樂文化的形成與形態》，《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6年，第33-37頁。
14. 李文正《宋代民間娛樂活動中的音樂表現形式及特徵》，《中州學刊》第11期，2014年，第135-137頁。
15. 紀昌蘭《試論宋代社會的賭場與賭風》，《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第2期，2016年，第19-26頁。
16. 劉盈惠《宋代浴室種類初探》，《鄭州師範教育》第4卷第4期，2015年，第81-86頁。
17. 李春棠《從宋代的酒店茶坊看商品經濟的發展》，《湖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1984年，第100-107頁。
18. 余江寧《論宋代京城的娛樂活動與城市消費》，《安徽教育學院學報》第22卷第2期，2004年，第29-32頁。
19. 秦開鳳《宋代文化消費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
20. 錢慧《宋代茶坊經營中音樂促銷的形式與特點—對宋代音樂經濟現象的個案解析》，《西安音樂學院學報》第34卷第3期，2015年，第53-58頁。
21. 唐國鋒《宋代茶坊與商業信息傳播》，《農業考古》第5期，2007年，第141-144頁。
22. 于江寧·任仲書《宋代勞務市場發展狀況研究》，《哈爾濱學院學報》第34卷第4期，2013年，第93-98頁。
23. 梅東偉《宋元小說話本中茶坊酒肆的文學形象與意義》，《中原文化研究》第4期，2016年，第123-127頁。
24. 馬歡歡《北宋開封娛樂業研究》，華東師範大學修士論文，2012年。
25. 李簡《宋代城市的演藝場所與文人之參與—從瓦子勾欄、酒樓茶肆談起》，《長江學術》第4期，2013年，第49-51頁。
26. 于天池·李書《宋代說唱伎藝的演出場所》，《文藝研究》第2期，2006年第87-93頁。
27. 陳凌《論宋代城市文娛場所興盛的原因及影響》，《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8年，第316-318頁。
28. 李曉南《從城市公共空間的角度看今昔茶館文化變遷》，《社會科學輯刊》第1期，2004年，第35-40頁。
29. 徐軻《宋代茶館研究—以北宋的開封和南宋的臨安為中心》，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30. 余悅《中國茶文化研究的當代歷程和未來走向》，《江西社會科學》第7期，2005年，第7-18頁。
31. 劉晗《從蘇軾茶詩看北宋茶文化》，《農業考古》第5期，2019年，第102-107頁。
32. 揚之水《兩宋茶詩與茶事》，《文學遺產》第2期，2003年，第69-80頁。

33. 王柳芳《從蘇黃茶詩看北宋文人的友情》，《農業考古》第5期，2006年，第184-187頁。
34. 鄧敏《宋代文人的茶詩生活與交誼——以蘇軾及同時代人為視點》，南昌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
35. 李娟《茶，宋代文人社會交往的媒介》，《農業考古》第5期，2006年，第49-53頁。
36. 虞文霞《一枝一葉總關情——宋代士人與茶文化淺談》，《農業考古》第2期，2008年，第43-50頁。
37. 陳文華《我國古代的茶會茶宴》，《農業考古》第5期，2006年，第160-163頁。
38. 陳剛俊《宋代茶宴述論》，《農業考古》第5期，2016年，第68-71頁。
39. 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
40. 楊曉靄《雅宴茶香笙歌闌——宋代士大夫的茶會情趣與茶詞歌唱》，《古典文學知識》第2期（總第167期），2013年，第60-67頁。
41. 鮑志成《論“徑山茶宴”及其傳承與流變》《第十二屆國際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2012年，第228-229頁。
42. 段瑩·鄭慕蓉·王斌·李曉軍《茶會的起源與發展概述》《茶葉通訊》第41卷第2期，2014年，第43-45頁。
43. 黃寬重《交遊酬唱——南宋與元代士人的蘭亭雅集》，《唐宋歷史評論》（第2輯），2021年，第212-235頁。
44. 平田茂樹《從城市史料和筆記小說的比較來看宋代的茶館》，《清華學報》第48卷第2期，2018年，第357-386頁。
45. 秦建明《勾欄瓦舍試解》，《文博》第4期，2015年，第41-47頁。
46. 戴曉峰《宋代兩京都市女性研究——以五種都市筆記為中心》，西北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
47. 趙雨樂《從寺院到市集：析唐宋時期的相國寺》，張其凡、範立舟主編：《宋代歷史文化研究（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48. 梁建國《北宋東京的人口分佈與空間利用》，《中國經濟史研究》第6期，2016年，第143-145頁。
49. 劉盈慧《宋代浴室種類初探》，《鄭州師範教育》第4期，2015年，第81-86頁。
50. 梁建國《橋門市井：北宋東京的日常公共空間》，《中國史研究》第4期，2018年，第113-126頁。
51. 塩卓悟《南宋江南的外食產業：從《夷堅志》看宋代的酒肆、茶肆與食店》，《中國飲食文化》第14卷第1期，2018年，第197-198頁。
52. 王世禎《北宋開封茶館考論》，《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第19號，2019年，第40-63頁。
53. 林航《南宋臨安城的流氓無賴》，《文史天地》第12期，2017年，第65-68頁。
54. 王世禎《南宋臨安茶館的形態及其分佈》，《人文研究》第72卷，2021年，第59-76頁。
55. 王世禎《從宋代士大夫的書信與贈答詩看贈茶文化》，《都市文化研究》第24號，2022年，第138-148頁。

56. 陳剛俊《宋代茶宴述論》，《農業考古》第5期，2016年，第68-71頁。
57. 陳峰《宋太祖朝的曲宴及其政治功用》，《歷史研究》第4期，2018年，第167-177頁。
58. 塩卓悟《從〈參天臺五臺山記〉看宋代的公務接待》，平田茂樹·余蔚主編《史料與場域》，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07-130頁。
59. 劉麗丹《北宋徽宗朝唐庚詩歌研究》，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
60. 平田茂樹《南宋士大夫「重層」且「複合」的網絡與交流—以崔與之所謂「書信」的材料為線索—》，《宋學研究》第2輯，2020年，第217-239頁。